

5

2000

ACADEMIC RESEARCH

总第 186 期 (月刊)

学术研  
究

# 目

##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主编助理兼  
编辑部主任

周 华

总校对

黄荣显

### ·经济学·

- 5/朱富强：“T型买方市场”的供需结构分析  
10/杨卫华 高 含：1978年来广东税收占GDP  
比重变化的特点分析与思考  
14/李新家：企业环境的变化趋势及其对企业行为的  
影响  
20/钟庆才 张炳申：国外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经  
验与借鉴  
24/谢明千：西部大开发：着眼于21世纪的重大战  
略部署  
28/江达明：新股发行的市场定价模型初探

### ·哲 学·

- 30/屠春友：试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原则  
35/王习胜：对“要素——结构——功能”立体化的  
拓展  
——与坚毅先生商酌  
39/姚小林 徐阳鸿：马克思历史环境观初探  
45/苟志效：意义与指称  
49/张文喜：对哈耶克“自由与责任”思想的一种阐释

###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征文·

- 56/吴 忠：经济特区应继续为中国的现代化探路  
【笔 谈】  
60/梁渭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新概括、新  
发展  
61/马中柱：共产党人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63/梁 钊：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内容



# 录

## ·教育学·

- 64/袁锐铨:西方著名德育思想家的德育模式探讨  
75/费冰:浅议创新人才的培养  
78/伍柳亭 李禾田:改革创新——迈向新世纪的  
素质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

## ·历史学·

- 80/李小树:论中国史学发展的形态演进与特征变化  
87/邓正兵:论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1931—  
1936年)  
93/谢佐永:护国军军务院和都司令部设在肇庆论析  
97/范耀登:张荫桓对早期华侨权益的保护

## ·21世纪中国学术展望·

- 102/端木黎明 宋永培:21世纪初汉字学、训诂学  
与中华学术研究的思考

## ·文学 语言学·

- 108/王坤:古典美学的拓展与突破  
——《金瓶梅》美学风貌论要  
114/古远清:对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批评  
118/陈红蕾:论季语在俳句中的审美价值  
122/罗可群:丘逢甲与客家文学

## ·书评·

- 127/何业光:解读柳宗元  
——荐梁鉴江《柳宗元传》

## ACADEMIC RESEARCH

###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83846307

83846177

邮政编码:510050

###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46-64

###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M268 北京399信箱

###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010349号

- Supply – and – Demand Structure in a Buyer’s T – type Market ..... Zhu Fuqiang(5)
- On Peculiarities of the Tax’s Change in Guangdong’s GDP Proportion Since 1978  
..... Yang Weihua and Gao Han(10)
- A Trend of Enterprises’ Environment and Its Effect on Their Behaviours  
..... Li Xinjia(14)
- Experiences and Enlightenment of Foreign Countries in Helping Middle and Small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 Zhong Qingcai and Zhang Bingshen(20)
- Great Exploration of China’s Western Area: an Important Strategic Plan of the 21st  
Century ..... Xie Minggan(24)
- An Approach to the Model for Setting the Price of New Stock ..... Jiang Daming(28)
- Principles for Multiple Methodology in Study of Social Sciences ..... Tu Chunyou(30)
- Progress in 3 Dimentions: Key Elements, Structure, & Function ..... Wang Xisheng(35)
- On Marx’s View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 Yao Xiaolin and Xu Yanghong(39)
- Meaning and Reference ..... Gou Zhixiao(45)
- An Explanation of Hayeck’s Thought ‘Freedom and Duty’ ..... Zhang Wenxi(49)
- Solicited Articles: “Being Rich with Thinking of Its Sources and How Progressing  
Further” ..... Wu Zhong, Liang Weixiong, Ma Zhongzhu and Liang Zhao(56)
- Models of Moral Education Designed by Moral Education Thinkers Well – known in  
Western Countries ..... Yuan Rui – e(64)
- On Cultivation of Persons Who Can Blaze New Trails ..... Fei Bing(75)
- Innovation: Quality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 Wu Liuting & Li Hetian(78)
-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Change of Shapes and Characteristics  
..... Li Xiaoshu(80)
- On the Policies against Japan Carried by the Local Officials Holding Factual Force  
in Guangdong ..... Deng Zhengbing(87)
- On the Reasons that the Military Academy and Headquarters of the Army for Nation  
Defence Was Set Up in Zhaoqing Area in Modern History ..... Xie Zuoyong(93)
- Zhang Yinheng’s Protection of Oversea Chinese Right & Benifits ... Fan Yaodeng(97)
-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Texts, and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 Duanmu Liming and Song Yongpei(102)
- On the Aesthetic Feature of ‘Jin Ping Mei’ (《金瓶梅》) ..... Wang Kun(108)
- My Evalu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90s ..... Gu Yuanqing(114)
- Aesthetic Value of Seasonal Words in the Shortest Japanese Poems .....  
..... Chen Honglei(118)
- Mr. Qiu Fengjia and Hakkas’ Literature ..... Luo Kequn(122)

# “T型买方市场”的供需结构分析

□ 朱富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博士,上海 200083)

[摘要]作者在文中介绍了学术界对当前经济形态原因的分析,论述了“T型买方市场”的含义,文章从需求方面和供给方面这两个角度来分析“T型买方市场”的形成原因及阐述了这种分析的政策含义。

[关键词]T型买方市场 形成原因 政策含义

〔中图分类号〕F03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05-05

## 一、“T型买方市场”的含义①

学术界对造成目前表面“经济过剩”原因的分析很多,有关观点概括起来有:(1)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放慢;(2)收入的不稳定;(3)信用制度不发达;(4)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5)缺乏新的投资需求扩张机制等。但分析大多是直接的、局部的、暂时的和表面的,而并不能对中国的经济形态作一全局的、长期的和深层原因的探究,而且它们大多认为当前出现了真实的经济过剩。

而我认为我国目前出现的并不是真正的经济过剩,而是一种被扭曲的表象。当然,我国当前的经济形态确实与以往的经济形态有很大不同,为了便于区分,我采用了学术界普遍的提法——买方市场,同时为防止将我国的买方市场与西方的买方市场混淆,我称当前的经济状态为“T型买方市场”,所谓T型买方市场,与T型流动性陷阱一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转型期出现的买方市场;二是指变了形的买方市场,甚至可以说并不是真正的过剩经济的买方市场。它有这样几个特点:(1)低档过剩型;(2)结

构失衡型;(3)过剩和短缺交织型;(4)有效需求的绝对不足型。我认为造成我国目前这种“T型买方市场”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收入差距的扩大、国内地区间市场的不统一和教育的短缺,上述所谓的原因其实是目前供求失衡的结果,而非原因。

## 二、收入差距扩大与国内市场不统一

从需求方面来看,造成目前表面经济过剩的原因是有效需求的绝对不足,而造成有效需求的绝对不足的深层次原因有两个: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国内市场的统一。

### 1. 收入的两极化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收入差距的加速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据国家统计局对3.5万户的跟踪调查,其中10%最低收入与10%最高收入户的差距,1981年时为2倍,1986年时为3倍,1993年为3.8倍,1997年已达4.2倍。按照另一种测量收入差距的方法——五等份法,也反映了目前我国人民收入差距之大。据调查,1989年内,我

国城镇居民中最富者的 1/5 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 29.38%，最贫穷的 1/5 家庭占 11.65%，至 1994 年，前者增至 44.46%，后者减至 6.01%，近年来，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②而据另一组资料，1994 年我国最贫穷的 1/5 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 4.27%，最富有的 1/5 家庭占全部收入的 50.24%。而根据美国 1990 年的数据，美国最贫穷的 1/5 家庭占全部收入的 4.6%，最富有的 1/5 家庭占全部收入的 44.3%。③

正是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造成了：  
(1)一般百姓的消费结构升级缓慢。就农民来说，我国的农村消费总体上仍处于温饱阶段，1996 年全国农村的恩格尔系数是 56.32%，1997 年是 55.05%，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这限制了农民的购买力向其他方面转移。(2)消费结构的两极化或者说消费结构发生断层。这首先表现在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使得城市的“夕阳消费品”很难向乡村转移，截止 1996 年，农民每百户彩电、冰箱、洗衣机的平均拥有量分别为 22.91 台、7.27 台、0.54 台，尚未达到城市 1985 年的水平。从另一个角度——横向比较来看，1992 年，城乡消费性支出分别为 2299.37 元和 659.01 元，城乡消费结构升级换代时间差约为 12 年，正是农村的购买力的贫乏，导致中国的消费市场缺乏扩展的驱动力，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电子产品大量过剩的重要原因。即使在农村内部，也存在极大的差距，据统计，我国 5% 左右的农村居民生活为贫困型，40% 左右属于温饱型，30% 左右在从温饱向小康型转变，而仅有 10% 达到小康水平。而当小康型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后，如收入差距继续扩大，那么消费需求从这些小康型家庭向其他家庭转变将又是一个断层。从全国来看，消费结构断层的直接

影响是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④(3)收入差距拉大会影响整个国家总体消费需求水平，我们知道，收入越高，边际消费倾向就越低，进而平均消费倾向也就越低；另一方面，对低收入者来说，由于收入都主要是用于生活必需品方面，弹性相对较小，消费倾向也相对变化较小。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从整体上看的消费倾向趋于下降。必须指出，收入的差距的扩大会加速了这一下降的速度；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下降要比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下降更快；如将群体进一步细分，将会发现，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消费倾向，进而对总体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需求的影响将更大，因为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也正在加速分化，这一趋势并不低于城乡之间的收入扩大趋势。

## 2. 国内市场不统一

在中国，经济分割，交通不便，各地都片面追求所辖范围内的“小而全”、“大而全”，导致重复投资，低层次建设，1998 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全国有 25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将机械工业作为支柱产业，选择电子工业的有 24 个，选择化学工业的有 23 个，汽车工业的有 22 个，建筑和建材的有 9 个。这样，地区间就难以真正发挥地区优势，丧失交换所能带来的剩余收益；既不能产生形成规模经济，又由于缺乏分工而必然使得产品的雷同，造成整个国家短缺的仍然短缺，过剩的依旧过剩。

同时，由于地方地区保护主义严重，从 19 世纪中国就正式产生了阻碍商品流动的“厘金”制度，而一个半世纪过去了，“通行税”、“买路钱”仍到处可见。这样的结果是，即使一地过剩的产品也难以输到短缺的地区，反映了 T 型买方市场地区性失衡的特点。同时，消费需求结构也很难在地区间顺利进行转移。因

此,虽然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但国内贸易却是障碍重重,发展缓慢,阻碍了整个国家均衡的发展。

我常把当前的中国经济称为“新蜂窝状经济”,以区别唐尼索恩提出的“蜂窝状经济”。唐尼索恩的“蜂窝状经济”是针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短缺经济,各个地区都不愿将自己的商品供应给其他的省市。如有的省市宁愿将相对过剩的粮食喂猪,也不愿输往其他省市救济灾民。而“新蜂窝状经济”是指,各省市宁愿花费更高成本自己生产,也不愿从邻近省市输入所需要的商品,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各地都对啤酒市场实行保护,以至出现“市市有啤酒厂”的现象。两种“蜂窝状经济”的共同之处就是中国的经济分割,正是这种状况是造成目前发生地区性结构供求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目前对付市场疲软的一个主要的政策就是扩大内需,其实,归根到底就是要扩大市场。但市场怎样才能得以扩大呢?固然由于目前世界市场的形势对我国相对不利,而且外部市场的扩大也要受各种因素影响(政治、文化、它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等等),而不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经济上的弱国所能左右的;因而,对外市场的扩大效果也不能有较明确的预期。因此,着眼于扩大内需也是形势使然。

但扩大内需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它实质上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演进的过程,这点布罗代尔曾有相当充分的论述。同样,市场的扩大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由地域到国家再到国际,由里向外,一层一层展开,纵观各国的发展史,基本都是沿着这样的发展轨迹。汉萨同盟的建立促进了北日耳曼地区的壮大,英国国内市场的统一,促进了工业革

命的到来,欧共体的成立有力地提高了与美国抗衡的经济力量。扩大内需一方面符合历史逐渐扩展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扩大内需也具有比扩大外需更有利的条件。因为这符合人的认识过程,我们对国内的文化环境、经济状况、需求结构比国外更加熟悉。

有些学者认为,由于形势的变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速度加快,因此中国应以扩大外需为根本着眼点,将参与世界的分工作为产业选择的标准;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被世界所排斥。我认为,怎样更好地利用国际分工的优势以加速发展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并不能因为目前加入世界体系的重要性而否定目前最紧迫的是真正统一国内市场。事实上,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如果国内不能很好地进行生产分工,而一窝蜂地与国外分工,只会成为附属品,而且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上面所说的,对外贸易很大,但对内贸易却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结果是窒息发展的生命力。

### 三、供给失效与教育短缺问题

在供给方面,“T型买方市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供给的产品不适应消费的要求,并产生大量的低档产品的过剩供给,这是为什么呢?是教育,是一直以来教育的短缺。

目前,国内一些产权学派的学者把造成目前中国供给失效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缺乏真正的投资人。他们认为,重复建设、低档商品生产过剩等都是由此而生的。只要投资者成为了资产的拥有者,他们会产生对资产的关切,就有内在的激励去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因此,极力主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sup>⑤</sup>

我对这种观点不敢苟同。如果说局部的生产过剩,是由于投资者缺乏对投资的真正关切还可以理解。因为,在这

种形势下,投资人决定正确的不致会重复建设的项目所花的精力等成本是很高的,另一方面由于制定了好的项目所带来的收益剩余不是一人所能独有,或自己从中得到的收益很小,这样,在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机会主义的思想就会使得他不会花很大的成本去关心项目的投资,甚至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租,⑥可能只关心投资的规模问题。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整体上发生普遍的、大规模的重复建设,低档产品生产,这就绝不能仅看成是投资者个人行为的问题。因为,这时由于大量的低档次的过剩已经显而易见了,投资者识别重复建设的成本就变得很小;而相应地,投资的较好收益给他带来的收益(包括权力租等)将远大于避免重复建设所付出的成本。事实上,当前大量的日用品的过剩产出都是私营企业生产的。因此,我们不能把目前出现的供需失调归结为投资人单方面的主体因素,我国目前的问题并不是以降息来刺激投资的问题,因为这样的政策带来的只能是进一步的过剩,这一点我已在“T型流动性陷阱”等文章里作了较深入的分析。而必须采取特别的政策,如大量扶持高新技术产业,集中投资一些有助于改善档次的产品或行业,同时运用财政政策,对基础设施进行根本改造,为今后的经济建设的稳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⑦为什么国内企业不进行产品结构转移呢?换句话说就是,造成不断重复低层次生产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于我国历来教育的短缺,中国最大的短缺是教育的短缺,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其他的短缺,教育短缺是一切短缺之总根源。

在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校的大学生的人数就有4万之多。正是有这样的一批知识人才,才使得中国在

5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些人才也是台湾、香港等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保证,因为有很大一部分后来流到这些地区。但是,在内地由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兴起,片面强调从直接经验学习,向工人农民学习,造成了教育的衰落(见下表)。

中国就学人数变化(万)

年份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高等学校
1949-1950	2400	83.2	20.7	22.9	17.7
1957-1958	-	485.1	83.5	77.8	44.1
1965-1966	11000	1190	210	54.7	69.5
1972-1973	12700	合计共36500			20
1975-1976	15094.1	4352.9	1483.6	69	58.4
1978-1979	14627	5148	1400	119.9	85.0

资料来源:根据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表12-1、12-2;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表29、30、31整理。

教育对生产的影响可以从经济发展的科技进步因素以见一斑。据统计,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比重:1952-1957年为27.8%,1957-1965年为8.2%,1962-1976年为4.1%,1978-1980年为31.5%,进入90年代,我国科技成果推广率在20-25%之间。⑧而一些发达国家因科技进步而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占80%以上。上面科技进步的作用恰恰与教育形成鲜明的正相关性。

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建国初期对教育的忽视或者说教育的畸化,影响到目前产业结构的转化,是导致目前低档产品重复投资的根源。其实,教育的忽视所产生的不良影响还远不止如此,我将在今后的文章再作深入的分析。总之,我常说,建国前30年最大的失误就在于教育的失误。



#### 四、政策含义

上面的分析表明,我国目前出现的供求关系扭曲的“T型买方市场”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它是有效需求绝对不足、地区间商品流动的阻滞以及长期的教育短缺所引发的。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处理,那么目前这种供求失衡状况就不是偶然的,而更可能是一个必然的现象,降低利率也不能有效地解决目前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更应该做的是理顺国内市场的关系,同时重点支持一些能改善产品结构的优惠信贷政策;长期来说,国家应该加大教育的投资。

①“T型买方市场”和“T型流动性陷阱”是笔者研究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提出的两个假说,它们的具体含义以及内容和特征,都已经通过专门文章进行了论述。

②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现阶段启动消费的困难与消费政策》,《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年第3期。

③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236页。

④我认为,中国千百年来之所以一直在一个低水平的层次上不断循环和徘徊,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中国一直存在着消费等级与断层。在中国,自从西周开始,消费就有严明的等级观,如《周礼》中就不厌其烦地记载了详细的让人惊讶的各种消费品买卖的规定。虽然我们不能说《周礼》本身就是周代的产物,但我想它是基本反映当时的情况的。这可从延陵季子、叔向等末世贵族对当时现实的态度中略见一斑,不仅占主流的思想如此,如孔子曾为鲁国的君主不恰当的奖赐一位立了大功的贫民而耿耿于怀,即使是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回死了也不愿破例允许使用自己的车子为之出葬,甚

至在非主流的思想也是如此。他们对消费的适度调和也是以等级为前提的,如晏婴的“福利”论、商鞅的“定分”论、荀况的“明分”论等等都是如此。由于消费等级制的存在,使得长期以来中国的消费结构难以转移,使得为上层贵族提供消费品的技术很难为其他阶层所用,规模生产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而且由于人为的消费等级的规定和现实中生活水平的两极化,一般的百姓既无力也难以有动机去创新那些只有上层人物才能和才有权消费的商品。而且,由于上层可以相对免费地获得劳动力(如中国的官营工业中的工匠基本上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工奴),他们就可以不计成本地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因此,中国的技术就朝着畸形化方向发展,技术虽然令后世叹为观止,但不能普及和升级。我国目前的状况与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正是广大的中间消费层的“缺席”,使得本已成为国外必需品的东西,在中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遥不可及。

⑤关于产权的类型和效率关系的问题,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打算多作分析和讨论。

⑥权力租是指因拥有权力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如可以对更多的人发号施令,可以对更多人的工作拥有权力,拥有可以被提升的更多的机会,甚至可以贪污更多的国有资产等等,一般来说,拥有的投资规模越大,权力租也越大。

⑦这里,我想补充说明的是,我们20年来之所以会有如此瞩目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建国初期所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可参见《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内在逻辑》,《江海学刊》1999年12期。

⑧郝志功:“从高科技革命看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光明日报》1998年3月6日,第五版。

责任编辑:谭湛明

# 1978 年以来广东税收占 GDP 比重变化的特点分析与思考

□ 杨卫华<sup>1</sup> 高 含<sup>2</sup>

(1.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2.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硕士研究生,

[摘 要] 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是否合理, 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本文在对广东省 21 年来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进行统计分析基础上, 总结出该比重变化所呈现的特点, 进而从产业结构、经济政策、财政体制、税收征管、统计差异等几个方面剖析了产生变化的原因。最后提出了有关比重变动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 税收收入 GDP 税收占 GDP 比重 比重变化的特点, 思考

(中图分类号) 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5-0010-04

一定时期的税收收入与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定时期税收收入占同期 GDP 比重的高低, 反映了政府在国民经济总量分配中集中程度的大小, 反映了一国一定时期的总体税负(即宏观税负)水平; 税收占 GDP 比重是否合理, 关系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纳税人的负担, 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确定税收占 GDP 的合理比重, 对于保证政府财政收入, 发挥税收对经济的宏观调节作用, 促进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一、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税收占 GDP 比重的变化特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 使中国由此而揭开新的一页。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点和试验区, 随着改革开放, 尤其是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 税收占 GDP 的比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见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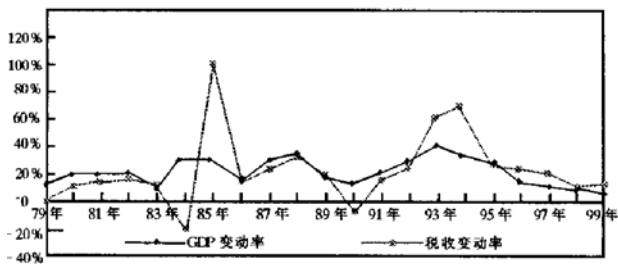
1978-1999 年广东税收占 GDP 比重变化表

项 年 目 份	国内生 产总值 GDP (亿元)	GDP 按可 比价比上 年递增 %	税收(T) 比上年 递增 %	T/GDP %
1978	185.85	-	-	13.87
1979	209.34	8.5	0.78	12.41
1980	249.65	16.6	6.70	11.10
1981	290.36	9.0	11.26	10.62
1982	339.92	12.0	12.58	10.21
1983	368.75	7.3	10.94	10.45
1984	458.74	15.6	-16.43	7.02
1985	577.38	18.0	102.70	11.30
1986	667.53	12.7	12.32	10.98
1987	846.69	19.6	20.96	10.47
1988	1155.37	15.8	34.42	10.31
1989	1381.39	7.2	21.70	10.50
1990	1559.03	11.6	-6.49	8.70
1991	1893.30	17.7	16.74	8.36
1992	2447.54	22.1	23.80	8.01
1993	3431.86	22.3	58.58	9.06
1994	4516.63	19.1	70.43	11.73
1995	5733.97	14.9	26.55	11.69
1996	6519.14	10.7	25.57	12.91
1997	7315.51	10.6	24.07	14.27
1998	7919.12	10.2	11.02	14.64
1999	8459.64	9.4	12.34	15.40



资料来源:1993-1999年《中国财政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其中1999年数字是根据《南方日报》2000年1月19日报道及有关统计资料中的国内税收收入数计算,不含海关代征流转税和证券交易印花税。

根据上表的数据,广东省21年GDP和税收变化的情况以及二者的变化关系,可从如下坐标图形看出:



从以上图和表可以看到,广东21年的GDP和税收的变化有以下特点:

1. 税收增长略快于GDP增长。1978年至1999年,广东省税收与GDP大体保持同步增长,GDP增长速度为19.94%;税收则增长了49.52倍,年平均递增20.54%,税收弹性系数为1.1123。税收随经济发展而增长,这说明经济是税收之本、税收之源。

2. 税收与GDP变动曲线均为波浪形。21年来广东GDP和税收的变动均形成波浪形曲线,这说明广东经济发展和税收收入波动比较大,发展不够平稳。尽管总的趋势是经济在发展,税收在增加,但在不同时期起伏较大。税收收入与GDP相比,波动幅度更大,如1984年比1983年下降了16.43%,而1985年却比1984年上升了102.70%。税收收入波动过大,必然妨碍正常的财政收入,影响政府的财政支出。

3. 税收占GDP的比重变化的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广东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相应有三种形态: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84年,税收占GDP比重呈不断下降的形态。这一时期税收占GDP的

比重逐年递减由1978年的13.87%降到1984年的7.02%,6年几乎下降了一半。第二阶段是1985年至1993年,税收占GDP的比重为相对平稳型。这9年税收占GDP的比重虽然也稍有下降,但幅度不大。这一时期税收占GDP的比重由1984年的7.02%上升到1985年的11.3%后,一直维持在8%至11%之间,基本平稳。第三阶段是1994年至1999年,税收占GDP比重为持续上升型。这6年税收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且基本表现为持续上升,税收增长的幅度明显快于经济增长的幅度,1999年比1993年GDP增长1.465倍,而税收则上升3.191倍,税收弹性系数为2.1782。三个阶段三种形态,大体反映了这一时期国家经济政策和分配体制的变化。

## 二、原因分析

经济效率的高低对税收占GDP的比重有直接的影响。发展经济,提高经济效率是提高税收占GDP比重的前提和基础。具体来说,影响广东税收占GDP比重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此,我们侧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 产业结构成长分析。由于各次产业提供的税收收入不同,产业结构对税收占GDP比重会造成直接的影响。第一产业以种植业为主,主要生产初级农产品,成本高,利润低,税收少,它在三次产业构成中所占的比重大,则税收占GDP的比重小;第二产业为工业和建筑业,也是提供税利的主要部门,如果第二产业的比重大,税收占GDP的比重也必然大;第三产业主要为流通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主要为流通业和服务业,也是纳税的主要部门,其所占比重如何,对税收占GDP比重也有较大影响。广东三次产业的构成,1990年为24.67:39.50:35.83,1998年发展为12.70:50.40:36.90,

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比重明显上升,第三产业相对稳定。因而税收占 GDP 的比重由 8.70% 上升到 14.64%。第二、三产业比重的增大,是提高税收占 GDP 比重的一个重要因素。

2. 经济政策的变化与调整。经济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的变化,对国家税收收入有较大影响。例如,1980 年起国家为了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在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的同时,实行税前还贷办法,仅此一项每年全国减收税款 10 亿元以上。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点和试验区,中央赋予广东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上实施税前还贷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比较早等等这一系列政策措施,都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从而影响税收占 GDP 的比重。

3. 财政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让广东、福建先走一步,为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积累经验,中央决定从 1980 年起,改变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对广东实行“大包干”的“划分收支,定额上缴,五年不变”的预算管理体制,以 1979 年财政收支预计数为基数,每年定额上交中央财政收入 10 亿元。1985 年起,继续实行“大包干”仍确定“五年不变”,但按照“划分税种”的统一规定,并考虑由于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上划中央,对包干数额作了适当调整。1988 年中央改变了对广东的大包干财政体制,改定额包干为递增包干,以 1987 年上缴数为基数,每年递增 9%,一定三年。1991 年国务院确定“八五”期间广东仍实行递增包干制度。1994 年全国统一财政管理体制。中央决定广东和全国一样,统一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包干制宣告结束。财政体制的变动,对广东税收占 GDP 的比重影响很大。1980 年起的“大包干”到 1984 年结束,1984 年广东各地为了

不增大第二轮的包干基数,税收收入明显下降,甚至出现了负增长。1985 年第二轮包干开始,税收收入比上年增长了 1 倍。1988 年由于调整了体制,新体制第一年,税收收入也增长较快。1993 年第三季度由于中央基本确定从 1994 年起实行分税制,并以 1993 年既得利益为基数实行税收返还,这直接导致了第四季度税收收入的大幅上升。1994 年后实行分税制,由于中央采用了收入达不到基数要扣减基数等政策,广东与其它省市一样,为了保住基数,保住既得利益和完成收入任务,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各地普遍加强了税收征管,使税收收入几年连续每年增长超 100 亿元。可见,财政体制对税收占 GDP 比重有较大的影响。

4. 税收征管模式的调整。在税源和税收制度已定的情况下,税收收入的多少,主要取决于税收征管的水平。1994 年税制改革后,税收工作重点转移到基层和征管上来,并很快改变了过去“一人进厂、各税统管”的模式,先后探索“征、管”分离或“征、管、查”分离的模式。目前广东和全国各地一样,推行“自行申报、集中登记、就地征收、重点稽查”的新税收征管模式以强化征管。征管模式的调整,加强了征管,减少了税款流失。加上统一和规范了税收减免,同时下大气力清理了欠税,1994 年以来广东税收收入明显增加,每年比上年增加 100 多亿元,从而使税收占 GDP 的比重由 1993 年的 9.06% 逐年上升,1998 年达 14.64%,比全国水平高三个多百分点,1999 年更进一步上升到 15.40%。

5. 统计差异的存在。税收占 GDP 的比重,在现实中还可能由于统计的原因引起变化。这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统计数字的精确度不同。税收收入是政

存征收的税款,是财政支出的前提和保证,精确度比较高,如果税收数字虚假就不可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加上税收收入是以税收缴款书和国库入库数统计的,其数据精确可靠。而 GDP 的统计一方面受部门分设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少数据是推算和估算出来的,加上统计准确与否一时难以确定,因而“水分”不可避免。二是在现说中人们往往忽视统计中的配比原则,存在中央企业的税款上交中央,而 GDP 却统计到地方的情况。这样“分子”到中央,“分母”进地方,自然影响地方税收占 GDP 的比重。显然,统计方法上的差异是造成广东税收占 GDP 比重变动的一个原因。

笔者认为,在一定的经济效率的基础上,如上造成广东税收占 GDP 比重起伏变化的主要因素,当苦,其它因素如物价的变动等,也可能对这一比重造成影响。

### 三、有关比重变动问题的思考

从广东改革开放 21 年税收占 GDP 的比重来看,总的来说是两头高中间低,这一变化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1. 关于比重合理的衡量标准。广东税收占 GDP 比重多少为合适,一直是财税理论界和政府部门探讨和关心的问题。有人提出 25% 比较适当,有人则认为不高于 20% 为宜,也有人说 15% - 18% 合适。这些看法大多根据经验数据得出,在理论上还未作出科学说明。我们认为,税收占 GDP 的比重,尽管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公共需要的程度不同,在量上会有差别,但就某一国家的某一时来看,客观上应该有一个合适的比例。至于在量上是 25%、20%,还是 18%、15%,有待进一步论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合适的比重应该一方面

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能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要。衡量税收占 GDP 比重是否合理,应以此为标准,不能简单地把现在的比重比过去高了还是低了,比外国大了还是小了作为合理或不合理的标准。在经济没有增长或增长很慢的条件下,税收占 GDP 的比重大幅上升,是通过“竭泽而渔”得来的,这种比重上升既不正常也不合理。因此,税收占 GDP 的比重是否合理需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看比重的高低。

2. 比重与纳税人负担。在一般条件下,税收占 GDP 比重比较高说明纳税人整体的税负比较重,反之则反。但在我国现阶段,税负水平不等于纳税人的负担水平。纳税人除了依法纳税外,还要交纳名目繁多的费,甚至费多于税,在费税错位的今天,税收占 GDP 比重下降,既不等于纳税人交纳税款的绝对量减少,也不等于纳税人的负担减轻,即使税收减少,税收占 GDP 比重下降,百姓也可能因缴费的增加而加重经济负担。最佳宏观税负以不损害经济机体的活力为前提,以市场微观主体的承受能力为依据,避免“竭泽而渔”。

3. 提高比重的途径。在目前税费征收还不够规范的情况下,假如需要提高税收占 GDP 的比重,也不能通过提高税率、增加税负的办法来实现。因为在现阶段,纳税人的税费负担已经不轻,一般认为已超过 GDP 的 25%,再增加税负,必然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现在提高税收占 GDP 比重的最好的途径:一是大力发展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提高经济效率,丰沛税源,增加税收收入。二是进一步推进费改税,通过规范税费征收,消费立税,减少收费,增加税收。在我国目前市场机制发育不充分、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

# 企业环境的变化趋势及其 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 李新家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610)

[摘要] 本文根据现实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论述了企业环境改变的一些主要趋势, 并根据管理学的基本原理, 简单地分析了企业行为与环境变化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 企业 环境 变化 趋势

[中图分类号] F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5-0014-06

环境的变化是引起企业组织和行为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 分析企业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技术的环境(PEST)及其变化, 对于企业迅速作出反应, 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论述企业外部经济环境的一些重大变化。

## 一、企业环境变化趋势

1.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极大地改变了企业生成和发展的环境。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表现在许多方面, 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中, 科技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生产门类变得越来越复杂, 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至产品市场等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改变了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传

统经济中, 货币资本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以后, 技术因素所起的作用被提到前面来了。市场和技术成为了现代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如果有了市场和技术, 货币资本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与此相联系的是, 不同性质的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传统经济中, 体力劳动所起的作用比较重要, 现在, 脑力劳动在价值生产和使用价值生产中都发挥着比体力劳动重要得多的作用。将来这种趋势还会不断加深。

科学技术引起了经济增长方式的革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虽然不能同时发生在所有行业 and 所有企业中, 但其方向基本明确。价值规律的客观作用决定了在生产中运用更多

情况下, 应把清费立税作为提高财政汲取能力, 进行财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通过清费立税, 完善和规范财税管理制度, 提高政府资金分配与运作的规范性、合理性和资金使用效益。三是进一步完善税制, 强化税收征管, 堵塞税收漏洞, 减少税收流失, 保证税收收入。我国现阶段税收总体征收率估计在 60% - 70% 左

右, 特别是增值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据有关专家测算, 增值税征收率每提高 1%, 税收占 GDP 的比重将增加 0.067%, 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率目前不足 50%, 该税是实现内涵征收的主要税种之一。

责任编辑: 谭湛明

的科技成果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实际上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生产中日益广泛应用的过程。

科学技术改变了企业生成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在美国的硅谷,明星般灿烂的一群高技术企业、风险资本家、支持型和服务型的基础结构、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人才、学术和研究机构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半自治而又互相支持的企业、社团和文化机构的动态的生态系统。这个环境已经孕育了一群具有关键意义的、全球性的、知识密集型企业,它们发明的产品和技术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这一切同传统经济中企业的环境是极不相同的。

## 2. 居民消费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科学技术及其所推动的整个生产力的发展,最直接的结果之一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信息消费成为了居民消费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消费结构的变化也表现在各项消费所占份额的排序上,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这表明市场需求结构的移动。生活水平提高以后,生活质量的改善不是要求市场供给在原有规模上扩大,而是要求供给的结构不断改变。改善生活质量的要求与维持基本生活的要求从根本上来讲是不相同的。生存需要是基本生活需要,享受和发展的需要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的满足是传统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做不到的,这迫使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体去研究和分析不断变化的需求结构,从而为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服务。

消费者对环境的要求日益提高,对有益健康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增加了,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越来越重视,使得企业把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当成了重要的竞争战略。对物质生活的需要基本满足后,消费者对文化生活和心理需要的满足变得突出。消费的多元化趋势表现得日益明显,消费品的使用寿命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它本身使用价值的特征,而是取决于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产品的市场寿命

周期缩短。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很难准确地把握消费变动的方向 and 市场需求变化的方向,投资决策和其他经济决策的难度提高了。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公共消费的关系得到了调整,过去作为公共消费和福利消费而应该由居民个人承担的已经逐步转变为居民个人消费,城市居民的住房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消费体制的这些变化,正在并且还将继续改变我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这要求企业行为与之相适应。

## 3. 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

改革开放以前,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计划经济体制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各种商品供不应求,市场性质为卖方市场。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经过 21 年的发展,我国的卖方市场初步转向买方市场。尽管目前的买方市场还只是在生产水平较低基础上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但买方市场的某些特点已经显现。

首先,一些商品供过于求,是买方市场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供过于求意味着部分商品在市场上难以实现,生产要素的使用效果受到影响,客观上要求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重新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投资决策的难度明显提高了。这显然与卖方市场的情况不同。

其次,在卖方市场逐步转变为买方市场的情况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整个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变化。消费者的决定作用提高,消费者主权表现得比较明显。在卖方市场情况下,生产者可以相对忽视消费者的要求,今天,消费者的选择对生产起着重要作用,这使得生产者不能不充分注意消费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变化。

再次,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在造成了买方市场的同时,也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提高除了引起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改变外,还会引起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来

源扩大,投资脱离消费的可能性扩大,使需求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4. 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强,经济全球化趋势加深。

我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强。这只是一方面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市场经济是全球市场经济。与世界市场脱节的孤立的市场经济体系在今天根本不可能成立。发展也是和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各国之间发生的竞争和冲突也明显地表现为争夺世界市场。全球市场成为了企业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如果一个企业的目光只是注视着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那是明显地有缺陷的。

市场之成为全球市场表现在许多方面。产品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大,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出现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有一定影响,但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贸易不断扩大的历史趋势。反而使金融国际化更加深入。货币资本借助于电子计算机网络更加方便地快速地在整个世界市场流动。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化联系在一起的是各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对资源配置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世界贸易组织(WTO)在促进经济全球化方面起着另一种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使各国的市场连接起来,而且,使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都按照某种相同的规则来运行,可以说,它从制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明显加强。欧元的发行标志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达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它使一定区域内市场一体化、经济体制一体化、经济调控的手段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企业行为必然要更多地表现为国际市场行为和全球市场行为,企业对生产经营的国际环境及其所起的作用也就

更加关注。

5. 信息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整个经济系统的生存和发展方式。

信息技术的发展主要由三个基本的因素构成。第一,国际互联网和其他全球性网络的应用日趋普及。第二,各种各样的信息系统渗入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制造商到产品分销商,从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的管理到整个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过程等等。管理者们利用信息系统于管理过程的结果是,缩短了决策者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的时间,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第三,计算机特别是便携式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使到企业、组织或个人方便地直接联系。这在改变整个经济活动方式的同时,提高了全社会的经济效益。

我们已经看到,用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来表示的信息系统的革命作用是与如下的基本特征相联系的:一是由信息共享带动了其他许多经济资源的共享,而且信息共享与其他资源的共享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二是电子计算机网络引起了一大批虚拟企业的产生,它们利用网络从事前所未有的虚拟经济活动,使国民经济的虚拟化程度提高。三是网络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所有中间环节受到了极其严峻的挑战,竞争和权利都向信息部门转移或倾斜。四是网络经济表现出非常明显的速度经济性的特征。五是信息网络系统增强了整个经济活动的协同性。

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的发展使整个市场机制发生了变化。市场机制成为了各种经济主体在电子计算机网络的帮助下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复杂关系。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改变了企业、政府和其他经济主体的动机和行为;改变了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政府和其他主体,经济主体与市场、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的相互关系;改变了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和市场竞争的领域与手段,也改变了各种生产要素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形成过程、价值结构和分配格局。



#### 6. 服务型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服务型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是人们熟知的事实,服务型经济的某些特征是企业作出反应时应特别重视的。首先,服务型经济与实物产品生产为主的经济相比,生产与消费的同质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在物质产品的生产中,有可能产生生产过剩的情况,而在服务经济中,服务作为产品在离开消费者的情况下,根本不能生产,因此,服务型产品本身是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但是,提供服务所必需的各种生产条件的生产仍然可以过剩,它们属于物质产品生产的范畴。其次,与上述特征相联系的是服务产品市场的区域性特征,由于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时同地进行的,在消费者不出现的情况下,服务产品也就不会有市场。第三,现代的新兴的服务产品可能更多地用于满足人们心理需要、精神需要和文化需要,满足消费者对信息产品的需要等等。而这些方面消费需要的满足和较低层次需要的满足相比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者对消费者的心理研究必须格外重视。第四,服务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直接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人员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强了。直接与消费者联系在一起的人对于服务产品的质量及其在市场上的形象具有直接决定的作用,因此,企业应该特别重视这样一些员工的招聘、培训和激励。

#### 7. 经济虚拟化程度提高。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两种经济虚拟化的现象。一种是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虚拟资本有关的经济虚拟化,一个社会经济体系中虚拟资本的扩大以及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高估,对充当商品的非劳动产品价格的高估,都会引起经济虚拟化程度的提高。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

曾经论述过一批货物或一笔资本经过反复或循环地买卖、抵押、借贷等等而造成虚拟资本的情况。马克思引用1848年的有关调查研究的报告中利物浦联合银行董事李斯特尔的话说,“某人在国外购买那种在英国兑付的汇票,并把它送到英国的一个商行。从这种汇票我们看不出它是开得适当还是不适当,是代表产品还是只代表风。”<sup>②</sup>“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sup>③</sup>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在今天仍能得到印证。

虚拟资本的增加会使商品价值和价格的关系、不同商品的比价关系发生改变。因此,或多或少与虚拟资本的增加有关系的是经济生活中商品价格的高估和比价关系的扭曲。进一步说,经济虚拟化如果说与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来交换有关系的话,那么它与非劳动产品的商品化关系更大。作为商品的非劳动产品包括土地、劳动力、各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的纸币、国债、各种各样的所有权、期权、信誉、甚至城市户口、市场关系等等。当然不能说它们与劳动绝对无关,但是很明显它们的价值和价格不能由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说明。这类商品又包括很多亚种。每一种的价值和价格的决定都不相同。事实上政治经济学还没有对它们的价值和价格决定说得很清楚,但是它们在市场上的交换却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各种商品的价格既反映出劳动产品充当的商品和非劳动产品充当的商品的比价关系,同时,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有可能背离其价值(如果它们有价值的话)而受比价关系的影响。比价关系一方面由所有劳动产品充当的商品的价值关系所决定,另一方面又由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决定,两大类商品满足人们需要的重要程度的次序所决定,一定的劳动生产力基础上所创造的商品价值和整个社

会的需求水平和需求结构的相互作用会形成一种客观的商品比价关系。如果市场上商品的价格背离这种比价关系而被高估,达到一定的程度,便会出现经济虚拟化的现象。仅仅从这个特定的方面来讲,经济虚拟化是整体上违反价值价格规律高估市场交换目标价格而造成的经济数量高估的一种现象。经济虚拟化内在地包含着各种商品比价关系的不合理而严重地扭曲各种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

市场交易活动,特别是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如果严重脱离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比如地产的炒卖、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大量成为投机行为,一批货物或一笔资金反复和循环地买卖、抵押和借贷等等,都会加强经济虚拟化的程度,加剧商品价格对价值和客观比价关系的背离。

另一种经济虚拟化是由电子计算机网络的应用引起的,其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一个企业可以通过电脑网络从事产品的技术开发与转让,从事各种生产要素和最终产品的市场销售活动,这些可以统称为电子商务。这样的企业可以把规模做得很大。但是,这些从事网上交易活动的企业可以不进行物质产品的生产和运输。因此,它们被称为虚拟企业。虚拟企业增加也表明国民经济虚拟化程度加深。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产品的生产和运输当然不可能虚拟化,而且这种虚拟经济的发展也会客观上受到物质产品和各种服务的实际生产和运输的发展的限制。但是,经济虚拟化的程度客观上也在加深。

上面所论及的第一种虚拟经济的历史比较长了,后面这种虚拟经济的历史还不长。而且这两种虚拟经济会产生怎样的互相影响,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二者互相影响是必然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后果之一很可能是进一步加速世界经济的虚拟化。不管这可能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机遇,也不管它可能引发什么样的危机,经济虚拟化已经成为了工商活动环境的一种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客观趋势。

8. 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共识。

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共识,它作为企业行为的环境因素值得重视的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目标,企业的行为不能违反这个根本目标。当企业的目标与整个人类社会的目标出现矛盾时,企业目标必须服从整体的目标。这对于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提高了。第二,协调发展实际上已成为了一种思维方式。对于企业来讲,其成功不是取决于某些单个的因素,而是取决于整个环境和组织的所有行为及其相互影响。企业内部的活动必须协调,从组织和管理的协调中获取经济效益,这向企业管理的理念、方法和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可持续发展这一命题本质上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的,不是针对某个企业的。但是企业实际上也有一个持续发展的问題。这涉及企业的动机和目标。第四,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涉及的是全局和战略上的问题,与此相联系的有整个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升级,有整个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涉及整个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因此,这一趋势实质上也引起企业环境的全方位变化。

## 二、企业行为与企业环境的关系

显然,不仅企业环境及其变化是极其复杂的,而且,企业环境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也是极其复杂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在大多数情况下,卓有成效的企业管理者必须对付外部环境,既要考虑到本企业之外的社会成员的需要和期望,也要考虑对外部环境中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和其他方面的有效利用。(2)企业所有的主管人员,都必须不同程度地考虑外部环境的各种因素和力量,他们不大能改变这些影响力量,而必须适应它们的变化。因此,他们必须对可能影响企业营运的外部力量加以确定、评估并作出反应。



(3)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制约性影响在国际管理和跨国经营时更为重要。(4)现在,管理人员是处在有着众多代表不同利益的有组织集团的多元化社会中进行管理的。每个集团对其他集团都有影响,但没有一个集团能发挥无限的威力。对于工商企业来说,在多元化社会中经营,具有几种含义:首先,企业的实力是由不同集团的平衡而得以保持的;其次,企业的利益能通过加入某些团体而得以实现;第三,企业要参与其他致力于改善社会环境的集团所进行的种种项目,例如为城区的更新而努力;第四,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不同集团间可能存在着冲突或协议;最后,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一个集团应充分意识到其他一些集团正在干什么。(5)企业与环境的关系还体现在企业的社会责任上。现在大多数管理者都认为企业是负有社会责任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认真地考虑企业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6)企业必须对环境的变化迅速甚至预先作出反应。由于不能指望企业对意料之外的事态发展迅速作出反应,所以企业必须有预测,不应坐视问题的发生而不事先作好面对问题的准备。孔茨在其《管理学》中指出:“预先反应是计划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部分”。

在研究企业行为与环境变化的相互关系时,管理者们还会注意到,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是相互联系的,外部环境提供的有利条件或不利条件,一般是相对于企业的内部条件而言的。相同的外部条件对某家企业而言可能是有利的,而对另一家企业则可能是不利的。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内部条件的改善而化外部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也可以由于内部条件恶化而变外部有利条件为不利条件。这就要求企业把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抓住机遇发挥自身优势或扭转劣势,或者通过创造优势来更好地把握机会和回避风险。如上说明,尽管企业必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但是企业的行为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化

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企业可以选择、改造、反作用于外部环境。

此外,企业环境的多方面变化,使企业环境成为了一个复杂的企业生态系统。在分析和研究环境变化对于企业组织和行为的影响时,考察的不应该是某些单个因素变化的作用,而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作用。而且,环境的变化与企业组织和行为的变化具有某种同一性,许多其他企业行为的变化,对于某个特定的企业而言,实际上也是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修正或调整企业行为时,组织行为学比较重视的是企业内部环境的变化和企业内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的修正和调整。实际上,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时,除了企业内个体和群体行为的调整,以及企业组织的变化之外,还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对内外环境变化所作的反应。

---

①②③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28-529、466、533-534页。

#### 主要参考文献:

1. Flexible Re-Cycling and High-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By Homa Bahrami and Stuart Evans.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vol. 37 No. 3 Spring 1995.
2. Pamela S. Lewis, Stephen H. Goodman, Patricia M. Fandt: Management: Challenges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Second Edition, Chapter 1.
3. 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案例《组织行为卷》,李剑锋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4. [美]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
5. 周健临主编《管理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责任编辑:谭湛明

# 国外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经验与借鉴

□ 钟庆才<sup>1</sup> 张炳申<sup>2</sup>

1.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博士, 广东 广州 510080  
2.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 西方各国, 特别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中, 绝大多数的大型企业受到严重打击, 而中小企业却呈现出极大的活力, 起到了大企业无法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 广东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 与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分不开的。为了使中小企业在新一轮的改革中增创新优势, 本文通过对国外扶持中小企业作国际比较, 从而进一步提出广东应采取的扶持措施。

**[关键词]**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国际比较 经验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20-04

## 一、国外扶持中小企业的绩效与比较

在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以后, 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大企业大财团纷纷破产, 政府极力支持大企业集团的做法受到了怀疑, 而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加速器和稳定器, 其作用日益明显。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意大利、日本、美国、德国支持中小企业的做法很有特色。

### 1. 建立全国性行政组织机制

日本设立中小企业厅, 隶属于通商产业省, 各级地方政府设有中小企业科, 从而形成了遍布全国的中小企业行政组织网。其主要任务是: 对中小企业的产品方向、技术开发、外筹资金、经营管理等给予指导和扶持; 向国会和政府反映中小企业的希望和要求, 使中小企业得到政府订货的机会; 调解中小企业与大

公司协作上的矛盾及其内部的劳资矛盾。

美国政府为扶持中小企业专门设立小企业管理局, 小企业管理局的主要任务为小企业发展提供管理、咨询服务、技术援助、信息服务; 为小企业贷款提供贷款担保, 进行金融协助; 为小企业开办商品展示会宣传产品, 帮助其拓宽贸易; 为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充当小企业的喉舌。美国专门为小企业提供各种信息咨询的 Internet 网的网址: [http \ www. sb2000. com](http://www.sb2000.com) 为小企业提供了各种详细的统计数据和投资参考意见。

意大利各级政府设立的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咨询机构、融资机构, 以及国家和大学为中小企业技术开发提供服务的科研机构, 例如伦巴第中小企业技术发展中心。行业组织及商会设立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 例如工业家联合会中的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批准号 79930400。广东省自然与科学基金项目, 批准号 990498。(本文属上述两项资助的研究课题的阶段成果之一)

中小企业委员会,地方上的中小企业雇主协会等等。

### 2. 普及中小企业诊断制度

日本政府为了帮助中小企业更好地成长与发展,在中小企业推行诊断制度。一般说来,诊断制度的程序如下:在生产经营中碰到问题的中小企业对诊断所提出的诊断请求;诊断师在接到企业的申请后,与企业主进行详谈或到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做出初步的分析;企业诊断师进行专家会诊后,对企业所存在问题提出改进办法及合理化建议;对企业的发展进行跟踪调查与服务。因为日本的诊断师都有政府颁发的资格证书认证,具有较高的经济知识、专业技术水平及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他们的意见往往能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产生良好的作用。这种制度使缺乏高级管理人才的中小企业能获得专家的管理与指导。

### 3. 金融税收扶持

日本先后设立“国民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投资育成公司”、“中小企业振兴事业团”、“特别地域贷款制度”等不同性质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中小企业外筹投资的主要来源就是这些金融机构,他们以低息贷款(4%—5%)贷给中小企业。法国政府将中小企业税收从30%减少到19%,并设专门机构为中小企业银行贷款给予担保,还同意适龄青年到中小企业的海外机构工作,可以不参军。德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先后在各种条例和规定中给中小企业提供了180种优惠。自1975年,政府开始推行所得税的政策;1988年起对周转额不超过2.5万马克的小企业降低所得税;1998年起对周转额不超过2.5万马克的小企业免征所得税。德国政府规定每年拨款2500—2700万马克为中小企业提供咨

询和信息服务,协助中小企业建立同欧共体企业的经济联系和参加各种展览会、洽谈会等。政府每年还拨款400万马克,由学会或企业协会牵头协助中小企业制定自己的生产策略,提高德国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法国政府规定,凡是企业提高产品、改进技术工艺和市场营销等提出首次咨询要求时,政府资助80%的咨询费用。

### 4. 帮助进行技术开发与创新

日本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00多个公立试验机构,为中小企业免费提供试验设备和技术指导;建立技术顾问制度,对中小企业产品地设计、试制到投产提供具体的技术指导;制订中小企业技术开发补助金制度,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给予资助。日本政府设有“中小企业情报中心”,各地区设有中小企业情报中心和综合指导所,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小企业情报体系。其任务是将国内外与中小企业有关的各种经济、技术、市场情报搜集整理,并将情报及时提供给中小企业。

美国国会1982年建立了中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鼓励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积极承担联邦政府研究和发展的任务。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规定,凡拟给联邦政府研究和发展的费用1亿美元以上的部门,都必须按一定比例向中小企业拨出经费。中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的经验,1993年为7亿美元,1995年为9亿美元,美国中小企业的人均创新是大企业的两倍。20世纪的光纤检测设备、心脏起搏器是小企业发明的。美国商务部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与州政府合作建立制造技术推广合作关系和技术推广中心,为改进制造技术的提供者与中小企业之间建立桥梁,并为中小企业提供工作技术、技术培训、帮助选择所用软件

和设备、工厂现场考察和分析及示范等服务。以帮助中小制造企业采用适用的现代技术。

德国政府非常支持开发新产品,近几年来,政府每年为中小企业拨款 2 亿马克用于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并鼓励中小企业参与政府 34 个工业部门所设立的 96 个研究中心。法国政府资助中小企业雇用科技和专业人才,企业主一旦选择并聘用了合适的专业人才,政府承担头一年 50% 的聘用费用(一般需要 20 万法郎)。

#### 5. 重视对中小企业的立法工作

各国政府,尤其是发达国家为了保证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都非常重视对中小企业的立法工作。法国政府在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上措施得力、政策完备,注重解决中小企业的实际经营困难,并通过法律、政策的形式明确固定,从而使中小企业始终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法国政府制定的《企业法》产生了自己的影响。德国中小企业有着悠久的历史,1869 年就制定了《帝国企业法》,尔后有《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法》、《反托拉斯法》等,对中小企业发展起着一定的保证作用。意大利政府法律明确规定,支持中小企业组成联营企业或联营公司,鼓励这些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种服务。日本 1957 年颁布的组织《关于中小企业团体的法律》。

## 二、关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小企业在提供就业机会、活跃市场、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广东改革开放 20 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小企业的贡献功不可没。然而,近几年来广东中小企业却出现了大面积亏损,1998 年全省工业企业中中、小企业亏损额分别达 48.43 亿

元和 116.26 亿元。在 1999 年全省 1/3 的亏损企业中,中小企业占了 60% - 80%。许多中小企业之所以出现经营滑坡,主要原因在中小企业势单力薄、竞争力差、管理水平相对落后、适应能力差等。集中体现在人员素质不高、融资困难、社会成本负担太重、环境不够宽松、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等。

针对如上实际,借鉴国外的经验,我们认为应对中小企业发展采取如下扶持措施:

1. 正确认识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健全市场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平等的竞争条件。政府在政策和管理上应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一视同仁。要努力健全各种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垄断和保护。在获得土地、贷款、人力等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等方面,不论企业大小,都有均等机会,各类企业在同等条件下,相互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各政府部门应当避免多头管理,注意纠正乱收费、乱摊派和乱罚款现象,实行公共工程公开招标等各种公开制度,促进竞争,消除垄断。

2. 成立专门扶持中小企业的管理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永久性服务。笔者认为,我们应从省一级政府到各地方设立统一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专门机构,负责扶持中小企业的全盘事务,这一点可借鉴美国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办法。借鉴美国的经验,可以在省级政府下设一个独立的机构专门从事为中小企业服务和咨询的工作。我国经贸委最近已成立中小企业司,广州市已成立中小企业管理办公室,负责中小企业改革和发展事务,这是可喜的一步。但扶持中小企业是一项长久性的事,并不是一时性的任务。当前,重要的是抓紧设置机构,机构

设置好以后立即着手根据企业需要从事各项扶持工作。同时,借鉴国外经验,成立中小企业辅导机构,专门负责对中小企业的辅导工作,其主要职能包括:设置中小企业培训中心,为中小企业培训各种人才,提高中小企业人员素质;协助中小企业建立现代化财务会计制度以及健全其他各项管理制度;协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困难;协助中小企业增强科研开发能力,实现技术升级;协助中小企业拓展市场。

3. 促进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借鉴国外的中小企业鼓励建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体系的做法,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进行合理的生产经营分工与协作,中小企业为大企业提供零配件,大企业则主要从事最终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这样做可以使双方实现优势互补,共同获利,使中小企业较好地解决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问题,而大企业则能解决好生产配套,从而节约成本的问题。

4. 加强中小企业的制度建设。中小企业的发展,其制度安排和创新异常重要,特别是产权制度。有效的产权制度的基本标志之一是产权的交易规范是否法制化。同时,产权交易规范的法律化也是抑制国家机构对产权干扰的有效手段。应鼓励各种不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与创新,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有限合伙制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由于它赋予经营管理者以无限经营责任和一般投资者以有限经营责任,所以在强化经营者的责任意识、限

定一般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更加容易作出投资决策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点。美国硅谷地区一大批中小高科技企业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制度安排。我国已经于1997年出台了《合伙企业法》,从而为这种制度安排提供了法律保障,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中小企业的改组,应当鼓励采用这种组织形式。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制定诸如《中小企业基本法》等有关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严重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我们建议政府成立中小企业委员会,联合相关部门从最基础的法律层面上解决中小企业的有关问题。根据我国当前的立法情况,应在已经出台的《公司法》和《乡镇企业法》基础上,抓紧研究制定《中小企业基本法》和《中小企业振兴法》,以确定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发展中小企业的基本方针,规范中小企业的登记管理,保护中小企业的各项权益,规定中小企业管理机构法律地位,明确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

#### 主要参考文献:

1. 唐菊裳著,《国外小企业》,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10月;
2. 项润、高媛编著,《中小企业竞争与发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9年9月;
3. (日)木会玄六,《中小企业经营战略》,中国经济出版社;
4. 《中国中小企业》杂志,1998年1-12期;
5. 李玉潭著,《日美欧中小企业理论与政策》,吉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谭湛明

# 西部大开发： 着眼于 21 世纪的重大战略部署

□ 谢明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000)

[摘要]文章简要地回顾了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沿革与基本轨迹。不同于以往,新时期的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面向 21 世纪,着眼长远与整体协调发展。文章重点分析了中央国务院最近作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 西部大开发 历史 战略意义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24-04

1999 年 11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并强调这是中央总揽全局、面向新世纪所作出的重大决策。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 10 个省、市、自治区。之后不久,朱镕基总理在新加坡发表演说时进一步强调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性,把它同 20 年前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战略相提并论,列为解决中国经济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以及着眼 21 世纪长远发展的三大战略部署之一。

## 一、西部地区大开发的历史回溯

在历史上,中国西部地区呈现的是一派荒凉、贫穷、落后的图景:“春风不度玉门关”,兵荒马乱,民不聊生……。1949 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国家采取了一些重大举措和实行了一系列重要政策,使西部地区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开始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大规模基本建设,把一大批项目放在中西部地区,在苏联援建的 156 项重点工程(实际施工 150 项)中,放在西北的有 40 项、西南 11 项,形成了

以兰州、西安、成都等城市为依托的新工业基地。同时,修建了成渝、宝成、天兰、兰新铁路和青藏、康藏线等公路,又在西部地区组织了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从而初步改变了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面貌。

60 年代和 70 年代,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建设了一批钢铁、机械、煤炭及原材料工业基地。特别是在 1965 年至 70 年代末以备战为目的的“大三线”建设期间,把东部沿海地区一大批老企业向西部转移,基本建设投资也大幅度向西部倾斜,累计共投资 2000 亿元,建设了 10 条总长 8000 多公里的铁路干线、近 2000 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和 45 个重大产品的专业科研、生产基地,以及 30 多个各具特色的工业城市,初步奠定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基础。

80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逐步加快,西部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在 80 年代,国家对以前形成的部分工业基地进行调整、改造、扩建和提高;对三线企业,有的从军工生产转为民品生产,有的关停、合并、迁移,有的与东部地区



搞横向联合。与此同时,为建立能源后备基地,加快了长江、黄河上游水电开发,塔里木盆地石油开发,陕北煤炭、天然气开发及贵州、西北煤炭开发,修建了成渝、贵昆、襄渝等电气化铁路等。

90年代,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由东向西、由南向北全方位推进,《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明确提出“积极扶持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缩小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形势对加快西部开发十分有利。从90年代初开始,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突出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并把1/3的重点建设项目摆在西部。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铁路、通讯、水电、石油化工、煤炭、有色金属等领域,如兰新复线工程、南昆铁路、西(安)宝(鸡)高速公路、西兰乌光缆通信干线、二滩水电站、西藏羊湖电站、神府东胜煤田、新疆独山子乙烯工程、云南兰坪铅锌矿等。1999年12月全线开通运营的南疆铁路,东起吐鲁蕃,西起喀什,全长1451公里,南疆与多个国家接壤,粮、棉产量占新疆总产量的49%和66%,铁路经过的塔里木盆地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是中国石油工业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因此南疆铁路的通车,对于沟通南疆与北疆及内地的联系,加快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对外开放,加快各族群众脱贫致富的步伐,进一步扩大物资交流,增进民族团结,巩固国防,均具有重大意义。①

## 二、着眼21世纪长远发展的西部大开发

区别于以往的西部开发,去年底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是面向21世纪,着眼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加快西部地区的大开发,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1. 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条件差异大,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由

于客观条件及历史原因,东、中、西部一直存在着较大差距。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地区经济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东部地区利用自身较好的经济基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国家的特殊政策,迅速发展;西部地区也抓住改革开放的有利时机,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国家的支援,取得较快的发展。但是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可能是同步的,东部经济不会因其存量绝对值大而放慢增长速度,相反,由于其经济实力雄厚、技术水平高、竞争能力强,以及工业化开始早、发展快和先期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产品附加值高,将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保持高速增长,从而继续扩大与中西部的差距。这样,一方面,要求国家加大支持中西部地区开发的力度,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缓解差距扩大的趋势,促进全国地区之间经济的平衡、协调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东部地区已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人民生活已达到或接近小康水平(据统计,1998年东部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5省市,人口与西部地区大体相当,但国内生产总值已高出西部地区1.5倍多),有可能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西部、中部地区加快发展。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对中国经济建设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一个大局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率先发展起来;另一个大局是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时,要拿出更多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现在,这方面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基本成熟了。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根据中国政府1999年4月公布的数据,中国贫困人口尚有4200万人。但如按照国

际贫困线的标准,中国贫困人口达到 1.2 亿人。这些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在西部交通不便的生态环境上游地段,多是干旱、高寒山区,脱贫难度大,脱了贫又返贫的比重也大。只有加快开发,并通过东部地区的带动与帮助,使经济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增长,才能尽快脱贫和最大限度地减少返贫率。这样再经过一段较长时间,东西部的经济差距才能逐渐缩小,人民生活才会逐渐实现共同富裕。

2. 促进生产力合理布局和资源优化配置。目前中国的生产力布局是“东密西稀”,60%的国民生产总值集中于人口密、土地少的东部,而人口稀、土地多的西部只占 13% 左右。东部百业俱举,“城市病”日益严重,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有限的土地已不堪重负,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已趋极限,劳动成本也已大幅攀升,而西部却闲置着大量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相对贫困在加深,这种不合理的布局,加上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国内市场约束趋紧的格局,都迫切要求加快西部开发,并且有计划地把一般工业和部分经济活动从东部转移到西部,使东部地区的各种矛盾得以缓解,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把主要力量用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附加值高、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外向型产业;西部地区则可以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开发资源,发展深度加工,发展其他产业和社会事业。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地区低水平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缺乏合理分工的问题。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贡献率目前只有 25% 左右,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将仍然以发展资源消耗型产业为主。据预测,到 2010 年,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砂、锰砂、铬铁矿等将出现较大缺口,比如原油的缺口率将从 2000 年的

19.2% 上升到 50.9%,而东部大多数老油田如大庆油田等早已达到增产极限。缓解这个矛盾的出路,只能立足国内,而不能主要依靠进口,这就必须把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重点转向西部。②从农业看,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程度低,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的耕地又因工业化、城市化的扩展而日益减少,③为满足人口逐年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包括深入挖掘西部的农业发展潜力。

3. 有助于把扩大内部需求的方针落到实处,同时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扩大内需成为克服当前经济生活中实际困难的当务之急。同时为了 21 世纪的长远发展,中国必须长期实行扩大内需的方针。扩大内需,要加大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相对而言,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下,东部地区的投资、消费需求正逐渐趋于饱和和疲弱,相当一部分劳动力、资金、技术需要寻找出路,而西部地区的投资、消费需求则蕴藏着巨大的潜力。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工业相对落后、亟待发展;居民收入和购买力较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占全国的 13%,与占全国 22.8% 的人口规模很不相称;④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和民族习惯差别很大,对各种效能、品种、档次的商品都有需求;据预测,到 2010 年,西部地区人口将从现在的 2.85 亿增加到 3.2 亿;⑤可见,西部地区是中国一个有待深入开发的非常巨大的潜在市场。另一方面,由于西部地区资源丰富,有一定经济技术基础,土地和劳动成本又低,可以为东部地区各种生产要素创造新的发展空间,为全国剩余劳动力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4. 对搞好全国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西部地区占



全国国土面积一半以上,是中国两大河流即长江、黄河的发源地和上中游地区,是全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它的生态环境状况如何对位于中下游的中部、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影响极大。长期以来,西部地区水土大量流失,使可耕地减少,种植放牧条件恶化,又使两大河流河床淤浅、河水混浊,严重影响了通航和流域居民的生活、生产用水。西部地区的干旱、沙漠化的发展,也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基本生活条件。整治生态环境必须以振兴经济为基础,这就必须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把发展经济同整治环境密切结合起来,同时推进。

5. 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边防安全。贫穷和落后是民族矛盾、社会动乱之源。地区差距过大、贫富过于悬殊,会引发种种事端和犯罪行为。随着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经济会迅速发展起来,人民生活会不断得到改善,文化、教育、科技水平会不断提高,这就为民族团结和睦、社会长治久安,为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少数民族和宗教问题进行颠覆分裂活动的阴谋,奠定重要基础。而西部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又是建设和巩固边防的基本条件。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了,社会稳定和边防安全了,中国保持大局稳定和顺利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才有可靠的保证。

### 三、几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综合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总要求、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西部地区的基本区情,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必须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把西部大开发同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结合起来。既要突出加快西部地区开发这一重点,又要与全国的发展相

协调与平衡,防止盲目性和脱离实际;既要抓紧行动,又要有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和通盘考虑,防止草率从事。

(2)把经济建设同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防安全结合起来。坚持把稳定放在首位,对各种社会矛盾要妥善化解,防止激化。

(3)把国家支持同自力更生结合起来。国家和东部较发达的省区市要多方面加大对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支持力度。国家要实行更加灵活、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政策,以充分调动西部地区本身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外省区市和外商参与西部地区大开发的积极性。西部地区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防止等待救济、无所作为、一味伸手的“等、靠、要”思想。

(4)把经济发展同整治环境结合起来,二者并重,统筹规划,同步进行。西部地区开发的基本特征首先应是保护性开发。保护好整治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是全国的根本利益。一定要反对为了短期发展而盲目开发和随意破坏环境的做法,做到经济越发展、环境越改善。特别是要把水资源的保护、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放在突出位置。

①引自中国《人民日报》1999年12月7日。

②⑤参见林兆木等主编:《跨世纪的发展思路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

③据《1997年中国土地年鉴》,1996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1.19亩,仅为世界人均耕地的1/4。7个东南沿海省份的耕地质量较好,但人均不足1亩,而且耕地大幅度减少。福建、广东、浙江等的人均耕地已减少至0.6亩以下。

④根据《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算出。

# 新股发行的市场定价模型初探

□ 江达明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当今中国证券市场上,新股计划发行后价格与市场预期价格的严重背离现象十分突出。这对稳定金融秩序、促进证券市场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本文提出了以市场定价取代计划价格的思考,并以灰色关联方法构造一个估价模型。

**[关键词]**证券市场 新股发行 市场定价 估价模型 灰色关联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28-02

## 一、新股计划发行价格的失效

我国上市公司发行股票,不是按照市场价格发行,而是按照主管部门制定的计划价格发行,如规定A股市盈率不超过15倍,B股不超过8倍。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计划价格是失效的。牛市中(甚至在平衡市中),这一计划价格远低于市场预期价格,造成大量申购资金蜂拥而至,超倍认购。在熊市中,该计划价格又远高于市场预期价格,造成新股发行困难,导致发行失败。总之,计划发行后价格与市场预期价格发生严重背离。这种背离对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带来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市场无风险暴利造成金融秩序混乱。中国除1994-1995年短暂熊市外,历年的新股发行都处于暴利水平或无风险水平,吸引各种社会资金以合法或非法途径流入一级市场,既导致认购市场上的供求失衡,又扰乱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和金融秩序,直接的后果是刺激机构用大大高于同业拆借利率水平的利率向商业银行短期拆借资金,认购新股,进行短期套利炒作,同时进一步吸引流通领域的资金滞留在国债回购市场,既抬高

了国债发行成本,又造成资金从生产领域向非生产领域流动的恶性循环。

2. 客观上为股市投机创造了较大的空间,加剧了证券市场的动荡。我国A股上市交易一般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百分之百的换手率,说明认购者不是长期投资者,而是以牟取短期暴利为目的的投机者。由于发行价格远低于市场预期价格,实际上等同于企业资产的贱卖,贱卖的最大受益人就是新股认购中签者。新股发行愈多,给投机创造的机会就愈多,投机资金愈发雄厚,又进一步加剧证券市场的动荡,间接地中小投资者的投资心态也在市场环境的影响下发生扭曲,降低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无从着手,健康的证券市场无法建立。

## 二、市场价格取代计划价格的思考

健康的股市中,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是由基于对其内在价值判断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这种供求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股票内在价值的判断,其二是市场真实的购买力。某企业股票的内在价值是由该企业各种财务指标综合反映出来的,但同时,每一财务指标对判别股票价值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即对股

票价值的贡献率是不同的。如何依据上市企业各项财务指标来确定该股票的内在价值就成为关键。当然在此我们假定企业的各种财务指标是准确的,基本反映了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而不是不顾事实做出来的。股票内在价值并不是股票的发行价格,还必须参考到市场购买力状况以及平均申购成本而加以修正。

市场购买力状况可用同类企业股票在二级市场上平均交易价格来预估。本文提出一个思路,即先构造一个估价模型:

$$P = \beta_0 + \beta_1 C_1 + \beta_2 C_2 + \dots + \beta_M C_M$$

$\beta_0$ : 常数,  $\beta_1, \beta_2, \dots, \beta_M$ : 权重(贡献率)

$C_1, C_2, \dots, C_M$  为各项财务指标,如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利润增长率等。

这可以用实证的方法采用灰色关联模型构造出来。

对拟发行的新股,其各项财务指标是已知的,就可以用上述模型来预估其未来二级市场的预期价格  $\bar{P}$ 。

$$\bar{P} = \beta_0 + \beta_1 \bar{C}_1 + \beta_2 \bar{C}_2 + \dots + \beta_M \bar{C}_M$$

$$\beta_1 + \beta_2 + \dots + \beta_M = 1$$

$$\text{申购成本: } P' = Q \times r \times t$$

$$\text{申购获利: } T = KQ\bar{P}/P_0 - Q \times r \times t - QK$$

$$\text{即: } P_0 = K\bar{P}/(T/Q + K + r \times t)$$

其中:  $P_0$  为新股发行价格,  $r$  为利率,  $t$  为申购平均资金占用时间,  $K$  为平均中签率,  $Q$  为申购资金总量

对拟发行的新股,参考过去新股发行的情况可获取中签率  $K$ , 平均资金占

用时间  $t$ , 利率水平  $r$ 。  $T/Q$  即为平均申购收益率, 假设平均申购收益率为零, 则有:  $P_0' = K\bar{P}/(K + r \times t)$ 。

$P_0'$  可视为该股票的核心价值, 上式可约化为:  $P_0' = \bar{P} - \frac{\bar{P} \times r \times t}{(K + r \times t)}$ , 即该股票的核心价值低于市场预期价格, 这一核心价值可称为确定新股发行价值的基准, 我们不妨把它称为基准价格。

如果上市公司为尽快达到发行上市的目的, 可考虑适当加大申购收益率  $T/Q$ , 此时的价格  $P_0 < P_0'$ , 反之亦反。

我们建议主管部门不妨以  $P_0$  价为今后指导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指导价格, 允许发行价格在  $P_0$  上下一定幅度内浮动, 如 30 - 50%, 由此而确定的发行价格比人为规定市盈率为 15 倍更加科学, 反映了市场需求的因素。

### 三、结语

中国股市作为体制改革的产物, 继承了传统计划经济的三个缺陷, 即计划价格、计划分配、产权不清。对于后两个缺陷, 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 较难在短期改变, 因为这涉及到制度上的诸多方面。但是否可以考虑先突破计划价格这一缺口, 由计划价格向指导价格转变, 让企业、券商、投资者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这样既可以消除计划价格带来的缺陷, 又可以活跃和繁荣一级市场, 从一级市场开始降低中国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 为构造一个良性循环的证券市场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这是值得政府有关管理机构及证券从业人士探索的问题。

责任编辑: 韦 前 湛 明

# 试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原则

□ 屠春友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博士生、副教授,北京 100091)

[摘要] 本文探讨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原则的依据及其要求,说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已成为现实的趋势,并期望在我国能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为主干,由多角度、多层次、相互联系交叉并互为补充的多样化统一的方法论体系。

[关键词] 方法论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多元化原则

[中图分类号] C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5-0030-05

## 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原则的依据

方法多元化作为一个一般的方法论原则,具有多方面的依据:

第一,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黑格尔在谈到哲学方法的特点时说,方法必须和自己对象的内容本性相符合,因为“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方法与其对象和内容并无不同”,①方法“只能是在科学认识中运动着的内容的本性,同时,正是内容这种自己的反思,才建立并产生内容的规定本身。”②黑格尔关于方法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但实际上已经意识到,研究方法、思维方法是有客观原型或客观根据的,这种原型或根据就是事物自身的逻辑和事物自身的规律性。思维方法实际上只是移入、内化为人们头脑中的事物的客观规律,是由事物的客观规律转化而来的主体思维活动的规则、手段和工具,因此,事物的客观规律是思维方法的客观基础。思维方法不是纯粹主观的规定,它本身具有客观性。

(1)不同的研究对象要求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正因为不同的研究对象具有

不同的“内容本性”,也即具有自己特殊的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因而也就具有不同于他物的特殊的性质、关系和发展规律,这一系列“特殊”必然要求研究方法上的“特殊”,造成研究方法的不同和差异。如黑格尔就曾指出,由于逻辑学的对象是绝对观念按其内在必然性的运动和发展,因此逻辑学既不能采用自然科学家的观察实验方法,也不能像斯宾诺莎和笛卡尔那样借用数学方法,也不能像费希特和耶可比那样采用直观方法,逻辑学的方法只能是对绝对观念按其内在必然性运动过程的描述,逻辑学的体系应当表现出这种按必然性而发展的过程,整个逻辑范畴之间的推演也应当体现出这种内在必然性。同样,我们不能把黑格尔的这种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特殊对象决定社会学必须使用自己特殊的方法,并且,每一门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这样就会在宏观上形成研究方法多元化的情况。

(2)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必然造成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社会科学的对象是社会历史过程,它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包括有经济、政

治、科技、军事、文化、民族、习俗、社会心理等因素或者子系统,并且,这些因素或者子系统还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每一个因素或子系统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由此产生出一些特定的研究方法。此外,上述因素或子系统又不是平行发展的,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于是就成为多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象,产生出各种类型的交叉学科的方法。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只有凭借各种各样的具体研究方法,才能揭示出社会历史过程及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第二,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差异性。黑格尔指出:“方法就是逻辑内容的内在自我运动的形式之觉察”。<sup>③</sup>也就是说,对象的内容本性、客观规律要成为思维方法、研究方法,首先要为研究主体所认识和把握,并且要经历由客观到主观的转化、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建构的过程。客观规律只提供了形成思维方法的客观基础,但不能提供人们思维 and 实际活动的现成规则和手段。客观规律只有内化于人的头脑中,并转化为思维活动的内在规律,它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才变成人们思考问题的规则和手段。所以,思维方法尽管有其客观基础,但绝不是纯客观的东西,而有其主观的因素、主观的特征。由于研究主体在政治立场、利益需要、知识水平、研究能力、兴趣爱好、情感意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无疑会影响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会造成对于思维方法的不同选择和应用,形成不同的思维视角和研究风格,从而形成不同的学风和流派,造成宏观上方法多元化的情形。如培根重视归纳法,而笛卡尔、斯宾诺莎则推崇演绎法;罗素强调逻辑和理性,而叔本华、尼采则提倡直觉和直观,突出强调反理性主义方法的作用;贝塔朗菲对事物善于

作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思考,而实证主义者却更强调分析的实证的研究。可见,研究方法在研究者个人之间的显著差异就形成研究者各自不同的学风,在研究者群体之间的显著差异就导致不同的流派。我国目前在这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状况实际上反映着我国学术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贫乏与单一,而这一状况的改变,有赖于研究者的学术个性的充分弘扬,有赖于方法多元化局面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活动的多样性。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sup>④</sup>黑格尔也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sup>⑤</sup>也就是说,方法是主体从事实践活动、达到预定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桥或船。实践是有对象有目的的,不同的实践活动的不同对象和目的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方法,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就必然要求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等等的多元化。

第四,方法相对于理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任何科学方法都以规律性的知识即理论为依据,它们是由一定的理论所决定和派生的,实际上只是理论的实际应用。但是,方法并不就是理论本身,而是理论的最精华部分的沉淀物。这是因为,理论具有抽象性、系统性,而方法则是由一系列程序、格式、规则所构成的,其中程序是实施方法的过程的规定,它表示着方法所经过的路径和环节;格式是由一个程序过渡到另一个程序的中介和桥梁;规则是方法中诸要素的法约,

它规定着方法的适用范围,从总体上全面规范着主体行为。因此,方法具有鲜明的具体性、操作性和规范性,它是理论经过沉淀、变形、具体化的结果。在理论和方法之间还有一个很长的具体化、中介化的过程,这就使得方法对于理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说,理论的正确不一定就能保证方法的正确,理论的错误也不一定导致方法的错误。如结构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学说,当然有其错误、荒谬之处。前西德学者黑尔曼德就曾指出:“结构主义是一种形式主义体系,它对历史完全抱着一种漠视的态度。它反对一切进化和发展,而追求所谓‘封闭体系’和‘结构’,这种历史观自动地避开任何质变和革新。结构主义认为没有因果性,没有目的,而是不断循环的无意义过程。”<sup>⑥</sup>结构主义的错误在于片面强调和夸大了事物的结构方面或环节,而忽视了其他的方面或环节。但是,结构主义一旦沉淀、转化为结构方法之后,这一方法就不再因此是错误的了,错误的只是结构主义对这一方法的解释。只要我们把这一方法从结构主义者的错误解释中剥离出来,则它就可以被任何承认下述观点的非结构主义者所采用和接受,因为,任何事物都具有内在的结构,并且正是这种内在结构决定着该事物的功能。如结构方法已经在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认识论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成功的应用,并且正在向其他的社会科学领域渗透和扩散。所以,正是由于方法对于理论具有相对独立性,我们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各种具体的科学方法本身是中性的,不存在截然不同的这个流派的方法或那个流派的方法。在原则上,一切方法皆可为我所用。

## 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原则的要求

方法多元化原则的核心是,无论何种方法,只要它能够导致科学研究活动和变革现实活动的成功,它就是正确的有效的方法,就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具体说它有以下要求:

第一,在每一门学科的研究活动中,要努力挖掘、提炼、创造适合本学科特殊需要的方法,才能在宏观上形成方法多元化的局面。或者是挖掘、创造出适合需要的特殊方法,或者是强调、突出某种已有方法的特定方面,或者是把某种一般方法在本学科领域内具体化、特殊化。例如,社会学是以人类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目的在于揭示其发展过程和规律。因此社会学就特别注意实证化分析的调查研究技术,发展了一整套周密细致的社会调查和定量分析方法,比如观察法、问卷测试法、访问调查法、文献研究法、比较法、统计法等等。

第二,在从事某一具体课题的研究活动时,要注意从各个不同领域中移植、借用方法,并使其具体化和特殊化,才能在微观上造成方法多元化的局面。方法多元化,首先并且主要是指某一门学科内和某一具体研究课题的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即可以把许多不同的方法用来实现、达到同一个研究目标。没有这一点,方法多元化原则实际上就失去了对于人们的科学研究活动和变革现实活动的指导意义。在从事一项具体的研究活动时,可利用四个层次的方法:首先是最普遍的哲学方法,并且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如矛盾分析法、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阶级分析法等,是在一切科学研究活动领域内普遍适用的;其次是一般科学方法,如系统方法、控制方法、信息方法、结构功能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各种逻辑推理方法等,为一切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所通用;再次是各门具体学科中适用的方法,如数学和现代逻辑中的公理化、形式化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普遍适用的观察方法、实验方法、假说方法,在各门比较学科中适用的历史比较法,在社会学领域特别适用的问卷调查法、访谈研究法等;第四层次是适用于某种特定目的的技术性方法,如统计预测中的德尔菲法,领导科学中的抓典型方法、搞试点方法等。所有这种方法原则上都可以为我所用,为某个具体的研究课题和研究目标服务。并且在具体研究工作中还可以创造出适应特定需要的方法。这样,才能在具体研究工作中真正形成多样化的局面。

第三,对于国外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行之有效方法,我们也要注意借鉴和吸收。邓小平就曾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因此,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sup>⑦</sup>国外社会科学之所以较先进,原因之一是应用了新的研究方法。二战以后,外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获得了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已经不再进行概略的描述,而是发展了一套比较精确的数学模式;第二,社会科学各领域在方法上互相借鉴,不受约束;第三,随着社会科学诸学科的日趋成熟,它们都从静态模式向动态模式发展;第四,各学科的发展日趋成熟使上述模式越来越复杂。”<sup>⑧</sup>

### 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已成为现实的趋势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反

思,以致形成了“方法论热”,方法多元化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大趋势。

这一大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国外的各种方法论思潮的涌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了方法的大撞击、大裂变和重新组合。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方法论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我们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法。例如经济决定论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历史过程分析法等,仍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

第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交叉学科与横断学科的方法已经并且仍在向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内渗透和扩散。目前,这些方法正在向哲学社会科学的具体研究领域——历史学、文学、心理学、美学、经济学、管理学、认识论、领导科学等内应用,探讨它们在这些具体领域的适用范围、方式、程度与困难,将它们在这些特定的领域内具体化和特殊化。例如,这些方法在历史研究领域就被人们具体化为系统网络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中介分析法、结构功能分析法、模式分析法、无序有序过程分析法等。

第三,各个不同的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的相互移植与借用。我国目前已经涌现了许多不同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新兴学科,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学科的诞生是研究方法的相互移植与借用的结果。因为一种方法就是一种视角,从新的视角可以发现新的问题,从而可以大大扩大思维空间,促使新思想、新学科的产生。如从心理学这一特殊的视角、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去研究一些特殊的问题,就产生了一大批应用性很强的新兴学科,像社会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审美心理学、消费心理学、广告心理学、人际关系心理学等。特别是决策思维学、领导科学、组

织行为学等,更是大量地引进、移植、消化、吸收了其他许多学科的方法。

第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已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共识。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已经意识到,用某种单一的方法是难以成功地研究复杂的对象的,而必须使用多样化的方法才能奏效。例如,心理学工作者在谈到心理学研究方法时说:“对于同一种心理学过程,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用单一方法进行研究,而倾向于运用多种方法。单一方法往往由于方法本身的缺陷、局限或者在使用中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增加结果的误差,从而降低研究的效度。许多情况下,单一方法只能取得一小部分信息,而大部分信息却被忽视和遗漏,这样就难以作出全面准确的结论,甚至失去研究的意义。正因如此,人们日益注重于运用多种方法。例如,对于某一课题先后或同时采用谈话法、观察法、问卷法和实验法进行研究,并对由不同方法取得的结果进行相互验证和比较,提高研究的可靠性。”<sup>⑨</sup>这种情况绝不是只出现于心理学领域,而是出现在历史学、经济学、管理科学、决策科学等许多领域之中。

在方法多元化已成为一种现实趋势的今天,应该特别强调:第一,在引进、移植、借用方法时,要注重理解、把握这些方法的灵魂与实质,真正把这些方法作为研究的工具和手段,而不应该把它们当成一种现成的模式往研究对象上套。现在我们有许多论文和专著里面,充满了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使用了许许多多新方法,但其研究结论除了用新的概念、术语装饰一下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深刻与新颖的东西。这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理解新的方法的结果。第二,任何方法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都有其特殊的作用,离开这些范围和条件,

夸大其作用,就会导致研究活动的失败。因此,在引进、移植、借用方法时,要特别注意它们的适用范围与条件,把它们用到该用的地方,而不能无限制地夸大它们的作用。例如,非理性方法确实在文学创作、科学研究活动中起重要作用,因为人不仅有理性,而且有情感、意志、心理等非理性的因素。但是,如果把非理性方法夸大到绝对的地步,使一切文学都成为非理性文学,那么文学就会与欣赏者之间产生距离,这种文学就会被冷落。第三,在引进、移植、借用方法时,要特别注意结合本学科的特点将其具体化、特殊化。例如,如何在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文学等的研究中运用系统方法?如何在这些领域内运用数学方法和使用电子计算机?这是需要花费许多创造性的劳动才能将其具体化和特殊化的。我们相信,经过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为主干、由多角度、多层次、相互联系交叉并互为补充的多样化统一的方法论体系必将建立。

①②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7、4页。

③转引自张世英:《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5页。

⑤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8页。

⑥转引自王守昌、车铭洲:《现代西方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6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1页。

⑧G·博恩施泰特:《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⑨王重鸣:《心理学研究方法发展的几个新特点》,《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责任编辑:罗 苹



# 对“要素—结构—功能”

## 立体化的拓展

——与坚毅先生商酌

□王习胜

(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讲师,北京 100871)

**[摘要]**文章赞同将“要素—结构—功能”上升为唯物辩证法范畴,但又认为,必须对这组范畴的辩证立体关系及其抽象的理论过程作充分的揭示和说明,唯如此,才能使这组唯物辩证法的范畴真正为人们所理解和掌握,并发挥出它的应有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要素 结构 功能 拓展

(中图分类号)B0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35-04

读坚毅先生的《要素——结构——功能:唯物辩证法范畴立体化之八》一文(载《学术研究》1999年第7期,以下简称“坚文”),有同感:“要素——结构——功能”是我们认识对象中所普遍存在的内容,把它们上升为唯物辩证法范畴,确能起到“使我们在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去认识世界、分析事物、解决问题时更加卓有成效”。而略感不足的是:一、所谓唯物辩证法范畴立体化,在坚文中则只能看出其线性的平面化,其立体性并未充分展现;二、坚文没有进一步强调要素、结构与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使这组辩证范畴自身的辩证性受到了影响;三、坚文在倡导将这组范畴上升为哲学的唯物辩证法范畴时,过多地是对现实具体的抽象,而没有对抽象过程作理论上的说明。因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对这组范畴的立体化问题,再作一些拓展工作。

### 1、“要素——结构——功能”的辩证立体关系

要素、结构和功能之间,存在着一种

辩证的立体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从要素和结构角度可以得到充分的透视。

#### 1.1、要素与结构、功能

##### 1.1.1、要素是独立的

要素之所以可以看成是独立的,是因为要素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结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从“自相似结构”理论去理解。混沌理论研究揭示,系统的局部与整体具有“自相似的结构”,把局部放大则与整体相似。这种“自相似”说明,结构中的要素也都有向结构整体或其中某一部分发展的可能(克隆研究的成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说,作为一种潜在的结构,要素是可以独立地存在着的。另一方面,从事物的结构层次上理解。只要我们想象一下:物质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的,而分子和原子又都是一种结构、也是独立的,这个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把要素从结构中“分离、割裂”出来,看成是独立的,是理解“要素——结构——功能”立体关系的前提。

##### 1.1.2、要素在结构中的角色与功能

独立的要素被强联系到结构之中,就有了受规范和约束的一面。在结构中,要素之间既相互联系、作用于其他要素,又被其他要素联系着、作用着;既在其他要素的约束、规范下工作,又约束、规范着其他要素,以适合结构整体;既执行着结构分配给的职能,又承传着来自结构的规范。这样,要素在结构中就承担着双重角色,发挥着双重功能——当要素发挥着自身功能作用时,结构便显示出整体性的功能;当要素发挥着对其他要素的约束、规范作用时,又使结构具有了整合性的功能。

### 1.1.3、要素对结构、功能的基础性作用

#### 1.1.3.1、要素与结构的生成

自组织理论认为,结构的约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规则,只能来源于结构内部,即组成结构的各要素。

结构中的各要素并不都具有同等地位的。在要素的互相作用中,往往是少数几个要素或一个要素起支配作用,而多数要素则是处于伴随地位或从属地位的。这种情况,不论是太阳系中太阳对诸行星,还是“权力金字塔”中领导对其他社会成员,都是普遍存在的。由于少数几个甚至单个要素能够对其他要素形成一种约束,于是,一种结构的状态便开始产生。哈肯在协同学中把它称之为役使原则(Slaving Principle),即当役使原则出现时,要素的自由度减少、结构产生;当役使原则失效时,要素间自由度增大,就会导致结构的解体。

#### 1.1.3.2、要素的质量与结构、功能

要素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结构与功能。但是,要素质量高,并非就一定出现优化的结构和正效应的功能。它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 1.1.3.3、要素之变与结构、功能之变

有关要素量的增减,势必会引起结构的某种量的变化,如组成结构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程度、各要素之间的距离、结构存在发展的规模、有序程度(空间的量)、结构的持续程度(时间的量)的变化等。但是,由于要素自身是独立的,所以,它本身也可以承受、容纳一定的变化而不会立即反应到结构中,使结构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如果要要素量的变化达到了一定阈值,那么,结构的质变就不可避免。结构质变,必然会引起功能的变化。同时,随着要素生命力终结的来临,结构的质与量,以及其功能也会随之降低、减弱,直到消失。

### 1.2、结构与要素、功能

#### 1.2.1、结构与要素的三个功能

##### 1.2.1.1、结构对要素的制约功能

结构是一种规则,规则是一种约束,约束就是一种强联系。不同的约束,就有不同的结构。在被约束的状态下,要素自身的自由度就必然较小,反之,则自由度较大。作为一种约束,结构要排除要素的外界干扰而维持其自身准稳态存在的特性,否则,结构将难以稳定和存在。为此,要素在被强联系到结构之中时,常会出现质量自损(也可以理解为个性自损)的情况。例如,通过核聚变反应所形成的氦原子核,其总质量(4.001505 原子质量单位)就小于组成它的2个质子和2个中子单独存在的质量之和(4.031882 原子质量单位),两者之差为0.030377 原子质量单位。这是由于质子和中子形成氦核时在聚变反应过程中发生质量亏损所造成的。这一部分质量之所以要转化成能量形式而损失掉,就是因为氦核结构为了保持一定的整体稳定性而对要素所作的约束。

##### 1.2.1.2、结构对要素的衍生功能

约束的另一面是整合。结构的整合

功能使结构往往能产生出要素个体所不具有的特性。例如,原子相互作用形成分子时,通过原子轨道的杂化作用,使能量相近的原子轨道组合成分子轨道,从而使原子的一部分性质消失,转化成分子的性质,即分子结构的整体性质。就具体的水分子而言,其中,氢原子不再具有它单独存在时那种可燃烧的性质,氧原子也不再具有它单独存在的那种可助燃的性质,而水分子却具有氢和氧单独存在时所不具有的性质。如沸点 $100^{\circ}\text{C}$ ,冰点 $0^{\circ}\text{C}$ ,且具有可燃性,通常用作灭火剂。由于任何一个要素都不可能具有结构整体那样大的质量,因此,从衍生的角度来说,的确存在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情况。

#### 1.2.1.3、结构对要素的支持功能

结构整体功能的实现,可以充分实现各要素的功能。换句话说,结构在其整体功能实现的情况,在其允许的自由度内,让各要素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在特殊情况下,要素如果不获得结构的这种支持功能,缺少或是脱离了结构的话,就会失去它存在的价值,成为废品。

#### 1.2.2、结构是功能的决定因素

结构对功能的决定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说明。

##### 1.2.2.1、要素相同,结构不同,功能不同

功能是结构作用的表现,结构决定着功能。相同的要素,不同的结构,结构的整体特性和整体功能就会有所不同。如6个氢原子和1个氧原子与2个碳原子,既可以形成乙醇分子( $\text{CH}_3\text{CH}_2\text{OH}$ )结构,又可形成甲醚分子( $\text{CH}_3\text{OCH}_3$ )结构。乙醇的沸点为 $78.3^{\circ}\text{C}$ ,极易溶于水,具有杀菌消毒或作燃料的功能;而甲醚的沸点却低得很,为 $-25^{\circ}\text{C}$ ,不溶于水,可用作溶剂、萃取剂、致冷剂等,功能

完全不同。

##### 1.2.2.2、要素不同,结构相近,功能相近

在自然现象中,有时只要结构形式相似,即使成分、数量不同,亦可具有相似的性质。如:锂、钠、钾、铷、铯、铊等,其原子序数分别为3、11、19、37、55、87,即电子、质子数不相同,但其外层电子都是1个,结构相似,则功能(性质)雷同。氟、氯、溴、碘、砷的原子序数为9、17、35、53、85,但其外层电子均为7个,其性质亦相近。

##### 1.2.2.3、要素变化,结构未变,功能不变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如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等,从普通成员到领导要员都有更换,但企业和国家一般仍能正常运转。

##### 1.2.2.4、结构的三种功能形态

结构是否优化、稳定、有序,决定了结构有不同的功能形态。大致地说有三类:一类是有助于结构整体性能形成和强化的效应。例如,2个劳动力相互联系,密切协作,发生正交互作用,其劳动效益为: $1+1>2$ ;二类是阻碍、干扰、破坏而不利于整体性能形成和强化的效应。例如,2个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相互扯皮,内耗增大,发生负交互作用,则劳动效益就大为减弱,甚至无劳动效益,即 $1+1<2$ ,或 $=0$ ,或 $=$ 负数。三类是对整体性能无作用的中性效益。又如在社会现象中,2个劳动力单干、相互之间空间大,彼此互不联系,发生零交互作用,此时劳动效益就为: $1+1=2$ 。

第一类是互补效应,第二类是离散效应。研究“要素——结构——功能”辩证立体关系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试图把离散效应的作用降到最低程度,而把互补效应的作用提到最高程度,充分发挥

互补效应的作用,达到最优化的整体效果。

## 2、“要素——结构——功能”辩证立体关系的理论阐释

我们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是生成“要素——结构——功能”之间辩证立体及动态关系的根源。

首先,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包含和制约关系,决定了要素与结构的构成和规范的关系。一方面,矛盾的特殊性包含着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把不同矛盾区别开来,使矛盾呈现出多样性。于是,具体事物及其内部诸要素(具体事物本身也可以看作是要素)一个个相对独立;普遍性又把不同矛盾联系起来,使多样性的矛盾又呈现出某种共同性。普遍性使一个个独立的要素受到约束而生成了结构。对于较为复杂的矛盾体系而言,它的特殊性中包含的并不只是一种普遍性,而是包含着多方面、多层次的普遍性,因此,同一要素可能会以多种角色加入到不同的结构之中,从而形成了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立体交织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矛盾的普遍性又制约着特殊性,因此,结构对要素又有一定的制约力,使之保持相对稳定。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这种包含和制约关系,使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构成了最为基础的、立体交织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关系。

其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产生与被产生的关系,决定了要素与结构之间的进化和退化的演变关系。一方面,普遍性矛盾在自身运动过程中,不断产生各种特殊矛盾,而各种特殊性矛盾又不断把普遍性矛盾承继下来,并包含在自身之中,使矛盾的种类不断分化、不断增多。另一方面,各种特殊性之间

又彼此相互联结,构成了新的矛盾体系,使矛盾体系不断复化,越来越复杂。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不断产生和被产生,不断分化和复分,使要素的“自相似结构”性和“自组织”性活跃起来,从而使新结构不断产生,旧结构不断解体,整个世界始终处于一种不断的结构演化状态之中。

恩格斯说:“自然界中的普遍性的形式就是规律”,①列宁说:规律就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②由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衍生出的要素、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就呈现这样的规律性:从整个世界到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从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到其中的每个事物,从每个事物到它内部的各个要素,都有自身的结构。其中,任何一个结构既是由若干更小结构组成的,又是更大结构的组成部分。各结构之间,既有相互区别的各自特殊性,又有彼此一致的普遍性;大结构为构成它的小结构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基础,小结构在大结构中存在和发展的同时,又不断冲击大结构,力图代替大结构;从小结构到大结构,其稳定性趋强,因而事物的总体性质和功能保持相对稳定,其要素具有某种可测性。反之,从大结构到小结构,其变动性趋强,在微观世界,有的基本粒子之间的结构关系是瞬息即变的。整个世界就是由这些既层层包含相对稳定、又层层制约不断变化的无数的“要素——结构”所构成的庞大的结构群,不同的结构具有着不同的功能,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表象世界。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4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1页。

责任编辑:罗 苹

# 马克思历史环境观初探

□姚小林<sup>1</sup> 徐阳鸿<sup>2</sup>

- (1. 广东商学院法律系, 广东 广州 510320)  
 (2. 广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广东 广州 510070)

**[摘要]**本文就马克思提出过、但理论界未作系统研究的历史环境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首先指出,所谓历史环境就是人类社会具体历史条件的总称,并从它的内容、功能及其主体三个方面作了具体的阐述。其次,从历史的角度,简要地勾勒了历史环境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总体发展态势,即从自然的地域历史环境到社会的世界历史环境的演变过程。最后,从历史环境与人类社会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入手,探讨了历史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统一性与多样性辩证规律的影响,特别是为此而阐发了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和世界历史思想的重要理论根据。

**[关键词]**历史环境 马克思历史观 社会机体 马克思历史环境观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39-06

## 一

什么是历史环境?简单地说,它是人类社会具体历史条件的总称。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理解:

1、从内容上来说,历史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sup>①</sup>它既包括人类自身所固有的自然生理条件,也包括人类社会所拥有的地理环境条件,即恩格斯所说的“地理基础”。<sup>②</sup>

社会环境是影响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各类社会条件的总称。它的全部内涵,恩格斯曾给予过深刻的揭示。他说,人类社会在不断创新和发展,但“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sup>③</sup>可

见,社会环境的内容既有起决定性历史作用的经济条件,这主要是指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也包括起非决定性历史作用的非经济条件,即社会的政治文化条件,亦即人们常指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和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

文化环境即恩格斯所说的“传统”,它属于社会环境的特殊内容。它是针对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而言的,是不同民族和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中积淀而形成的独特社会文化氛围。它体现着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文价值观和社会道德标准。

2、从功能上说,历史环境可分为起内因作用的内部环境和起外因作用的外在环境

交往是历史主体与历史环境之间发生关系和作用的普遍中介和实现形式。可以说,任何历史主体都处于交往关系所构筑的内外历史环境的共同作用和影

响之下。内部环境是同一历史主体内部的各种要素间发生关系和作用,并以历史积淀的形式所形成的历史环境条件之和,它形成历史主体存在和发展的内部原因。“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④马克思认为,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类个体及其社会,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⑤当然,内部环境并不仅仅指同一历史主体所继承的物质结果,它还应包括恩格斯所说的“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等精神结果。

外在环境是不同历史主体之间在外在交往中所形成的历史环境条件之和,即马克思所说的“国际关系”、恩格斯所说的“外部环境”、普列汉诺夫所说的“社会历史环境”等方面的内容。在研究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尤其是亚细亚生产关系时,中年马克思曾提请人们注意“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⑥他所说的“国际关系”,即各个民族和国家在相互的外部交往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普列汉诺夫认为,“因为差不多每个社会都受到邻接社会的影响,所以可以说,对于每个社会都有一定的影响其发展的社会历史环境。”⑦很明显,普列汉诺夫所提到的“社会历史环境”,是指特定社会外部所面临的国际关系状况。因为在他看来,国际关系同地理环境一样,对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而且,这种“国际间的关系对这种发展也许有更大的影响”。⑧国际关系概念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既有经济的内容,也有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恩格斯认为,经济关系是就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

(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而言的,这其中除了“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各种经济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历史沿袭的先前各经济形式发展的“残余”外,还应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⑨为此,恩格斯比较全面地阐释了经济关系概念的内涵。他认为,经济关系既应指特定社会形式所包含的各种内部经济条件,也应指它所面临的特定“外部环境”,即围绕该社会形式的外部经济关系状况。这种外部的经济关系状况也内含着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基础”,它与各种内部的经济关系一起,汇合而成影响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最终决定性条件。

3、从主体方面说,历史环境可分为个体的历史环境和群体的历史环境

个体的历史环境是特指人类个体所面临的历史环境,是个人在一定历史时期所面临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生产方式一定阶段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状况构成个体历史环境的本质内容。群体的历史环境是特指社会群体(即国家、民族、政党、国际组织等)所面临的历史环境,可进一步区分为总体的历史环境和具体的历史环境。总体的历史环境是指同一历史时期不同人类社会群体所共同面临的历史环境,其历史特质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方式;而具体的历史环境,则是指各个人类社会群体在不同时期自身所面临的历史环境,它有内外之分。

## 二

1、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历史观即马克思历史环境观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历史观即马克思历史环境观,即关于人类及其社会与自身历史环境之间辩证关系和发展规律的学说。因此,二者在本质上存在着统一的关系。当然,马克思历史环境



观并不能完全取代马克思历史观,因为后者比前者有着更丰富的内容,它为前者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支持。

按照马克思历史观,历史环境不过是人类及其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从本质上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sup>⑩</sup>随着历史的前进和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加强,历史环境也必然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存在形式,从而赋予人类社会以不同的时代内容和历史特质。历史环境不仅是个实践的交往范畴,也是个历史范畴。如果说“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那么,“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sup>⑪</sup>

## 2、从自然的地域历史环境到社会的世界历史环境的历史考察

在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的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社会尚处于自然经济社会状态。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自然的地域性地理环境的强有力影响,不同人类社会群体的实践交往局限于极为狭小的自然空间,它们被孤立地分散于地球上的各个大陆,其各自的社会历史发展轨迹是平行的,相互间缺乏实质性的经济交往和国际合作。只是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世界历史环境才开始拉开它的序幕。世界历史环境是关于人类社会步入世界历史时代具体历史条件的总称,它是人类社会在商品经济社会所共同具有的总体历史环境。它以现代化的社会生产方式(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本质内容,其标志是:现代生产力和普遍中介化的世界交往的出现。它形成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现代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市场。诚如马克思所言,“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sup>⑫</sup>它的最终历史

形成,则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生产力由民族性走向世界性的产物,是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最终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是现代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sup>⑬</sup>

随着世界历史环境的生成,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快,人类社会步入商品经济时代。不但发达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就是那些欠发达的东方落后民族,也因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而被卷入到世界市场的普遍竞争行列中来,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命运第一次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历史环境下直接生成的共产主义成为人类社会未来共同的历史发展取向。与此同时,由于不同人类社会群体的具体历史环境特点,它们在世界历史环境下可供选择的具体社会发展道路又是多重的。这些多重的历史发展选择,在总的方面要受到世界历史环境下人类社会总体历史发展趋势的制约。如果说在自然经济社会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受制于自然的地域历史环境,从而东西方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而其自身的内部历史环境因素有着决定性的历史作用;那么,在商品经济社会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在总的方面要受制于世界历史环境,从而东西方面临着共同的历史发展选择,而那些尚处于非商品经济社会的欠发达民族和国家(特别是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既要受到来自自身传统因素方面历史环境的影响,又要受到世界历史环境从其外部所强加给它的影响,这种来自外部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这些正是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思想和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根本原因所在。有人撰文指出,历史环境与生产力、生产关系应同视为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sup>⑭</sup>这是有道理的。

### 三

历史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问题也

是马克思历史观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它反映的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主客体关系和辩证运动发展规律。一方面,历史环境是人类社会自身的产物,人类的社会实践能不断地超越历史界限,从而创造出新的历史环境;另一方面,人类的社会实践和整个社会机体的发展演变要受制于既定的历史环境,历史环境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使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呈现出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辩证运动规律。

### 1、历史环境与人类主体

首先,历史环境规定着人类的活动范围和存在性质,人类的历史实践要受制于既定的历史环境。现实中的每个人首先应该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sup>⑮</sup>活动着的个人,首先是在既定物质的历史环境下从事活动的个人。既定的历史环境不但给人类个体提供现成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物质的生活条件规定并影响着人类个体所在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状况;而且赋予人类个体进一步活动的历史内容和发展特质,如马克思所言,“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sup>⑯</sup>

其次,历史环境毕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人类能够凭借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不断地超越历史界限,而建构出新的历史环境。历史环境创造人,人也创造着历史环境。其中,人是“生产者”,历史环境是生产的“条件”,实践是人与历史环境间的活动中介和基础。<sup>⑰</sup>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变迁,人类生活其中的历史环境不断地变更着社会内容,从而形成新的社会历史环境条件。

### 2、历史环境与社会主体

历史环境与社会主体的关系和作

用,主要反映在历史环境与不同社会机体的关系和作用上。

#### (1)历史环境与社会机体的构成

人类社会本来是复杂的社会有机体,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sup>⑱</sup>社会有机体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结构体系,生产方式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物质的社会关系形成的是该社会机体的经济结构,而政治的、思想文化的等等精神的社会关系则形成了该社会机体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这些不同的社会主体结构之间存在着辩证的互动关系和相互作用。按照马克思历史观,不同时期社会机体的经济关系和结构形成的是不同社会主体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前者作为后者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条件,是社会机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历史根源,是促成人类社会呈现统一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原因。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经济关系构成了一条贯穿于历史发展始终、并唯一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红线”。<sup>⑲</sup>

对特定的社会机体来说,它和外在的历史环境构成了其特有的主客体关系。实际上,外在的自然历史环境内含于外在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经济关系就包括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地理基础”。在人类社会,外在的自然历史环境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社会的历史环境因素发生影响和作用,在世界历史环境下更是如此。普列汉诺夫指出,“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发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sup>⑳</sup>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人变成了会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人对地理环境的依赖从直接的变成间接的了。地理环境经过社会环境影响于人。”<sup>㉑</sup>而在某一时期,和特定社会机体同时并存的其他社会机体间必然产生一定的社会交往关系,它们形成

该社会机体外在的社会历史环境,即国际关系状况。这种外在的社会历史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该社会机体的存在和发展,影响着它的内部社会构成。具体说来,外在的社会历史环境,不仅影响到该社会机体的生产力水平和发展状况,也会对该社会机体的经济关系和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因此,普列汉诺夫认为,经济关系处于生产力的直接影响之下,“同样亦在包围特定社会的历史环境的影响之下永久地变动着。”<sup>②</sup>当然,这种历史环境“亦影响到它的意识形态的发展。”<sup>③</sup>这种外在的社会历史环境对特定的社会机体所产生的全面影响,与该社会机体的内部社会历史环境的作用相结合,势必推动该社会机体的发展演变,并形成人类社会向多样性发展的重要原因。马克思总结道:“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sup>④</sup>也就是说,不同的人类社会群体,即使存在相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状况,但是由于其外在历史环境的不同,而极可能走上不同的社会发展轨道,因而有着不同的历史结局。这是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思想和发展理论的重要根据所在。

## (2) 历史环境与社会机体的演变

人类社会是复杂的社会有机体,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复杂社会有机体,是“一个能够发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sup>⑤</sup>在经济的历史“红线”贯彻其中的历史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这个活的社会有机体从一种较低的社会形态演进到另一种较高的社会形态,使人类社会呈现出有序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并形成统一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为此,马克思提出了有名的三大社会形态说和五种社会形态说。即人类社

会在历史上依次体现为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或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序列。

然而,历史发展的逻辑表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一般遵循三大社会形态依次演进,但并不必然地按照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由于受多重历史环境因素的影响,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也必然体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开始关注历史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多样性选择的影响。马克思的研究表明,前资本主义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并不是单一的所有制形式,而是存在着亚细亚的、古代的、斯拉夫人的、日耳曼的等多重形式。至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将选择什么样的公社所有制形式,这“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的天然性质,部分地取决于部落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实际上以所有者的资格对待土地”,而“这一点本身又取决于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受物理条件决定的土壤开发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引起迁移、引起历史事件等等的变动。”<sup>⑥</sup>这些不同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在后来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终于发展成为各自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从而使不同的人类社会群体走上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普列汉诺夫显然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马克思的意思,他说,“产生于原始共产主义废墟上的私有财产的性质,由于每个特定社会周围的历史环境的影响而大不相同。”<sup>⑦</sup>他认为,人类社会本来是有着同一个出发点的,因为各自不同的自然生存条件和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到处相同的民族生活方式让位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雅典社会的制度不同于中国的制度,西方的经济发展进程根本不同于东方的经济发展进程。”<sup>⑧</sup>

在研究近代印度、中国和俄国,特别

是俄国的历史命运时,马克思进一步完善了他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并明确地提出了历史环境因素影响人类社会多样性的思想。他指出,即使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也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sup>②</sup>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历史环境,不同历史环境下的历史主体必然也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命运。为此,马克思要求人们在考察人类社会的具体历史发展进程时,应充分考虑到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具体历史环境特点。在考察近代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时,他就特别关注过俄国社会在当时世界历史环境下的独特历史命运。他认为,由于当时俄国社会独一无二的历史环境特点,即俄国农村公社与发达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sup>③</sup>它的历史命运实质上是双重的历史选择,全面的资本主义化或向共产主义过渡都是可能的,一切取决于俄国社会具体历史环境的发展演变。这在实质上反映了现代生产力的客观发展要求,总的方面要受制于当时已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向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对当时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俄国社会的深刻分析所作出的科学设想。至于俄国社会能否现实地跨越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能否从历史的可能性走向现实的必然性,也还有待于历史主体社会实践活动的适时参与。特定的历史环境为特定社会的历史发展能提供特定的历史机遇,即特定的历史发展可能性,但它的最终历史实现还有待于能承担历史使命的历史主体对历史机遇的及时把握和有效利用。这就是晚年马克思重提历史环境问题所给予我们的重要方法论启示,它仍然体现出实践

是马克思历史环境观的基石。

一句话,任何社会都存在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特定的历史环境条件,不仅能造就人类社会的统一历史发展进程,实质上也给人类的“社会发展过程加上了异常有力的多样性的因素”,从而使人类社会呈现出多样化的历史发展势头。<sup>④</sup>

①④⑤⑩⑫⑬⑮⑰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文1995年版,第67、88、92、59、276、114、72、99~100、143页。

②③⑨⑯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文1995年版,第731、696、731、643、732页。

⑥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文1995年版,第27、25页。

⑦②②③⑦⑩普列汉诺夫著:《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文三联版,第158、195、217、159、159、158~159页。

⑧《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中文三联版,第204页。

⑭参见赵立坤文:《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启示》,《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2期。

⑲《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中文三联版,第170页。

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2页。

㉑《资本论》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4页。

㉓《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中文三联版,第44页。

㉔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文1995年版,第342、769~770页。

责任编辑:罗 苹

# 意义与指称

□ 苟志效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教授, 广东 广州 510053)

**[摘要]**在语言哲学的研究中,指称论是一种流传甚广的意义理论。意义与指称的关系相当复杂,它不仅涉及指称与实在的关系问题,而且还涉及意义与实在的关系问题。强调指称与意义一致性的人往往将指称理论等同于意义理论,主张所谓的意义指称论;强调指称与意义有区别的人则反对在名称与对象之间寻求一一对应的关系,主张意义的非指称论。尽管如此,意义与指称关系的复杂性并不是指称论和非指称论所能完全概括的,应该加以综合性地思考,才有可能依照它们关系的本来面目认识它们的联系与区别。

**[关键词]**指称 意义 赋意 符号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45-04

在语言哲学的研究中,指称论是流传甚广、影响极大的一种意义理论。因而,关于指称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了语言哲学长期争论不息的焦点问题之一。

意义与指称的关系十分复杂,它不仅涉及意义与指称本身的关系,而且还涉及意义与实在、指称与实在的关系问题。由于意义、指称、实在三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着许多内在的区别与联系,所以便为各种各样的片面化理解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强调指称和意义一致性的人往往将指称等同于意义、将指称论等同于意义理论。如唯理智主义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罗素以及早期维特根斯坦等人,都持这种观点。柏拉图认定,命名不过是模仿的艺术。他说:“我们讨论的一切名称,都是用于说明事物的本性”。<sup>①</sup>柏拉图认为,命名者所作的事情,就是把一切事物都还原为文字和符号,再给它们加上名称和指号。柏拉图还认为,人们应该按照自然的本性来给事物命名,而不能随心所欲。一个字母、一个名词或一个语句,只要保留了你在描述的事物的主要特征,就可以说

这个事物被命名和被描述了。从柏拉图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所关心的是语词为什么能够、如何才能指称实在的问题。这正是现代语言学家、分析哲学家着力最大、议论最多,也最难取得一致的意义与指称的关系问题。因此,柏拉图的论述,无疑是现代指称论的最早萌芽。柏拉图的这些论述,带有他思想发展早期的那种突出的唯理智主义色彩。柏拉图早期的唯理智主义认识论,主张认识的对象和目的,都是达到和个别结合在一起的一般本质。认为一般的名称如美、善等,不能脱离个别事物而存在。柏拉图思想发展早期这种主张经过个别认识一般的认识方法,使他的指称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启发性。现代哲学家罗素同样认定,名称只有通过指示或指称外部世界中的事物或事实才能获得意义。在1905年发表著名论文《论指称》中,罗素首次详尽论述了他的后来被称为“摹状词理论”的学说。罗素认为,名称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的对象。他指出,名称只不过是个简单的符号,它直接指称作为其意义的个体。显而易见,罗素的意义论,实质上



也是指称论的。强调指称与意义有区别的思想家则反对在名称与对象之间寻求对应关系,主张指称与意义应分别加以考察。如弗雷格就曾率先区分了指称和意义的不同,指出人们用不同的名称可以描述同一个对象,但这些名称却可以拥有相同的意义。这就是指称和意义的差异。弗雷格断言:“指号,它的意义和它的指称之间的正常联系是这样的:与某个指号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意义,与特定的意义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指称,而与一个特定的指称相对应的可能不只是只有一个指号。”<sup>②</sup>奎因也曾就此提出过相同的见解。后来,莫里斯则应用弗雷格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所指谓”和“所指示”这一对概念,对意义与指称的区别作了更为精确仔细的划分。弗雷格及其继承者的思想是十分高明的。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指称论既是西方语言哲学中影响很大的一种意义理论,同时又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策源地之一。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起直到罗素和早期的维特根斯坦,许多哲学家都坚持认为,一个名称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示或所指称的对象,长期以来一直将意义与指称混为一谈。直到弗雷格发现这一错误,并明确提出意义与指称的区分后,这一问题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分歧与争论。公孙龙《名实篇》中的“夫名,实谓也”、“天地与其所产者,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焉。”、《指物论》中的“物,所指也”、《荀子·正名》中的“名足以指实”和“制名以指实”等论述中的“指”,都有指示、表示、指称、指谓之意。庞朴先生后来干脆以意义释指,就是对公孙龙和荀子等人思想的继承与发挥。这些看法,和意义指称论是非常接近的。当然,中国古代也有人反对将名言符号与外物直接等同起来的做

法。《尚书·盘庚上》中说:“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旨”(“旨”与“指”通假——引者注)、《孟子·尽心上》说:“言近而指远,善言也”、《尔雅·释言》说:“指,示也”,上述这三个“指”,又都有涵义、意向的意味,并不和所指之物——对应,有很明显的反指称论意向。

指称论和非指称论虽是中外思想史上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但实际上又都有其自身的客观依据。意义有时的确和指称的对象相一致,离开了指称的对象,意义便没了着落;但有时候意义却又并不实指客观对象,而是根据语言符号的逻辑规定指向自己设定的对象,也就是自己的意向性客体。因此,就二者的相互关系而言,既不能绝对地讲一致,也不能绝对地讲不一致。只要能够辩证地思考和把握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是形而上学地将意义与其指称的对象直接等同起来,就不会将意义视为物质实体,从而也就能解决那些虚构的和不真实的对象的符号为什么也有意义的问题;同时,只要不是形而上学地将意义与指称本身等同起来,也就完全可以理解符号是不是都是名词,是不是都有意义的问题。

具体地说,意义和指称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从意义与指称对象的性质来看,意义和指称的对象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指性客体(actual object),一类是意向性客体(intentional object)。当指称的对象是实指性客体时,意义和指称完全一致,其对象和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内容都是相同的。然而,当指称的对象是意向性客体时,指称和意义将会产生分离。这种情景中的语词符号往往有意义而无实指性的对象。意向性客体,虽然不是客观事物本身,但同样是客观存在的。作为人类在自己思维过程中创建的表象,意向性客体一经产生和符号化,便立刻成为指称的对象,成为推动人类精神生活进步的基本动力。这



正如数学史家 M·克来因所指出：“数学家无意中逐渐引进了一些没有或很少有直接物理意义的概念，其中负数和复数是最令人费解的，因为这两种数在自然界中没有‘实在性’。”<sup>③</sup>其实，不光是数学，形式逻辑、音乐、绘画、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都有以自己意向性客体为研究和陈述对象的特征。对语词符合，特别是对专有名词来说，它既可以指称对象，又可以表达意义。意义既可以和实指性对象完全一致，也可以和实指性对象相分离。这两方面内容，都是意义与指称关系的固有规定，不能割裂开加以片面化理解。由此可见，无论是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指称论还是斯特劳斯、奎因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等从不同角度对指称论的批判，其实都有盲人摸象般的片面性，只有将二者综合起来加以理解，才能正确认识指称与意义之间的真实关系。

其次，意义与指称的关系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语言哲学研究领域中的特殊表现形式。从意义与指称过程的信息流程来看，二者既密切相连，又相互区别，因此绝不能将二者合二为一，等同视之。

研究证明，指称过程是语言符号突破自身界限指向外部事物的过程。由此而来，研究指称论的人总免不了追问诸如语言能不能指称实在、为什么能指称实在、指称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样一些涉及指称论的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归结起来，这些问题实质上是语言与实在的关系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主张语言符号能够实在的人一般都认为，名实之所以相通，主要是因为实在的名称是人们约定的。《荀子·正名》中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约则谓之不宜。”这是约定俗成论的典型说法。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语言学家克里普可提出，指称的过程如同给初生的婴儿取名一样简单明了。

他说：“一个婴儿诞生了，他的父母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他们对朋友谈论这个孩子。另外一些人看见过这个孩子。通过各种各样的谈话，这个名字就似乎通过一根链条一环一环地传播开来了。”<sup>④</sup>这就是著名的关于名之所以能够指实的“历史因果论”解释。然而，无论是荀子的约定俗成说还是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论”，都还停留在对名实关系表面现象的理解和解释上。它们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能够约定俗成和根据什么约定俗成这样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在荀子和克里普克的理论中，指称过程被看成人给外物命名的自然过程。但是，如果没有关于外物的理解、没有关于外物的心理领会，谁又能凭空赋予外物和名称以意义呢？正如奥格登和理查兹所指出：“词语本身并不‘意味’什么，尽管人们曾经普遍地相信它们——有所指称。”<sup>⑤</sup>由此来看，将指称过程和命名过程直接等同起来是一种相当表面化和片面化的理解。指称过程的实质是人们通过符号中介将自身对外物的理解“还给”外物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理解和赋意两个环节。理解是形成关于对象的意义模型的过程，这是客体信息内化为精神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赋意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理解过程、没有信息的内化，赋意过程便像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一样不可思议。赋意，是内在的意义模型外化为符号的过程、是用符号表达意义的过程。指称的信息流程表现为一个由外到内再由内到外的完整过程。由外到内，形成意义，这是指称能够突破语义屏障、指向和表达外物的关键环节；由内到外，即传统的指称活动过程，首先是关于意义如何表达的问题，而不是关于外物的表达问题。实际上，广义的指称过程可以用下述一个简单的模式加以概括：

客观实在——理解(形成意义)——  
解释(符号化)——符号实在  
在这一模式中，意义概念与传统的指称

概念(符号化)的联系与区别是一目了然的。意义作为指称的前提,其形成是一个由外向内的过程;指称作为意义的外化,则表现为一个由内到外的过程。由于存在着如此明显的内外之别,意义概念自然就不能和传统的指称概念混为一谈。

最后,从意义与指称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看,二者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基本统一到逐渐分离的过程。认知心理学和古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我们人类的意义世界发轫于动作思维。动作思维是一种情景思维,必须有实指性对象存在方可进行。在动作思维阶段,意义过程和指称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汉语中指的本意便是“指目之”和“手有所指为指”。《礼记·大学》说“十手所指”、俞越《公孙龙子发微》中说“指,谓指目之也。见牛而指目之曰牛,见马而指目之曰马,此所谓物莫非指也。”这两处提到的指,说的都是“指”与“意义”相通的情形。象形文字出现以后,文字符号的意义仍然来自于对对象特征的直接把握,意义内容和指称对象基本上仍是一致的。文字发展到拼音文字阶段后(汉字是一个较特殊的例外),文字符号才成了声音的代码,和所指对象的实在对象发生了分离。语音可以表意达物,也可以只表意不达物。意义活动和指称活动这时才有了各自独立的品格,可以携手同行,也可以分道扬镳。帕默尔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他指出:“为了达到人类沟通的复杂目的,我们需要弹性较大,不那么笨重的符号。我们不能把所有可能提到的东西的样品都带在身边,更不用说爱情、荣誉、服从等抽象概念了。可是我们用发音器官发音几乎永远是可能大。利用这种符号的可能性是使人类和低等动物不同的主要力量。我们这一套优越性是很明显的。在语言里,符号的物质性给取掉了,它放弃了任何跟所代表的事物的相同点。它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另外一种。”<sup>⑥</sup>可见,人类语言的发展过程虽然是意义过

程和指称过程的统一,但二者却在时间的推移中发生了分离。这种分离,一方面促进了人类知识体系的巨大进步,但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各种虚假观念体系的出现。正如人类进化过程中时时都面临着退化的威胁一样,语言符号的进化同样面临着退化的威胁。正确认识意义过程与指称过程分离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准确估价语言符号虚构世界的能力所带来的后果,是意义理论研究必须重视的问题。

总之,意义概念与指称概念是有明显区别的一对概念,虽然长期以来曾被一些思想家混为一谈,但其差异并不可能、实际上也不会因此而消失。在近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研究中,密尔、胡塞尔、弗雷格、后期维特根斯坦、斯特劳森、奎因和刘易斯很早就注意并不断深入研究过这一问题。他们的一系列思想,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片面性,但却为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可由之出发的坚实基础。只有科学地、准确地区分意义概念与指称概念的内在差异,才能真正推进意义理论的进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意义与指称这一话题才是语言哲学研究常说常新的永恒主题,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注意。

①《柏拉图对话集》,[英]纽约兰登出版社1937年版,第211页。

②弗雷格:《论含义与指称》,载P杰奇和M克拉克编:《弗雷格的语言哲学》英文版,第23页。

③转引自《西方数学哲学》,第206-207页。

④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⑤转引自车铭洲主编:《西方现代语言哲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⑥帕莫尔:《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页。

责任编辑:何蔚荣

# 对哈耶克“自由与责任” 思想的一种阐释

□ 张文喜

(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副教授,上海 200433)

[摘 要] 本文主要出自于对哈耶克著作的理解,从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由概念入手,在超脱出纯伦理学视域,明辨自由概念的基础上,诠释了哈耶克对自由与责任之应有关联的把握,及其论点和探讨的视角对中国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具有的某种启发意义。

[关键词] 自由 责任 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B56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49-07

读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潮代表人物哈耶克有关自由与责任这一主题的论说,实给人一种对传统观念作出重要改变的领悟:从现代人的自由观念出发,发展出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由与责任观,这可说是哈耶克对此一主题分辨的重心,哈耶克倡导的“责任伦理”出入于经济学、法理学与政治哲学之间,超脱出那种始终纠缠于人的自由与行为责任之因果关系的狭窄的传统伦理视域,启发我们对这一问题作出有意义的和合乎逻辑的思考。

哈耶克对“自由与责任”这一问题的申论散见在多部著作中,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有专章集中论述,我对哈耶克有关此一主题的讨论试图从他的“自由辨”开始。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第一章里,把他心目中的自由同五种其他意义上的自由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差异作了细致的辨析。本文限于讨论与主题

有密切关系的三种区分。在讨论这三种区分之前,拟先指出一项概念性的区分,藉以说明哈耶克思想的特定预设。照邓正来先生的了解,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由,亦即否定性自由,否定性自由指除规则禁止者以外一切都许可,哈耶克所采纳的就是自由的这一原始意义,所谓个人的自由状态,乃是一个人不受制于因另一人或另一些人的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状态。哈耶克的意思是,一个人的自由所要求的绝不是其他人以某些方式的作为,而是其他人以某些方式的不作为,是对其他人作为的否定。对自由作了如此界定后,哈耶克通过揭示与其他意义的自由之间的差异来详尽地阐明否定性自由的概念。正是在这种阐明中,我们引申出哈耶克的“自由与责任”这一主题。

1. 哈耶克把否定性自由同“意志自由”概念相区分。在哈耶克看来,“意志自由”的说法在哲学史上是引起混乱的主要概念之一。而这种混乱主要在于人

们在把握自愿行动和责任的意义方面所存在的种种困难。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立场:决定论的和唯意志论的立场。决定论者一般都认为,由于人的行动完全是由自然原因决定的,所以认为他们要对其他人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负有责任就是没有合理根据的;而另一方面,唯意志论者则主张,由于人具有某种处于因果链之外的力量,所以这种力量就成了责任的承担者,也是赞扬和谴责的确当对象。然而,哈耶克认为,上述论争双方的各自结论都背离了他们所宣称的前提。因为,责任的观念事实上是立基于一种决定论的观点。因此,宣称意志是自由的观点,与那种否定意志是自由的观点一样,并无什么意义,整个问题本身只是一种语辞之争。

回溯传统对自由意志概念的讨论,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人们能够充分掌握对其行动负有责任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吗?人们所处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引起他们自己行动的原因吗?形式地看,这些问题并不难回答,因为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人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如果这一行为是他自己自愿(依其意志)作出的话。人有意志自由,实则是在选择与责任上说,不是由行为主体依其意志作出的选择,我们无法对其加以评价,也无法对行为主体课以责任。人们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人们能够使自己成为导致某一行动的原因。这种观点虽然是人们常常持有的观点,但是严格地说,哈耶克认为却是一种谬论。一方面,导致人们做出选择的因素相当复杂,意志正如休谟指出的,只是在人的性质的一方面而已。另一方面,从社会知觉的角度看,意志自由并不纯粹是个人的。意志自由与人的社会境况之间有密切的关联。问题并不在于确定

某一行动是否出于意志自由,而在于知觉到别人行动的起因,不论是内部的自由意志还是外部的社会影响。社会知觉把人们行动的表现归因于事件,比如当问及一个职员从一个公司到另一个公司就职时,他会说“那个公司所提出的待遇比前一个公司好多了,我根本无法拒绝”,这个回答表明他的选择行动并不是完全由意志支配的。所以,哈耶克说:“事实上,我们常常可以通过教育和示范、理性的劝说,以及赞成或反对的方式影响人的行动,这一点很可能从未有人做过持之一贯的否定。”

因此,哈耶克认为,对于我们究竟有多大的自由的决定论或唯意志论的回答,都是令人不可接受的。对我们有多大自由的追问,必须考虑到我们的许多方面既受到因果律的限制,但同时,作为人,我们的内在本性的复杂性却并不把人的选择自由消融至尽。人创造自己及世界的经验,其间表明了人的精神维度及其感知能力是极其丰富和具有无限可能的。因此,就道德向善上说,我们主张人有意志自由,而作恶也是意志自由的原本含义之一,对这一点儒家和康德早已认识到。人既拥有自由意志,其直接所蕴涵的即是,人同时拥有责任。而对于责任感,哈耶克认为,唯一的意义是,如果没有责任感那么人们的行为将会很不一样。一个医生尽可以申辩说病人的死亡是由于意外事故,不是他的责任,但是,只有让他承担对病人生命的重大责任,他才会时时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意外因素而更加谨慎小心。哈耶克的意思是,课以责任的目的在于使人们的行动比他们在不具有责任的情况下更具有理性。一个自由的社会很可能会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都更要求做到下述两点:一是人的行动应当为责任感所引导,而

这种责任的范围应远远大于法律所强设的义务范围；二是一般性舆论应当弘扬责任观念，当人们被允许按照他们自己视为合适的方式行事时，他们也就必须被认为对其努力的结果负有责任。

2、哈耶克把个人自由同以整体人群为对象的政治自由相区分。在哈耶克那里，所谓政治自由乃是将否定性的自由用于整体意义上的群体而形成的概念，它指涉一群人作为整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整体的“意志”。在哈耶克看来，固然，我们可以把个人自由的概念推广到人群（民族、阶级等）自由，即一群人不受外来强权干涉的自决状态，但是对政治自由的追求往往使人们倾向于放弃个人自由转而臣服于外在强权，因为反对外界强权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强权本身。因而，享有政治自由的民族，却未必就是一个由自由人构成的民族；此外，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个人，亦无须以享有这种人群自由为前提，对人群自由的追求并不总是能够增进个人自由的。

个人自由不可侵犯的观念在哈耶克那里已经成为教条，因而，他反对那种以“善”（如政治自由、享有各种福利的自由等等）代替“自由”，自由并不意味着“善”。哈耶克认为，我们也许是自由的，同时又是痛苦的，自由选择往往要求我们承担选择的一切后果、责任以及种种人生的不确定性，一个自由社会所能提供的种种允诺，对于特定的个人而言，始终只能是各种机遇而非种种确定性。在哈耶克眼里，自由并不是一种价值，而是价值的基础，是其他价值欲得到充分发展所必需的土壤，如果自由不被视作最高原则，那么，自由社会所提供的种种允诺，就会因性质的缘故而被证明为致命的弱弊，并使自由渐渐丢失。在此一意义上，自由是一种独特的善，人类只有在

拥有自由的基础上才能追求各种值得追求的东西。

正是立足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本体论，哈耶克毕其一生与法国激进主义自由传统进行抗争。从而哈耶克的自由概念与卢梭的自由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哈耶克的理论也同卢梭的理论一样，其出发点与归宿都是人之自由。但是，卢梭的“自由”是与“道德”焊接在一起的，卢梭的“自由”通向“道德”，而不是通向“利益”，这是卢梭和同样谈论“自由”的哈耶克的根本区别之一。卢梭不同于哈耶克，卢梭对社会发展持有强烈的不信任心理，故而才有动用政治国家打断社会自发倾向，重建社会道德秩序的理论设计。而道德理想国的人口唯有使个人意愿与“公意”同化，因而，在卢梭那里，个人自由不在于这一自由本身，反而在于由全体社会成员达成社会契约，通过对个人自由的让渡去掌握政权。经过一番抽象推演，卢梭鼓吹的自由，即使装饰上“公意”的花环，却依然不过是以自由为名的奴役而已。这就难怪他声称要通过强制来迫使人们“自由”了。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后的第一个月，一个法国人已经敏感到法国式自由理想的悖论：“我们已经迅速地从奴役走向自由，我们正在更迅速地从自由走向奴役！”<sup>①</sup>事实上，这一悖论早在法国大革命的实践历程之前，已经在卢梭的政治设计中开始了。这种用“公意”来合法地剥夺一切个人自由的政治设计，在哈耶克看来是最不可容忍的错误，这不仅在于人类的道德只能是演进的。你尽可以对现存社会的道德体系表示不满甚至激烈批评，但是你无法设计出可行的能够取而代之的新道德体系，一切传统的东西都只能演进而无法激变。而且，更根本地在于，哈耶克相信如果每个人的自由都得到维



护,那么他们取得的成就便往往会超出个人理性所能设计或预见到的结果。那些同意放弃个人自由转而追求政治自由的民族,最终由于缺失了个人自由而失去其它所有的自由。

3. 哈耶克把指涉社会关系的自由同“人——自然”关系中人的自由相区分。毋庸置疑,哈耶克的理论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哲学,然而,哈耶克将自己的“真个人主义”与“伪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作了分明的界分。哈耶克认为,“真个人主义”主要是一种旨在理解那些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社会理论,他坚决批评那种最愚蠢的一般误解,即认为个人主义当然以孤立的或自足的个人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哈耶克认为社会不能够分化入那些只具有私利的孤独的个人之中,对自由主义的捍卫并不需要把人假设为一孤立的、非社会的存在,人的自由问题也只是指涉社会关系的自由。处于孤立的自然状态中的人,即使人的存在总体上受到自然的高度制约而使得人只有很少的自由,人的自由问题仍然不可能还原为自然的问题。人的自由在自然中可以说是一个小问题,但对社会中的个人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或者说,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涉及自由或不自由的问题。

哈耶克将自由视为一社会学概念,这切合于以下几个不同概念的释义。蔡元培认为,中国儒家的“义”就包含“自由”这个价值,因为“义”的一个含义是人作为社会行为者的行为之“宜”。他这样诠释孟子的“义”：“性善,故以仁为本质。而道德之法,即具于其中,所以知其法则使人行之各得其宜者,是为义。”②自由就是个人依照作为“人”即群体的本质的“仁”即伦理的善自行其事。所以,在中国文化所包容的价值观中,一个人对

一切关系的他人于行善戒恶,他便处处左右逢源,所及广远,这不是自由自在吗?类似的思想也可见于西方文化中,虽然,西方文化对自由本身基本上规定为个人的自由,但是,它从形而上层面说也是从群己关系着眼提出“自由”的。对此,英语里“right”所代表的三个不同概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语义学事实:“正确”(right as truth)是说你在真理知识的意义上正确(你对问题的回答是正确的);“确当”(right as justice)是说你从正确的知识把握了正当的行为准则;“权利”(right as claimant),从而你有了自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并且别人(由于你行为的确当性)不会干涉你做这件事的自由(这两点合起来就是西方哲学所理解的“权利”)。所以,“自由”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和人之行为之宜或道德相关联。③

密尔在《论自由》中曾主张,社会对于只涉及个人自己的事务所进行的干涉,绝不能认为是正当的。但是,就我们看来,个人的事务并非单纯地只对个人本身发生影响。由于人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和间接的联系,每个人的行动都会影响他人。因此,“自由”在哈耶克那里,包含着人与人在具体分工合作的场合下逐渐熟悉相互联系并建立协调的规范和相互责任感的学习过程。个体协调自己的行为以适应他人的行为,这是劳动分工社会中每一个人对他人的“责任”。哈耶克认为,每个人对他人的责任感是自由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核心。从文化哲学的视域看,现代自由市场制度,就是人类文化伦理精神在当今经济领域内形成的信用制度及其配以灵活的具体环境下的责任制度,只有讲信用、责任,即人之行为之宜的市场,才是对人类文化伦理的发展“合目的性”的经济形



式。

## 二

世间没有无责任的自由,也没有无自由的责任。哈耶克对“自由与责任”的逻辑关联的把握正是立足于自由与责任是互为证成的这一基本观点。然而,任何理论的普遍品格,都把作为权利的自由与作为义务的责任两相照看,互不分离。这种不可分性既表明理论的内在一贯原则,同时又借此看到似乎对立的两极所呈现的内在紧张关系而加强对立双方的践行。在我看来,哈耶克所依凭的理论在既反对“强制责任观”,又反对“放任自由观”的前提下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思想空间。在哈耶克的理论中,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之所以缺乏相应的责任意识,并不在于没有强化责任。那种强化责任,甚至将人们的许多行为规范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其结果只能导致压制“未知的少数”人的创新活动。欲使责任有效的关键,在于将责任具体落实到个人。哈耶克认为,在一自由的社会中,不存在由一群体成员共同承担的集体责任,除非他们通过商议而决定他们各自承担责任。那种“不断提醒我们对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或者我们的世界中所有需要帮助或不幸的人负有‘社会’责任的做法,无疑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即它会不断地强化我们的责任感,甚至我们无从界分那种需要我们采取行动的责任与那种不需要我们采取行动的责任之间的差别。”<sup>④</sup>哈耶克的这一思想显然受到休谟思想的影响,因为按照休谟的看法,人的心灵天然不能够去关心那些不常与之发生联系的人的利益。而从根本上说,这一观点根源于哈耶克的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哈耶克有意无意地从个体的观点出发考察社

会现象,所有具体有关“人”的事情最后都要落实到个人身上,他的理论不存在从个体通达整体(民族、群体、社会)的途径,充其量只有从个体达到特殊范围的诸方面的考察,达到对简单事实的描述性分析,因而,这样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哈耶克的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本质上受制于他的个人主义立场。哈耶克曾对个人主义立场的本质有过清楚的论述,他说:“在限定的范围内应当让个人遵循他们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价值和偏爱;并且在这个领域内,个人的目标体系应当高于一切,不受他们任何命令的约束。就是这种承认个人作为其目标的最后判断者,以及对个人行动应当尽量受他自己意志的支配的这种信念,形成了个人主义立场的本质”。<sup>⑤</sup>这种个人主义立场必然会否定客观价值(社会需要、整体利益等)对个人自由、责任的规定性。

与个人主义不同,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个人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是辩证统一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⑥</sup>“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向每一个公民负责。”<sup>⑦</sup>现代社会责任感之可能被削弱,根本在于与人们缺乏公心,割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相联系。对于这一点,那被资本主义历史扭曲的哈耶克的眼睛是无法看见的。不过,哈耶克的如下思想,无论作为实践或理论,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是绝不能忽视的。

首先,哈耶克在反复说明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时,是建基于“不确定性假设”上的。哈耶克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个体不能追求一个确定的最终目标。个体只能追求一系列的‘手段’,这些手段可能帮助他们实现那些最

终目标。这些手段或‘中间目标’是人们(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能够确定地看见的东西。人们能够确定这些中间目标,是因为他们在各自局部的领域了解各自面对着的具体的机遇”。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社会中人的行为和具体环境的变动性是自由市场制度本性使然。自由市场社会中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倡导人们自由选择、分散决策,但它同时也意味着人们有义务、有责任承担由自己的选择和决策可能带来的风险。设若市场社会中的每个人或集团都只想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但又都不想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和风险,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就成为不可能,整个社会就随之分崩离析。因此,强调义务、责任,尊重合作精神,构成现代市场制度另一个重要的道德基础。

对自由市场制度人们往往会因它充满种种不确定性而忧心忡忡。人们希望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对一个具备专业知识的工程师因竞争而下岗,深感不安。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的解决,在哈耶克看来,不可能指望依靠某个权威机构来指定每个人的工作方式来解决,这不仅因为人的需要千差万别而人的理性有限无法作出恰当的安排,而且,即便无此困难,让外在权威来安排每个人的工作,那只是一种更大的不自由。只要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才智而去寻求市场,就必定会面临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勿庸讳言,就此而言,一个自由社会将大多数人置于了一种压力之下,而且这种压力往往会导致人们的不满。但是,哈耶克认为,那种认为一个人在其他类型的社会中不会有这种压力的观点,却只是一种幻想。深谙人性的哈耶克确实看到了压力对人的行动意志的激发作用,就他而言,他并不希望竞争少些,而多些歌舞升平的合作和博爱。因为,正如奥肯所说:

“过度贬低竞争就意味着放弃对个人的激励因素。”况且,就是取消了市场的社会,为争取物质利益的竞争依然存在。现代自由市场制度的进步在于,它使人人之间的客观的利益冲突明朗化、制度化,给予这种冲突一套合乎规则的调节机制,这也许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调节方式。任一社会中的人们,只要他们的行动还被“幸福”所召唤,他们就注定应承受压力,而且“哪怕最低水平的幸福标准(如‘温饱’)和最高程度的努力,都不能保证人能达到幸福,这一方面因为人的欲求是不确定的,人总是不会满足的,另一方面自然的不确定的变动并不特别照顾人,再者,人们出自自己的恶劣的情欲追逐着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对抗、斗争,从而造成历史中的无数的不幸”。康德的如上观点,实际上也是把“不确定性”作为理论上的预设。“不确定性假设”可说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基本假设。现代自由市场制度把“不确定性”空前地凸现出来,一个企业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企业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得随机应变;一个个体作为自由选择的主体,必须对他自己在这不确定的世界里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和前途负责,这是市场经济加给我们的负担,也是市场经济能够成功的原因。

哈耶克的“不确定性假设”的理论前提是“不可知论”,哈耶克认为,必须承认所有的人对于实现其目的及福利所赖以为基础的众多因素都存在不可避免的无知。而这恰使自由成了可能。人既然无法“全知”、“全能”,那么,人的一切成功的、正面的经验也都必然要通过那个“不确定性”环节,因而表现为“自然”的一种“合作”、“配合”,于是“生活世界”常展现为一种“恩惠”。

其次,哈耶克认为,“决定我们责任的,乃是我们从其他人提供给我们的服务中所获致的利益,而不是他们在提供此类服务时所具有的品行”,“自由人的标志乃是其生活并不依赖于其他人对他品行的看法,而只依赖于他给其他人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在此,哈耶克已在完全不同于传统伦理意义上使用“责任”概念。其意在将人的价值与品行作区分。将道德价值或品行看成价值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是道德价值,而且我们大多数的价值判断也都不是道德判断,这在哈耶克看来,是自由社会的必然。

由于道德环境(文化)的不同,生活在中西方的道德个体大都接受了各自文化环境的熏陶,中国传统道德取向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当某种努力对他人具有某种较高价值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轻易地把它归之于个人的品行,而且一个人的行为只有在得到绝大多数与之相熟的人的赞同,否则绝无成功之途。我们也太过于习惯于认定在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场合就一定具有某种品行。这种习惯也时会产生负效应,可能会阻碍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发展,它往往会摧残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这种习惯思维的实质是混淆了道德价值与非道德价值在本体论与价值论层面上的区分。从价值论上说,道德价值往往高于非道德价值,道德价值容易给人以超越、崇高和充沛之感;在本体论上,非道德价值高于道德价值,不仅是因为可以设想一个无道德

的生活世界,但无法设想一个无生活的道德世界;而且是因为生活在逻辑上的在先性,所以它是本源性的。如此看来,正确理解了的责任并不狭隘地对应道德世界,它所限制的并不是自由,而只是自由的抽象,即不自由(黑格尔语)。它仅仅限制个人的任性,如此的“责任”概念包含着更积极的“意志”和决定,而不是人们不得不时刻面临的萨特式的种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显然,哈耶克提出的问题基本上也是我们的问题,如何在个人的自由、责任与对个人品行评判的尊重之间维持一种个人创新精神和创新活动的平衡,这是背负几千年文明社会传统的中国人的现代课题。

①转引自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三联书店(上海)1994年版,第73页。

②张汝伦编选:《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③参见汪丁丁:《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中篇)》,见《公共论丛——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9页。

④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1页。

⑤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9-6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

责任编辑:罗 苹

# 经济特区应继续为中国的现代化探路

□ 吴 忠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广东 深圳 518000)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56-04

17世纪中叶以后,自西方开始,人类社会浩浩荡荡迈向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或早或迟,或快或慢,或自觉或不自觉都将汇入这股洪流。马克思看到了这股洪流,并预言人类历史将成为“世界历史”;邓小平同样看到了这股洪流,他要通过建立经济特区探索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江泽民总书记最近视察广东深圳等地时提出,有必要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这是对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人民提出的新要求。对深圳等经济特区来说,致富思源,就是要求我们历史地看问题,把个人、家庭和地区的发展同中国共产党人苦苦探索现代化之路的历程联系起来,进一步增强对社会主义,对邓小平理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认同感;富而思进,就是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当下我们的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增强继续为中国的现代化探路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果说,致富思源主要是要解决思想认识、理想信念和情感认同问题的话,那么,富而思进则是要求我们深入思考,如何选择继续前进的路径。

富而思进,继续为中国的现代化探路,从思想方法上说,需要我们解决好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调整思维坐标。中国的经济特区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背景下建立和起步的。在邓小平的思考中,建立经济特区是旨在冲破旧体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快社会发展的一个试验。多年来,我们习惯于以内地为坐标,将特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情况与内地一些城市相比较,显得我们的总量较大,质量较高,速度较快,效益较好。而一旦我们以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为坐标,我们在不少方面便显得还有较大差距。以深圳为例,1999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436亿元,人均4200美元,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而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面积不足深圳的1/3,人口不足400万,但它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已达1049亿美元,人均32000美元。<sup>①</sup>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不久前在深圳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就曾指出,深圳的现代化建设定位要跳出广东,跳出全国,瞄向国际水平。这一意见是颇有见地的。这种思维坐标的调整是经济特区富而思进,加快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是引入辩证方法。辩证思维方法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法,要求认识事物分析问题做到观察的全面性,注意事物矛盾对立着的不同方面。因此,考察我省经济特区的现代化建设既要看到发展的成绩,又要看到所存在的不足。一方面要看到经过20年的建设,我省特区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总体上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有的经济特区的发展已接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水平(如用美国社会学家阿·英克尔斯关于现代化国家的10条标准来衡量,深圳除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偏低外,其余都已达到或超过标准);但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我们不同领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方面距离现代化的目标是有较大差距的。就深圳来看,如比照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不难发现,该市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经济效率则显得偏低;高新技术产品占工业总产品的比重较大(1999年达40.5%),但科技进步的效能不高;经济的外向度高,但外向自主能力偏低;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但科教文化发展显得滞后;城市化水平较高,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还较为突出。②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富裕”才是刚刚起步,已有的成就只是前进的基础。发展经济学认为,现代化是在经济变革基础上发生的包括社会变革、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以及人的成长等一系列内容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变迁。就此而言,我省经济特区要走的路还十分漫长。

三是校准思考方向。思考的方向决定着发展的路向。从方向的角度看,经济特区的发展有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即我们所要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因此既要大胆吸收一切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又要牢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第二是战略层面的问题。经济特区有责任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模式选择,这就需要我们思考:作为经济特区应该并可能在哪些方面为全国提供示范和经验?党的十五大曾在这个层面要求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和对外开

放方面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这里体制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诚然,特区的发展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援,也离不开香港、澳门等地区的经济背景因素,但特区发展的内在动力则主要是改革即体制的创新。第三是策略层面的问题。在这一层面,需要各部门各单位的干部群众在认真学习领会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过程中,充分分析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以及开发大西北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按照中央、省委的要求和各市市委作出的战略部署,结合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实际,作出具体的“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行为选择。

富而思进,继续为中国的现代化探路,需要我们侧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具体的战略思考。

一是体制的现代化问题。体制既是一个社会的制度性因素,又是一个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它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关键性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当制度变迁诱发成本降低,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经济增长才可能发生并得以持续。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省经济特区已开始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转轨,有的特区如深圳已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由此引起了其他领域的一系列变革,正是这些变革才带来了特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应该说目前的新体制还很不完善,经济发展的动力体系和协调机制还远未成熟,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实现制度的创新。这种制度的创新既包括经济体制的创新,也包括政治和文化体制的变革。体制的现代化有必要既注意到与国际惯例接轨,又注意到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



义制度因素。就经济体制而言,当前有必要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加大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力度,完善国有资产运营和监管体系,构造科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继续培育要素市场,完善市场体系;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强化投资风险约束机制;整顿社会中介组织,进一步规范经济秩序;深化医疗卫生和保险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二是技术和管理的现代化问题。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 1971 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大会上所作的《现代经济增长:发展和思考》的演说中提出,现代经济的增长是以技术进步以及所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为基础。如果说制度从宏观层面决定了资源的利用效率,那么技术则从微观层面决定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为了实现经济的现代化目标(各经济特区情况不一,深圳的指标是到 2005 年人均 GDP7000 美元左右,2010 年人均 GDP10000 美元左右),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中国加入 WTO,作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特区必须形成以企业持续技术创新为中心的产业自动升级机制。与此相配套,还必须形成一套现代科学的管理体制。深圳等经济特区虽然目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所占比重较大,但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当前有必要建立起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社会机制,在完善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制度方面做足文章。注意处理好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的关系,加大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建立起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机制,形成包括技术成果的评估、风险投资、风险退出机制等在内的技术创新自动推进体系;充分利用各地技术资源,建立高新技术迅速扩散并能

产业化的新机制。

三是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与作用,这不仅因为文化是人类带有终极意义的价值目标,是城市和社会文明的标志,同时它还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深层的人文动力。勿庸讳言,我省经济特区文化的发展与其快速的经济发展相比较,显得不够相称,主要表现为文化发展的工具理性过盛,自成长动力不足,文化人才的自组织功能较弱,高雅文化、精英文化、理性文化发展相对滞后。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有经济的冲动力和人文的冲动力协调发挥作用。美国当代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不无深刻地指出:“经济冲动力成为社会前进的唯一主宰后,世上万物都被剥去了神圣色彩,发展变革即是一切。社会世俗化的副产品是文化上的渎神现象,资本主义便难以以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所谓的终极意义了。”于是,“现代主义已经消耗殆尽。紧张消失了,创造的冲动也逐渐松懈下来,现代主义只剩下一个空碗。”<sup>③</sup>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失去其内在持续的冲动力。这一分析值得我们深思。文化的现代化自然是要既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吸纳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从而整合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对经济特区来说,当下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一是要处理好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关系,在加快通俗和大众文化发展的同时,扶持和培育高雅文化的成长;二是要处理好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关系,以应用研究带动基础理论研究,以基础理论研究深化应用研究;三是处理好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的关系,使经济特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背景下,成为既是现代文化艺术产品



的生产基地,又是现代文化交流与展示的窗口;四是处理好文化的产业化、市场化与文化管理的关系,建立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法律调控相结合的文化运作模式,营造文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良性运作机制。

四是人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有学者指出,后发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在发达国家现代化示范效应作用下,发展中国家一旦实现经济起飞,往往可以出现高速突变式发展,这就会出现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即人的现代化落后于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sup>④</sup>这一特点在我省经济特区现代化发展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深圳的城市化进程中,居民素质的提高就远远跟不上社会物质层面的转换速度。在由原农民转化而来的居民身上,或转化中的农民身上,城乡二元特征体现得十分明显。他们一方面迈入了市场经济环境,开始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但另一方面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上仍保留着传统农业文明的深深烙印。转换中的农民利用土地、房产、股

息等实现了超越一般城市居民的富裕,却同时发生了“富裕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出现了有劳动能力却既不劳动也不读书的“二世祖”现象。因此经济特区仍面临着人的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当下有必要采取教育与疏导相结合、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相结合的办法来提升人的文明素质,包括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以筑起经济特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文明主体平台。

---

①IMD《国际竞争力报告 1997》。

②参见《跨世纪发展的历史使命——深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示范市研究》附件三:“深圳现代化发展水平分析”,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4 月版。

③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14、66 页。

④梁桂全主编:《改革开放 20 年的理论与实践——广东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72 页。

■ 笔 谈 ■

# 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新概括、新发展

□ 梁渭雄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050)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60-01

最近,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最重大的问题。我认为,这是认真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而得出来的重大结论,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性质和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实践的新经验、新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新概括、新发展。这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很需要认真学习研究和宣传贯彻的一个重大问题。

首先,回顾几十年来我们中国共产党曲折前进发展的艰辛历程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倒退失败的反面教训,充分表明,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才能真正体现和保证党的先进性和党的兴旺发达;相反,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先进性就失去了基础,失去了依据。这也就是“苏东事变”中共产党失败的重要原因。应

该说,江泽民同志关于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观点,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度,深刻地总结和揭示了党的建设的一条基本原理。因为先进生产力始终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社会主义发展以至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依据和决定性因素。如果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能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或者是合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确实是关系着我们立党的基础和依据的重大问题。

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条。因为先进文化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晶,又是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影响着人的灵魂和素质,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体现,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在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已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主导性内容;而在当今中国,作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主导性内容的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因此,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就

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基本要求和体现。这是关系着我们立党的方向和路线的重大问题。而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邓小平理论的种种落后文化、腐朽文化以及反动文化,包括像“法轮功”之类的歪理邪说,如果为共产党人所信奉,也就称不上真正的或者是合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给我们很值得警觉的经验教训。

关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关系着我们立党的根本宗旨和归宿的重大问题。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先进文化的发展,共产党的一切奋斗,归根结底,都要依靠人,都是为了人,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目前比较严重存在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情况,是与此宗旨相违背的。这个问题过去已有较多论述,这里不再累赘。

总之,江泽民同志说的这“三个代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三条纲领性的准则,三者是辩证统一的,相辅相成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比较完整和科学的新概括、新发展,也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共产党人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马中柱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广东 广州 510050)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61-02

江泽民同志视察广东的重要讲话中,重新阐明了共产党人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对党的建设意义很大,很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领会。

过去我们对共产党人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视野比较狭窄,多只从认识论或者党员思想的某些不纯上来谈,讳言改造的必要和要解决的问题。江泽民同志讲话,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更深刻的理论层面上,讲了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努力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应该解决的问题。

首先,在新的世纪里,我们要承先启

后,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斗,争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后半叶,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建设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步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达到小康社会水平。古人云:创业难,守成亦不易。我们今天不只要守社会主义之“成”,而且要像江泽民同志所说:“我们要巩固和发展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伟大奋斗成果,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达到预期的宏伟目标。”这是一个非常光荣、伟大而艰巨

的任务,要由共产党人来完成。

其次,我们在完成这个任务过程中,“要正确应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环境”。不但国内我们面临许多错综复杂、利弊相伴的问题,遇到不少十分棘手、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国际环境更加错综复杂。最近新华出版社推出了一本名为《虎视中国》的专著,通过剖析美国的两洋战略、李登辉《台湾主张》的主张、未来世界“文明的冲突”、中美日关系走向以及中国国家安全和统一所面临的重重威胁与巨大挑战等等,提醒人们:台湾问题、西藏问题、贸易人权问题,都可能成为国际反华势力向中国施压的藉口。所以作者要人们注意:“外患逼临、我国的安全形势相当严峻!”香港报刊把这本书称作“中国‘新盛世危言’”。何况国内外环境还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呢?

第三,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和错综复杂的环境,对共产党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是江泽民同志所高度概括的“三个代表”。江泽民同志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也就是说,不管任务多么艰巨,环境多么错综复杂,只要共产党人做到了“三个代表”,就会立于不败之地。特别在新世纪前20年,是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的至关紧要的时期,共产党人做到“三个代表”更加重要。所以,江泽民同志要求“大家要充分意识到自己的

历史责任,适应新要求、迎接新考验,努力提高自己。”

那末,我们共产党人的主观世界,是否同这种改造客观世界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相适应呢?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现在党的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还相当不少,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问题也相当不少,需要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少。”这三个“相当不少”,就是与“三个代表”之间的“相当”差距。怎样使党的建设同“三个代表”相适应呢?从思想上建设党是我们党成功的历史经验和光荣传统,所以,江泽民同志提出改造主观世界的要求,不是消极地克服某种错误思想,而是要树立起与“三个代表”相适应的品质与观念。他说:“改造主观世界,关键是要陶冶革命情操,提高精神境界,牢固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牢固地树立为党为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信念。”有了这些品质与观念,就能解决党的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一些问题,解决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党的自身建设上所存在的不符合甚至违背人民利益的问题,从而做到“三个代表”。否则,即使主观想代表也是代表不了的。只要我们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要求,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我们党一定能够忠实地履行“三个代表”,在国际风云变幻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一定能达到预期的宏伟目标。

# 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内容

□ 梁 钊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广东 广州 510050)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63-01

新春伊始,江泽民同志到广东深入考察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讲话对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内容、新形势作了生动的详细的论述。“三讲”教育已经取得重要成果和经验,无论形式和内容都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创造。讲话创导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对于发展较快的地区具有普遍意义。“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既简明扼要,生动通俗,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又有十分深刻的内涵和丰富内容,同时也是各级领导干部进行自我教育的好形式。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教育,是我们国家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的一大法宝,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胜利推进,这种教育应当持久地坚持下去,内容也将会不断丰富和更新。

江泽民同志对广东提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词,是全省各级领导、广大干部群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统揽全局,时刻不能忘记的大目标和为之奋斗的总任务,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总任务,各行各业都要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论证,寻找出自己增创新优势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为实现这个总任务而奋斗!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提法,与邓小平关于当代中国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广东要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以及党的十四大提出的要求广东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提法是完全一致的。由于形势的新发展,在我们跨入新千年的时候,其要求与内涵又有许多新的内容、新的思想。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对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要提出新的思想、新的内容,要求我们下功夫着力探讨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任务和新的发展战略以及主要的对策与措施。

江泽民今年二月在广东茂名、高州、深圳、顺德、广州等地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考察,直接指导高州市的“三讲”工作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江泽民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加上年事已高,还风尘仆仆地不顾疲劳,很少休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在各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座谈、视察、询问,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关心群众的冷暖,对人民生活关怀备至。广东的广大干部群众,无不深受感动和鼓舞。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是求得真知灼识的源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项政策,一个措施、任务之所以切实可行,能够落到实处,除了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别无它途。

本栏责任编辑:叶金宝

# 西方著名德育思想家的 德育模式探讨

□ 袁锐锴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探讨西方著名德育思想家各自构建的学校德育模式,有益于构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德育理论和精神文明建设。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德育的目的就是使个人在道德上社会化,懂得社会观念和社会规范并认为有责任在行动上坚持不懈地遵循它们,德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就是教授道德原则,这既非说教也非灌输,它需要的是解释,但他并不笼统地反对强制和灌输;英国哲学家威尔逊把道德视为处理道德问题的过程,而不是一套用来灌输给年青一代的特定的道德标准,他进而把这一过程和处理道德问题时的有关因素分解成道德构件,揭示了德育是一个多维的、多程序的、长期的过程;科尔伯格认为,人的道德性发展与人的认知活动及其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强调道德判断、自律等心理成份的作用,因此其德育模式尊重儿童的思考和选择能力,要求学校必须根据儿童道德发展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科学地有计划地进行德育,让教师成为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的促进者;价值澄清学派把道德问题看成是价值观问题,认为价值教育的核心是让儿童学会评价过程而非传递具体的价值观,试图培养出一种能合理地自行决定价值取向的人,其德育方法突出了教师的引导作用和学生的主动性。

**[关键词]**涂尔干 威尔逊 科尔伯格 价值澄清学派 德育模式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64-11

近年来,我国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更加重视青少年学生的德育工作,党中央和江泽民同志不断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必须更加重视德育工作……进一步改进德育工作的方式方法……”。应当承认,我国长期的学校德育工作实践,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也存在和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国内外德育的经验和理论,探讨德育的规律,提高学校德育的有效性。

西方著名德育思想家的道德学说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如涂尔干的学说始于社会学,威尔逊的学说始于哲学,科尔伯格的学说始于

儿童发展方面的实验;加之他们的理论侧重点不同,或侧重于社会规范、德育目标、权威灌输,或侧重于个人选择、德育过程、自我教育等等,因而形成不同的德育模式。尽管他们各有偏颇,但他们从不同角度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校德育的规律性,值得我们探讨并对这些学说予以整合。

## 一、涂尔干的德育模式

个体社会化理论是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教育社会学的核心内容。他断言,教育是个体社会化的主要途径,教育对促进人的社会化有特殊功能。涂尔干



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将个人培养成为社会的一分子”。<sup>①</sup>所以他说，德育的目的就是使个人在道德上社会化，即按照符合所在社会的规范和理想的方式去行动，或者说，德育就是要使儿童个体的心理社会化。从客观实际来看，儿童个体是在社会生活中获得道德经验的，这种道德经验的发展过程，是以积累一定数量的经验为特征的，并在教育的影响下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改造，日趋完善和深化。在此期间，它的量变和质变，均受到儿童的环境和主体诸因素的影响，是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完整的统一。所以涂尔干强调德育就是使儿童的心理社会化，是有一定道理的。涂尔干关于个体品德社会化是由个体社会化的思想引申出来的，它符合道德教育的目的。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具有社会所需要的品德，即实现社会道德个体化，个体品德社会化。同时，涂尔干坚决反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反对损害社会的利益，主张个人委身社会，主张道德判断应以社会的利益和要求为标准，这些思想应当是无可非议的。

涂尔干认为，道德原则应该作为道德生活的指南而发挥作用，所以德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就是教授道德原则。如何理解这一观点？根据他的论述，道德教育既非单纯教给学生以一整套具体的行为规范，也不仅仅是使学生掌握道德推理的过程或发展他们表达道德情感的能力。反过来说，涂尔干认为，德育既要使学生能够按照一整套规范去行动，即传递和培养道德行为举止；又要“用适当的方法去发展或塑造那些一般的性向(dispositions)，这些性向一旦形成即能自行适应人类生活的特定环境”。<sup>②</sup>在这个问题上，涂尔干显然是要调和不同德育流派的各种主张。例如，行为学派强调学习具体的道德行为，科尔伯格的认知学派则强调一个人道德判断力的形成应当是一个从低常态水平向常态水平和超常态水平渐进发展的过程，而价值澄清学派强调的仅仅是主体的判断(选择)能力。

至于具体的德育工作，涂尔干反对以美育作为德育的核心，而把科学和历史定为德育赖以进行的两大课程体系，因为“艺术使人们置身于幻境之中”，<sup>③</sup>它在德育中的消极作用甚于积极作用。科学和历史却能导向理解和面向现实，它们是关于“真正生活”的，而道德就是认真地对待生活。涂尔干还指出，科学和历史的教學应注重集体和整体，帮助学生了解社会的基本情况、理解社会生活和道德的复杂变化。显然，涂尔干是从一个社会学家的立场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他否认美育的德育功能也是一种偏见，但正确的科学教育和历史教育的德育作用的确应予肯定。值得注意的是，涂尔干要求历史课教师把人们创造历史的事件给儿童阐述清楚，使他们了解历史的真相，方可启迪他们的集体精神，如果教师能引导儿童直接参加集体生活，效果会更显著。他还以物理现象为例，指出我们之所以能摆脱物理现象的束缚而获得自由，乃是由于我们逐渐了解物理现象的“真性”。若要在道德世界寻求自由亦必先了解道德的“真性”。

在道德教育的方法上，涂尔干并不笼统地反对强制和灌输。他从社会学的理论立场出发，强调“教育儿童的现象，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一个不断强迫的过程。儿童视听言动的方式不是生来就如此的，而是通过教育的强迫力使然。起初，是强迫儿童饮食有节、起居适当，然后强迫他爱清洁、守安静、听教训，接着强迫他懂得待人的礼节、社会习俗、行为规范，以后又强迫他学会做事，等等。等到儿童长大了，教育的强迫力逐渐消失，但是他幼时接受的教育行为已经成了他‘与生俱来’的习惯，不需要强迫他自己也知道照样做下去了”。<sup>④</sup>所以，涂尔干把在一定年龄阶段采用某种灌输的方法看作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因为没有这种强迫和灌输，儿童就不能成为健全的社会的人。涂尔干的论断是不无道理的。道德本身就是社会对社会成员的要求，德育作为实施这种要求的重要手段必然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它使儿童从知、情、意、行各方面逐步社会化,真正进入人类社会。从个体道德发展过程来看,儿童从具体行动向一般和抽象转化时,极难分清道德行为中哪些是属于实质性的,哪些是非实质性的,在这个阶段中,教育者对儿童主动施加教育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从信息的传递来讲,教育者的确对儿童采用了主动的信息输入,其目的在于帮助儿童建立他自己的德育方面的信息库,没有信息的输入就不可能有信息的提取和内部改造。因此,教育过程中适当应用灌输方法并不一定就是机械的注入或生硬的强迫接受。

值得指出的是,涂尔干并不片面强调灌输,他从其理性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教道德既非说教也非灌输,它要的是解释”。<sup>⑤</sup>他进一步提出,在德育过程中不但应该而且完全可能给儿童阐明道德原则,使它们真正是合情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从而变成个人的义不容辞的行动。看来,在德育中,解释和理解也都是必要的。有人评论说,“自律”的概念在涂尔干的德育理论体系中也成了克服生硬灌输的一种方法,因为有理性的人能够反省、思考,然后同意;他不是教育的被动客体,而是积极的自觉的“负责任”的人。<sup>⑥</sup>

总之,涂尔干认为,德育所要达到的目标,即所造就的“有道德的人”就是学会这样生活的人,他懂得社会观念和社会规范并认为有责任在行动上坚持不懈地遵循它们,此外,还理解这种社会化的正确和价值。换句话说,在涂尔干看来,学会按社会要求的方式行动,同时认识自己行动的意义并以之为乐,这就是在道德上受过教育的人,这种人具有德性三要素,即纪律精神、献身社会和意志自由。应该说,涂尔干对“有道德的人”所作的规定是比较全面的。从品德形成的角度来看,在道德上受过教育的人就是形成了某种品质的人。这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实现了个体道德上的社会化(行为方面);第二,个体在道德实践中不断地将自己的道德从“生活经验水平”上升到

“科学(知识系统)水平”,使道德行为从偶然逐渐变成一贯而稳定的方式,形成一种行为方式的动力定型,使认识与行动之间达到内部自动化程度,即个体不仅能承担道德的责任和义务,而且还理解这种社会化的正确性及其价值。

## 二、威尔逊的德育模式

在西方德育理论中,灌输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威尔逊(John Wilson)在一篇题为《教育与灌输》的论文中,依据教育的内容给“灌输”下定义,认为所谓灌输就是提供某种缺乏理性支持的题材或材料。他说:“如果认为,一个心智健全的聪明的人一旦了解到有关的事实和论点就必然形成相应的信念,那是不正确的”。因此,灌输就是指这样一种信念教育,它“缺乏普遍接受的根据、缺乏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认为理由充分的根据”。<sup>⑦</sup>

其实,威尔逊不仅仅强调了教育内容的问题。同时还强调了用什么方法和为着什么目的去处理这些教育内容的问题。在《德育中的灌输问题》一书中,他给“灌输”下定义的依据不再侧重所传递的信念的性质,而是侧重教的方法。在这里,他把灌输看成是不合理地将信念注入儿童心中,看作是未能正确地为信念提供理由。他说,灌输与“制服”、“强迫”不同,灌输也包括说理,并非完全是强迫的或排除意愿的活动,问题是说理的方法不当。在这部著作中,威尔逊费了很大气力来说明道德是一门具有本身内在逻辑的学科,可以作为常规课程在学校中直接讲授。这样,他的立场转变了,以前他曾认为讲授道德就是灌输,现在认为灌输就是讲授道德的方法未能使儿童独立思考和自主地做出选择。

因此,威尔逊赞成把系统讲授道德和道德思维作为学校课程体系的一个部分,分析和解释道德构件,而不是说教。这就是所谓的“直接教学”,即教师把道德教育的目的(培养人的道德品质,使之成为受过道德教育的人)直接告知学生,视学生为平等的合作者,并把道德

构件(道德组成部分)直接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充分利用它们去解决道德问题;这种道德教育的方法还向学生提供关于道德构件的理论知识,使学生有判断的固着点。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形成并发展自己的道德构件。

按照威尔逊的道德教育方法,教师是个关键的因素,其作用主要是帮助学习者发展道德构件。因此,教师必须深刻理解这些构件的理论基础,必须具有培养这些构件的实际能力。威尔逊要求教师精于哲学思考、熟练掌握教育方法。在他看来,道德是一门严格定义的学科,需要特定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技能。

在这个基础上,教师应该让学生懂得,道德构件构成道德思维的要素,它像科学思维一样,是一门严肃的学问;让学生利用已知对付未知、处理具体问题;使学生逐步脱离错误的思维方式。威尔逊认为,在道德教育中,教师的态度不偏不倚是错误的,因为“采取某种立场、态度”乃是做出道德决定的特点之一,教师的不偏不倚使学生没有机会观察到道德思考的全过程。他说,教师仅仅提供了证据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帮助学生区别证据的“优”、“劣”,并向学生示范如何从证据得出结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必然表明自己的观点。

威尔逊认为,道德教学可以形成若干专门的学科,也可以结合其它学科来进行。例如,历史和文学可以用来加强对社会中其他人的理解,角色表演和戏剧可以用来使道德问题客观化,音乐和美术则与表达感情的方式有关。

威尔逊十分重视间接的道德教育方式,即那些不直接呈现 PHIL、EMP、GIG、KRAT 等道德构件的道德教学,包括语言与交往、规则与合同、学校社团等三种具体做法。

威尔逊学派认为,道德思维与道德行为的理由均与语言有关,而语言是交往的媒介,又在交往中得到发展,所以交往也是一种德育的方法。语言教学要注意创设需要学生在其中运用语言的情境,鼓励学生发表不同见解,培养他们不受外界干扰而流畅地叙述的能力。

社交仪式的训练,如道歉、道谢等,也应受到重视。威尔逊认为,在学校的多种交往中,讨论是较好的形式之一,他十分强调这种方法在学校德育中的重要性,认为论辩能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德育过程,自主地和热情地解决道德问题。讨论时教师要让学生了解并遵守一定的规则,使他们通过讨论明白讨论的意义,讨论的参与者一律平等,注意使讨论客体化,重视讨论的进程,从具体到一般,从简单到复杂,从有情绪色彩到中性再到抽象,使答案的理由是明确的,且为多数人所乐于接受。

学生接受规则,遵守合同,这也是德育的一种方法。教师可以创造条件让学生亲自参与到形成与维持合同的活动中,也可以因人而异地向学生认证自己这方面的观点或运用生活实例、历史故事、司法案例、模拟情境、学生的亲身经历等,向他们进行这方面的教育。遵守规则就是有道德的表现,反之就要受到惩罚。威尔逊认为惩罚只是辅助手段。

学校这个雏型社团由“家庭”组成,威尔逊学派认为,学校的作用是努力使“家庭”不成为封闭系统,同时又抵制着有损于“家庭”教育效果的环境影响。“家庭”由数十名不同年龄、性别的师生组成,都是平等的人,共同参与一定的仪式。“家庭”要有自己的活动场所,且必须令人感到安全、舒适、轻松、愉快,易于发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发展道德构件。运用这一教育方法,要注意开展合作活动,使人人都体验到成功的快乐,让学生在“家庭”中拥有一定的权力、负有一定的责任,给予学生以“保护”他人和弱动物的机会,培养学生的自尊心。在“家庭”中,教师要精心组织各种文体活动,如球赛、下棋、戏剧表演等,让学生释放精力,避免因精力过剩而产生的不良行为。威尔逊等人认为,这些方法是切实可行的。

值得指出的是,威尔逊在其接触实际德育问题的某些著作中提出了一种与其主要的学术著作不同的观点,即认为德育就是传递道德规范、培养具体的行为品质,维护社会秩序。

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的情况? 威尔逊认为在学校的教育工作中“道德教育”与“道德教育的预备”是两种不同的活动。所谓“道德教育”是指培养有理性的、自动自主的、有道德的人, 学校教育应当以此为目标; 所谓“道德教育的预备”是指一个人变得理性有道德之前所必不可少的活动, “预备”亦称“前提条件”, 它包括形成自尊感的能力、对人际关系的体验以及对他人的感情作出反应的能力等等, 它们本身并非道德构件, 但在理性的发展过程中却是必要的先决因素。就这样, 威尔逊的理性道德教育又包含着传统的道德社会化。

的确, 道德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古往今来, 多少有识之士都在探讨如何更加有效地进行道德教育。英国教育哲学家威尔逊的贡献就在于对道德和道德教育作出了独到的分析和具体的规定, 为教师进行道德教育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作为一名杰出的英国教育家, 威尔逊一反英国长期以来用宗教教育代替道德教育的传统, 提出学校必须进行道德方面的教育, 并赋予学校德育以重要的使命, 这种主张不仅在“反道德教育学说”盛行的某些西方国家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对于我们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威尔逊把道德视为处理道德问题的过程, 而不是一整套用来灌输给年青一代的特定社会的道德标准, 他进而把这一过程和处理道德问题时的有关因素分解成道德组成部分, 即道德构件, 这一学说使人们对道德的结构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同时也揭示了道德教育是一个多维的、多程序的、长期的过程。威尔逊的贡献还在于, 他不但主张必须设置专门的道德教育课进行道德教学, 即为系统的道德理论知识的教学安排专门的时间, 而且他的学说为这种教学提供了可能性。在威尔逊的德育理论中, 道德思维是一个核心的概念, 他强调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 认为道德的实质就是思维, 这是寓意深刻的, 其主张对于传统道德教育既是一次突破, 又是一个补充。强调

灌输具体道德内容的传统道德教育理论与强调道德思维的威尔逊学说应当相得益彰, 有机地结合起来, 形成更完整有效的德育体系, 促进德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此外, 威尔逊提出的德育方法以及他对道德评定所作的研究, 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诚然, 威尔逊关于道德教育实践方法的描述还不够清楚, 未能提供一套完整的具体教育技术, 也没有创制具体教材。就这一点而言, 威尔逊对教育实践的影响甚至还没有科尔伯格或价值澄清学派那么大。至于道德评定的内容, 还缺乏科学实验的证明。还有, 威尔逊过分强调了个人自主的道德思考, 试图离开具体的道德内容而寻找抽象的道德过程……所有这些都削弱了其理论与实践的说服力。

### 三、科尔伯格的德育模式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的名著《阶段与继续: 对社会化的认知发展》及《儿童对道德准则的定向的发展》于1969年和1973年相继出版, 由此奠定了道德的认知发展学说的基础。这一学说认为, 人的道德性发展是与人的认知活动及其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 它强调道德判断、自律(自我调节、自我控制)等心理成份的作用, 要求教育工作按认知活动及其发展规律办事。在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中, 科尔伯格创立的道德认知发展学说是独具特色的一个重要学派, 它与行为学派、道德相对论及注重灌输的传统道德教育有着显著的区别, 对西方的道德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基于“个人——社会”的道德发展相互作用论, 科尔伯格反对传统道德教育那种“美德袋”式的品德教育方法, 认为将一些预定的品格通过无生气的方式灌输给学生是错误的, 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他说: “事实上, 传统学校道德教育的失败也许不是由于学校无力影响儿童的品格, 而是在于美国传统品格教育的观念不适当, 这种教育观念旨在通过说教、树立榜样、采用奖惩等手段进行诸如诚实、责任感等

良好习惯的训练”，“许多证据表明，当学校树立一种非传统的品格教育观念，就能对道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sup>⑧</sup>在科尔伯格看来，传统的道德教育假定存在着一种不需要实证的道德真理，不懂得教育乃是由内而外的生长和发展，忽视了儿童自我教育的作用。

科尔伯格既反对传统道德教育的灌输，也不完全赞成道德相对论的教育。他对这一学派认识到道德观的多样化和反对向儿童灌输意识形态这两点是很欣赏的，但不同意它根据多种道德观存在的事实，就肯定它们都是同等正确的。科尔伯格认为，其实这些不同的道德观反映了道德发展阶梯中的不同层次，有些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有些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因此，不应当等值地将各种道德观教给学生，而是应当促进学生发展，使他们达到最高的发展阶段或观点，即道德教育如能按照“正义”的方向去指导或促进儿童的道德发展，那就是完全正确的，既不是灌输，也不是不置可否。在他看来，道德认知发展学说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它的内容乃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它的方法尊重儿童思考和选择的能力。道德相对论的教育放弃了对儿童的指导，而灌输则企图强迫儿童接受他人的信念，科尔伯格认为，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纠正了这两种方式的偏颇。

道德认知发展学说把道德发展视为认知发展的一部分，而道德认知的发展又有赖于道德判断力和逻辑思维力的提高，因此，理性与道德思维构成了科尔伯格提倡的道德教育的基础。他认为，在儿童道德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伴随着道德反省的过程，“道德思维的功能就是解决个人之间基于原则而提出的不同意见的冲突”。<sup>⑨</sup>所以，每一阶段都有一定的推理模式，处于任何发展阶段的儿童都是道德哲学家。在科尔伯格的德育体系中，道德思维过程具有若干特点：首先，它具有相互作用的性质，道德思维意味着逻辑过程的运用，同时又意味着个人针对特定问题、经验、情境所进行

的运算，意味着将某些原则和惯例运用于具体的两难推理；其次，这些过程都紧密地同公正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所谓道德地思维就是考虑那些可能更有助于关心他人的选择，这个过程不应受到个人偏爱或群体压力的影响，因而是

不偏不倚的。

基于上述认识，科尔伯格认为德育就是发展某种独特的思维形式或结构，而不是传递或灌输具体的内容或行为，他说：“道德是一个独特的自成一体的领域……我不是根据道德的内容，而是根据道德判断、方法、观点的一般特性来给道德下定义。”<sup>⑩</sup>总之，早期的科尔伯格反复批评那种以传递或灌输具体行为或德行为任务的德育学说，认为道德首先并非一大堆具体准则或德行的综合体，而是以原则为基础的道德推理的特定方式。晚期的科尔伯格虽然已经不那么坚持上述观点了，但他仍然强调行为只是方式或程序的具体表现，内容则是程序具体化时所使用的工具。显然，在科尔伯格看来，道德是指具有某些形式特点（如普遍性、公平性等）的程序，是解决特定问题的方法。

科尔伯格强调了道德的形式性，是否就意味着完全忽视了道德内容的意义呢？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科尔伯格真正赞成的是接近于杜威道德论的观点，即割裂形式与内容是毫无意义的。他说：“……在道德分析中，说到底是无法将形式与内容截然分开的”。<sup>⑪</sup>“采用高级阶段的道德推理的形式，就意味着贯彻公正的一般内容”。<sup>⑫</sup>这就是说，道德推理的形式表明了道德的内容，而道德的内容要求运用一定的推理形式；道德乃是一种方法与程序，但是在其高级阶段包括着“公正”的内容，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制约。

至于道德行为，那是道德品质最终的表现形式。在对待道德行为这个问题上，科尔伯格认为，“一个处于道德发展较高阶段的人，不仅能够较好地思维，而且能根据其判断而行动”。<sup>⑬</sup>因此，他不主张训练具体的行为，而是强调培养道德行为的正确途径不是反复灌输，而是



反省和思考。概而言之,在科尔伯格看来,道德教育的过程不应当是把一套先定的规范、规则灌进“等待装载的心理和道德洞穴中”的过程;道德教育的目的不再单纯是“道德规则的获得”,更重要的是,它还要努力发展儿童的理智能力、独立判断能力及批判意识。

显而易见,在认知发展道德教育体系中,所谓有道德的人或受过道德教育的人,就是能够凭借反省、原则、公正观、行为倾向、对社会环境的认识和相互作用等各方面的综合结构去应付道德情境的人。这种人懂得如何思考由社会环境引发的道德问题,考虑各种选择,根据最基本的公正原则(而不是惯例、法律或一时的兴致),制订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将想法转变为行动。一句话,在科尔伯格看来,受过道德教育的人既掌握了道德思考与判断的过程,同时又使这个过程操作化,以便在这个世界上实现公正的原则。

科尔伯格要求学校必须根据儿童道德发展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科学地有计划地进行道德教育。他高度评价了教师在德育中的作用,把教师看作是道德教育家,认为教师的基本任务就是对道德发展的过程作出贡献,即成为儿童的道德认知发展的促进者。为此,教师在工作中就必须认真考虑教学方法。从20世纪70年代起,科尔伯格开始关心在道德教育方面对教师进行职前和在职培训的事情。这种培训着重两个方面:(1)使教师深刻理解道德范畴以及认知发展道德学说的理论基础;(2)通过练习和案例研究将理论转变为实际工作指南和教师的经验。科尔伯格认识到早期的他是在牺牲实践的前提下强调道德教育的认知发展理论的。因而要求重新把培训教师当作进行道德教育的起点,通过讲座、书刊、讨论会使他的思想为教师所掌握。

尊重儿童身心特点是科尔伯格对教师的基本要求。他认为教师可以促进儿童的道德水平向更高一级的阶段发展,但不能拔苗助长,使他超越阶段。科尔伯格要求教师防止下

列两种情况:一是将成人的道德观念强加给学生,结果因儿童无法理解而失去意义;二是教师的道德说理低于儿童的发展水平,结果产生消极作用。例如,当儿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而教师仍用前一阶段的道德理由去责备他做错了事时,他就会觉得教师的理由是不正确的,从而产生抵触情绪,甚至我行我素或阳奉阴违。所以,教师只有聆听并分析儿童所做出的道德判断,真正理解其意义,才能透彻了解儿童的道德思想及其达到的发展水平,从而促进他的发展。

教师促进儿童道德发展的过程,说到底,也就是促进思维和判断的过程。为此,教师要采用一系列仔细编写的程序,他们既有一定的弹性,同时又结构严整。教师的工作具体地可分为四个方面:(1)通过正常的课堂教学或者仔细安排的假设的道德两难情境,帮助学生注意并遭遇真切的道德冲突;(2)帮助学生去考虑和选择对这些道德冲突进行推理并解决冲突的思路,特别要帮助学生把道德判断与反省的过程联系起来;(3)帮助学生以批判的态度去反思他所采用的思维过程的优点与不足;(4)向学生建议一种比他现在采用的方法更完善的思考、解决问题的程序,使他在道德判断方面跃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既要提出建议又要给予干预,但不要强迫。科尔伯格认为,对于一个在道德发展的阶梯上前进的儿童来说,苏格拉底法的两个方面——耐心、倾听、接受与批判、提问、干涉都是十分重要的。

后期的科尔伯格越来越强调课程中必须采用真实的而非假设的道德两难情境,因为后者虽然也有助于讨论,但毕竟过于抽象,与实际相去甚远。同时,他越来越注意非正式的或称隐蔽的课程,即学校生活的潜在影响,把它当作道德教育中的一个要素,以之为舞台,创造群体或社会的道德氛围,激发道德问题。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科尔伯格想要复归那种把学校看作是教养“良好行为”的传统观念,而是



意味着要利用学校的潜力,通过与学生自己的生活有关的问题,使学校成为道德反省和道德行为的实验室。

近来,科尔伯格还将道德教育简缩为四个或五个阶段,把重点放在关于共同责任的社会道德上。他痛心疾首地说,现在达到第六阶段道德水平的人实在太少。从实际情况看,美国的青年越来越缺少基本的公民兴趣,不尊重社会及其基本价值观念,越来越滋长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因此,科尔伯格不断呼吁实行四个阶段的公民教育,旨在教育青年参与社会并培养其良好公民的行为和社会意识。在他看来,特别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是“正义的社区”、分享学校民主制和学校集体。

#### 四、价值澄清学派的德育模式

价值澄清理论(Values Clarification,简称VC)是当代西方一派新的道德教育学说,对于西方的德育理论和实践都有一定的影响。这派学说是作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复杂多变带来的人们思想意识混乱和学校德育工作困难作出反应而产生的,它的形成主要是依靠实验的和归纳的方法,它那套关于教育价值的假设实际上尚未构成完整的体系。据认为,路易·拉斯(Louis Raths)是最早阐明VC的一个著名学者,而后,西德尼·西蒙(Sidney Simon)、梅里尔·哈明(Merrill Harmin)、霍华德·柯森鲍(Howard Kirschenbaum)等与拉斯合作或单独出版了关于VC的练习和理论著作。

仔细阅读VC的文献即可发现,VC不用“道德教育”,而是相当一贯地使用“价值教育”来说明自己。从VC的论述看,它的价值教育的核心是让儿童学会评价过程而非传递具体的价值观。VC所言的过程,乃是由一系列非标准化的技能组并而成的,这种“过程”的教育就包括向学生示范这些技能并训练他们掌握之。好比说,所要教的过程是跑步,那么构成它的必要技能就是有规律地运动四肢、头部和控制呼吸。VC的理论家们正是按照这种意义来看待评价过程及其教育的。由此产生的问

题是,构成VC评价过程的选择、珍惜、行动、思维和沟通等技能可否与构成跑步或游泳过程的各种技能同等看待?我们认为,上述VC评价过程的各种技能都是些以某种基本价值态度为前提的活动,即VC的技能本身乃是一定价值观的反映或表现形式。可见,VC的评价过程不同于诸如游泳、跑步之类的过程。

通过价值教育,VC试图培养出这样的人:这种人有能力去掌握和运用构成评价过程的各种技能,即认知的、情感的、自我反省的和行为的能力,即这种人已条件去为自己决定价值取向。说到底,VC的评价过程不是用来审思某种道德观点、道德意识或德性,而是通过它培养出个人获得和运用有关技巧的能力。所以在VC那里,所谓“受过道德教育的人”,其实就是“受过训练的人”或所谓“健全的人”,“这种人对于自我以及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有着健全的意识”。看来,关于个人,VC谈了许多;关于道德或教育,VC却讲得很少。

在VC看来,社会环境是价值问题时常发生于其中的舞台,它仅仅是背景,并非价值取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VC认为,评价过程可能发生在社会环境之中,也可能涉及社会问题,但它的进行并不取决于社会。按照VC的准则,进行道德教育并不一定要借助某种重要的文化(道德)传统或价值体系,只有当它们在促进评价过程方面具有程序上的价值,它们才是有用的;而且,这些重要的传统本身并不具有权威性,因而系统学习基督教义、犹太教义、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就不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现在不难理解为什么在VC的论著中“灌输”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词汇,因为VC的出发点正是为了摒弃灌输这样的传统的教育概念与活动。在VC那里,作为褒义的“价值澄清”一词的对立面的就是贬义的“灌输”一词。VC经常将它与“注入”、“说教”、“强迫接受”和“洗脑”等词等同使用,认为这类活动有三个特点:(1)“灌输”基于这样的前提,即教育者掌握的是“一套正确的价值观”,完全值得教

给儿童,也就是说,它假定关于价值问题存在着经过验证的、一致同意的和确定的答复。而VC的基本出发点却相反:世界在不断地变动,今天并不存在关于价值问题的确定答案。(2)“灌输”意味着一系列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方法,把儿童看作是完全被动的,任意加以摆布和塑造。VC认为,传统的教育方法无助于人们去解决今天的困扰和冲突,应该避免“转变”、“操纵”之类的做法。VC用以描绘价值教育的动词大多是“检验”、“澄清”、“达成”和“考虑”等。(3)“灌输”意味着“非个性化”,因为它必然承认“英雄”、“历史”、“既成事实”的正统性,并把它们视为使其它事物合法化的力量,这就扼杀了儿童自己的思考和选择,是“他人定向”(other-directed)而不是“内心定向”(inner-directed)。

显然,VC对“灌输”缺乏分析,这种“澄清”学说却使是非不清。我们认为,VC重视发展学生的道德(价值)意识、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反对死板的说教和灌输方法,这在批评学校德育中某些传统方法的弊病时是对的。然而,他们只重视德育的过程和方法,只重视澄清个人价值的过程和方法,一味否定说教和灌输方法;认为价值观是不能教的,忽视和否定了德育内容的重要性,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VC明确规定了教师的作用,那就是使学生情境和谐并发挥最大的效用,以便评价过程顺利展开;教师可以有本人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个人生活作风,但所有这些不应妨碍他去发挥更基本的功能——促进评价过程。也就是说,VC的教师并不教给具体的实质性的价值观念,也不作为理想的道德行为的楷模,而是作为一名技师去促进一系列技能的培养,就像训练者或精神治疗学家那样,通过适当的问答程序帮助人们发展必备的评价技能。

VC通过大量的出版物手册向教师提供了许多具体的教学方法,使之成为西方众多德育方法中流行最广、最为实用的一种。有人这样议论: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德育学说是为研究

人员和学者而设,VC的方法则是供教师之用。这些方法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谈话法;书面作业法;直观与游戏的方法。

谈话法就是以问答的形式促使学生运用基本的评价过程以得到比较清晰的个人价值观。例如澄清应答法就是美国学校德育中应用得最多的,也是最灵活的一种形式,这种方法主要是教师与学生的一对一的交谈。举一个例子说,有个学生同他的教师讲,他在中学毕业后将要上大学深造。对此,教师要作出应答。教师可能会回答:“上哪一所大学?”或者“那很好,祝你成功!”诚然,这些回答对学生多少会有点作用,但未能真正帮助学生澄清价值。VC认为,如果教师回答说:“你考虑过其它选择吗?”这就有可能促使学生去思考未来生活的种种目标,并预计各种可供选择的目标的利弊得失。<sup>⑭</sup>

运用澄清应答法,教师首先要创造一种融洽的气氛,让谈话可以在坦诚、轻松的情况下进行。根据评价过程,VC要求教师做到:(1)鼓励儿童自由选择。教师可用作“澄清性反应”(the clarifying response)的问题有:“你从何处得到这种想法?”“你持有多少种这样的想法?”“如果你不照你所说的那样做,其他人会说些什么?”“你曾向谁求助?你还需要进一步的帮助吗?我能够帮助你吗?”“在众人中你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吗?”(2)帮助儿童从各种备择项目中选择。教师可用作“澄清性反应”的问题有:“在选择之前还考虑过什么?”“你考虑了多久?”“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吗?最后决定时,你考虑些什么?”“你是否还需要协助?”(3)帮助儿童仔细权衡每种选择项目及其可能发生的后果。教师可用作“澄清性反应”的问题有:“每一种备择项目的后果会是怎样?”“你考虑够了吗?你的思路怎样?”“我明白你所说的话吗?”“你的意思是……?”“你的选择假定了一些什么?让我们看看……”(4)鼓励儿童考虑什么是他们所珍爱的事物。教师可用作“澄清性反应”的问题有:“你是否高兴自己这样?”

“你持这种想法已有多久?”“这些东西对于你达到什么目标有好处?有什么好处?为何对你这么重要?”(5)给儿童去别人面前肯定自己的选择的机会。教师可用作“澄清性反应”的问题有:“你能否将你的感受告诉班上同学?”“你是否愿意签名肯定你的想法?”“你是否真正相信你的想法?”“你所说的有没有人相信?”(6)鼓励儿童按照他们所作的选择去行动、实践和生活。教师可用作“澄清性反应”的问题有:“你的话我听了,你有什么想做的吗?我能够帮你吗?”“你第一步怎样做,第二步呢?”“你愿不愿意花钱将你的选择付诸实现?”“有没有什么团体努力的目标与你一致?你会加入他们吗?”(7)鼓励儿童有意识地重复这种行为,并逐渐形成他们的生活方式。教师可用作“澄清性反应”的问题有:“你已经做了些什么?你是否经常这样做?”“你如何计划做多些?”“你是否应该激发他人发生同样的兴趣和参与?”等。

VC的谈话法各式各样,归纳起来这类教学法具有十大特点:(1)避免说教、评判和给予现成的价值观;(2)让学生自己审思本人的思想与行为;(3)鼓励但不强迫,允许学生拒绝参与谈话;(4)不求谈出惊人的成果,但求创设一种氛围并刺激思维;(5)不用于获取资料和口头审查;(6)谈话常常止于某一点,并非无休止的讨论;(7)教师的澄清性反应针对具体学生而做出,因为价值观是个人的事情;(8)不必用于讨论每个人所说的每件事;(9)澄清性反应在没有“正确答案”的情境中发生作用;(10)并非机械的程序。<sup>⑮</sup>

书面作业法的目的任务与谈话法相同,所不同者只是在书面形式基础上开展集体讨论。例如教师可将下面表格发给学生,然后按下述步骤去做:(1)由教师和学生一起指出一些有争议的价值观念问题,如堕胎、同性恋、吸毒、环境污染、安乐死、种族歧视等;(2)由学生将这些社会问题列在表格的左边,在社会问题之下;(3)由学生私下写出他对这些问题的立场;

(4)让学生按评价过程的七个步骤(VC<sub>1</sub>)去评估这些问题;(5)学生填好表后,可三人一组,讨论他们所填的有关内容。

社会问题	立场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								
.								
.								

第三类方法包括使用没有解说词的图片、电影戏剧的片段、激发性的问题、幽默的故事和游戏等,这些方法着重沟通和讨论,旨在使群体有助于个人仔细考虑本人对价值问题作出的反应,让群体的经验成为个人在取值方面自我教育的工具。现以“价值焦点游戏”为例,其步骤是:(1)教师先用两个未完成的句子(如“当我和一群……人在一起,我觉得很愉快。”“当我和一群……人在一起,我觉得很讨厌。”)作问题,让学生回答以引起动机;(2)学生回答后,三人一组,每人用5分钟时间陈述自己的答案,另外两人要做到全神贯注地聆听,保持目光接触和微笑,态度要坦城,明白人家的观点,用发问来澄清陈述者的感受;(3)各组员可表达其不同意见,共同讨论。<sup>⑯</sup>

VC教学法突出了教师的引导作用和学生的主动性。要求教师注意引起学生的道德动机和内部道德冲突,然后引导学生就道德问题进行思考、判断、评价并从中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和道德信念,促使学生从事道德实践,从而达到预期的德育目的。这些做法不无可资借鉴之处,但是VC相对地忽视了根据具体情况从外部促进学生道德发展的各种方法,包括榜样示范、循循善诱地传授道德知识和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等。整个VC学说的症结正是在于它完全否定了道德的客观真理性和外力塑造的作用。

①④涂尔干著,胡伟译:《社会学研究方法》,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 页。

②③⑤Emile Durkheim, "Moral Educ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P. 21, P. 271, P. 120.

⑥⑨⑩⑮Barry Chazan,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Moral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85), P. 23, P. 78, P. 81, P. 63.

⑦John Wilson, "Education and Indoctrination", in "Aims of Education", T. H. B. Hollins, ed. (Manchester, Eng.: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27 - 28.

⑧Lee C. Deiphtoh, ed., "The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The MacMillan Company & The Free Press, Vol. 6, 1971), pp. 401 - 402.

⑩Lawrence Kohlberg, ed. "The Philosophy of Moral Development"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1), P. 170.

⑫ H. Rorvik, "Content and Form in Kohlberg's Theory of Moral Development", i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XXIV, 3(1980), P108.

⑬ Lawrence Kohlberg and Elliot Turiel, "Moral Development and Moral Education", in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Practice", Gerald Lesser ed. (Glenview, Ill.: Scott Foresman, 1971), P. 414.

⑭参见魏贤超:《价值澄清学派的道德教育学说》,《外国教育动态》1984 年第 4 期,第 52 页。

⑯参见徐明心编著:《儿童德育:从理论到实践》,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出版,1988 年,第 63 页。

责任编辑:叶金宝

# 浅议创新人才的培养

□ 费 冰

(华南师范大学助教, 广东 广州 510063)

[摘 要] 本文认为培养创新人才必须深化教育改革, 指出教育观念的转变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首要前提, 学研产结合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主要手段。

[关键词] 创新人才 教育观念 学研产结合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75-03

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后, 正在步入知识经济社会。知识经济是基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经济。而创新离不开高级专门人才。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创新人才的历史使命。在第三次全教会上, 江总书记指出:“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 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要完成这一使命, 高等教育必须深化改革。

## 一、转变教育观念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首要前提

培养创新人才, 首先必须转变教育观念,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这是知识经济对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对人才的要求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农业社会以土地为经济的核心要素, 工业社会以资本为经济的核心要素, 传统的农业和工业更主要的是需要大量的经验性和专业技术型人才。而知识经济社会则是以知识为经济的核心要素, 由此带来了知识的飞速发展和科技的突飞猛进。知识经

济时代, 可以说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 显然, 仅靠学习已有的知识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它要求人们既要不断地学习, 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还要投身到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之中。因此, 人的素质比任何时代都显得更为重要。相应的, 教育也应从以注重知识的传授为主, 转变到以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为主。

“知识就是力量”, 过去, 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多侧重于知识的学习, 学校教育因此也侧重于知识的传授, 学生也是以知识的掌握为学习的主要目的。在传统社会, 这无疑是正确的。在计划经济时代, 我国的高等教育十分重视专业教育, 以至于把专业教育狭隘地理解为职业技术教育, 其突出表现就是, 专业越分越细, 学生的毕业分配强调“专业对口”, 强调学什么就干什么。这显然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知识经济要求的人才, 不仅要掌握知识, 更要会从事知识的创新。而创新则需要具有很高的综合素质。因此, 传统社会要求的人才是掌握知识, 而知识经济要求的人才则是具有很高的素质。

从注重知识的传授到注重能力的培

养和素质的提高,表明教育观念的深刻转变,也是对教育本质的深刻认识的体现。当然,我们强调素质的重要,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知识的传授和高等教育可以不搞专业教育。知识和素质的关系,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传授知识和专业教育是手段,提高素质是目的。在高等教育中,如果忽视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教育,提高素质也就成了无本之末,无源之水,只能是一句空话。

转变教育观念,要彻底改变我们过去过分强调共性而忽视个性的弊端。创新人才既离不开共性,更要有突出的个性。在强调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时,注重的是共性,而在强调创新时,注重的是个性。杨振宁教授形象地指出,中国传统的教学是演绎法,即从大原则出发,一步一步地推导,最终得出结论。这就是强调共性。而美国的教学是归纳法,即他们注意的不是最高原则,而是更注重新的现象,从中抽象出新的精神。这就是强调个性。杨振宁教授认为,他自己是两方面都得到了最大的好处。<sup>①</sup>

过去,人们用“风格即人”来形容艺术创作中艺术家个性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而科学家似乎无所谓个性化风格,他们面对的是严谨的客观规律。实际上,正如在艺术创作中,无个性亦即无艺术创造一样,科学创新同样也是个性化的表现。杨振宁教授在《美与物理学》<sup>②</sup>中形象地描绘了狄拉克与海森堡两大物理学家的不同的科学风格。因此,完全有理由说,在任何创造性活动中,无个性即无创造。

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是滋生学术创造的必要土壤。在教学中,也要营造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的气氛,真正做到使学生不惟书,不惟权威,不惟教师。教师也要明白,要让学生做到“君子不器”,也

就是说,学生不只是接受知识的器皿,而是有着无限创造力的主体,教师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是把知识的发现过程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创造中学习创造,以激活学生的创造潜力。

转变教育观念,还要求我们从过去狭隘的专业思想中解放出来。首先,如前文所述,专业教育是提高素质的手段;其次,专业不等于职业,专业不能越分越细,创造需要宽厚、扎实的基础,创新往往产生于学科的交叉和渗透之中。同时,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也是创新教育的重要内容。

## 二、学研产结合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主要手段

学校是以教学为中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创新人才培养来说,仅仅知识教学还是不够的,因为研究是创新的主战场,校办产业则为学生提供了实践的场所。

回顾世界高等教育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早期的高等教育,是以教学为中心的,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学校是传授知识的机构。19世纪中叶,德国著名的教育家洪堡首先提出,大学要加强学术研究,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从事知识的开发。从此,德国的大学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这一模式渐渐为大家所认同。大学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成为世界研究型大学的共识。

我国高等教育,在一段时间内,主要强调学校是以教学为中心,科研处于次要位置(主要科研任务课由科学院及有关的科研机构承担),校办产业也仅仅只限于为学生提供学习场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教育和科学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不断深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人提出高等教育应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不久,这



一认识为高等教育界所接受。同时,由于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科研与生产相脱节的局面,大量的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造成了惊人的浪费。为改革这一不合理的局面,有些高校率先办起了校办产业,把学校的科研成果直接运用于生产,科技成果也很快产生了经济效益。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部分校办产业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改革开放的 20 多年,我国高等教育以教学为中心,逐渐发展成为教学、科研、产业三者并重的新格局。

如果说,教学是以知识传授为主,科研是以知识的创新为主,产业为科技成果提供了转化为生产力的场所,那么,学研产的结合,则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完备的条件。

首先,改变了传统的教与学的含义,教与学的内涵扩大了,内容更丰富了。教的内容不仅仅只是那些科学结论,而且还包括那些尚无定论亟需研究的课题。学不再是被动地接受那些已成为定论的知识,学生学的是在学校自身研究开发基础上形成的新知识,这就使得学生能够直接面对科研的前沿,直接了解知识创新的过程,部分优秀的学生还可以直接参与知识创新之中。此外,学不仅仅是在课堂上向教师和书本学习,学生还可以在校办产业中实践学习,在实践中发现企业所面临的科技难题,从而激发学生从事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潜力。

其次,为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过去,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单一,而学生的资质、个性、创造潜力则各有不同。在统一的教学计划和培养模式下,学生的培养,犹如标准化的流水线的生产,以一种程序化、标准化的模式进行,因此,我们的许多学校可以培养

大批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如工程师、技术员,但很难培养大量的创新人才,尤其是难以培养大师级的人才。学研产的结合,为学生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大学四年中,学生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逐渐分化,人才的层次渐渐分明。创造潜力一般的学生以其扎实的基础和过硬的专业知识从事一般的专业技术工作,而创造潜力大的学生则很快进入创新的前沿。目前,我国部分高校已在这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探索。有的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就参加到科研课题组中,并取得了科研成果;有的学生用自己的科研成果或发明开办了公司;还有的学校则放宽了学生毕业的限期,允许学生以更为宽限自由的实践从事科研和开发工作。年轻人富有朝气,敢想敢干,许多科学大师都是在其青年时期就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取得了学术生涯中最高的成就,如果我们不能为青年人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将会产生巨大的损失。

再次,学研产的结合还营造了培养创新人才的浓厚的校园氛围。过去,我们比较注重具体的教学环节,而对学校氛围的作用注意不够。其实,学校氛围往往是“润物细无声”,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学研产的结合,使得学生置身于浓厚的学习、科研、开发的氛围之中,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励学生早日成才,其作用不可低估。

---

①见杨振宁:《我的治学经历与体会》,《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 1 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②见《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 3 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年 6 月第 1 版。

责任编辑:叶金宝

# 改革创新——迈向新世纪 的素质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

□ 伍柳亭 李禾田

(广东省教育学会 广东 广州 510035)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78-02

1999年12月22-25日,由广东省教育学会举办的“改革创新——迈向新世纪的素质教育”学术讨论会在广州召开。来自全省的65位论文作者和省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参加了讨论会。开幕式上,省教育学会会长许任之致开幕词,省教育厅副厅长刘达中、李小鲁分别作了专题报告。本次会议围绕如何在教育教学领域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与如何正确理解和实践推进素质教育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简要综述如下:

## 一、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渠道的讨论

与会者认为,在支撑素质教育的理论上要把握五个方面:1、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2、邓小平“三个面向”的教育理论;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市场经济理论;5、信息时代理论。这些理论为推进素质教育,端正教育思想,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新的世纪,新的格局,数字地球概念的提出,以信息技术为重要标志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现代化、学习化社会的发展,都将会给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乃至思维方式带来深刻的变革,直

接影响着新世纪的教育规模、改革态势乃至人才规格、培养模式,素质教育决定着整个国民素质与综合国力的提高,因此,素质教育的推进,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

素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素质教育的推进要抓住课堂教学改革这一中心环节,整体推进。李小鲁认为,实施素质教育要全面理解其意义,要以改革为动力,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提高素质教育过程的知识含量是教育改革的中心环节。要防止素质教育目标选择的片面性,要历史地看素质教育,不要把素质教育同过去的教育,尤其是建国50年来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相割裂;要辩证地看素质教育,不要把素质教育同考试这一评价手段相对立;要联系地看素质教育,学科内部文理综合,德智体等各育相联,课内外沟通,教育氛围融为一体;要注重教育目标、教育过程、教育评价等全面改革,整体推进。刘达中认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考虑八个方面的配套改革:1、思想观念的转变是首要因素;2、理论研究是导向;3、课程教材是核心;4、课堂教学是主阵地;5、师资素质是根本;6、教育体制改革是基础;7、督导评价机制是关

键;8、法规系统是保障。要优质足量构建三类八大工程,基础类:1、优化教育结构工程;2、教育安居工程;3、优化教师素质工程;4、课程教材改革工程;5、优化课堂教学工程;发展类:6、教育信息化工程;核心类:7、教育现代化工程;8、科研促教、科研兴校工程。

从历史、现实与未来三方面来考虑,可以说,创新教育是素质教育的深化,创新教育的实施是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的必然趋势。

## 二、对“创新”及“创新教育”本质意义的认识

与会者认为,正确理解与把握“创新”及“创新教育”的本质意义,是创新教育进入实践操作之前必须解决好的前提条件。从哲学意义来看,“创新”本属意识的范畴而非物质的范畴,反映的是内化在人的素质结构之中的某种特征。它以人的创造性劳动为载体,外现为人的某些行为特征和能力,通过人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从一种内在的意识存在状态物化为一种外在的物质存在状态。因此,人们往往用“精神”、“品质”等词语来揭示“创新”所具有的意识属性。从哲学意义引伸到教育学的意义来看,既然“创新”是人类能够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的一种本质,将“创新”这种人类普遍存在的“基因”激活,在引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强化人的“创新意识”。这就是“创新教育”的本义所在。

有人认为,从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创新是一切人类社会活动的核心之所在,是人的本质力量发挥的最高表现,是人对现实的不断超越。从个体意义上来看,创新是指个人以一种探究的态度产生出个体的水平上的新的经验,其新与不新的评价不是依社会规定的标准来衡

量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把创造性分为“有特别才能的创造性”和“自我实现的创造性”两种,前者是指科学家、艺术家、天才人物的创造性;后者是指人人皆有的,但其创造活动不一定得到社会承认,而只是他们自己才感到是有价值的新经验。中小学生的创新主要是指个体意义上的创新,即中小学生在自身的心理水平上去建造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其活动过程及结果在多数时候都并不直接显示出社会价值。也可以说,中小学的创新教育不是面向少数人的天才教育,而是面向全体学生包括天才教育在内的基础教育。

有代表认为,强调创新教育要防止走入误区,在认识上,对创新教育的内涵,可以用四个并列句式来表述,即:创新教育不是一种单纯训练学生发明创造技巧的教育,而是一种全方位的改造教育过程和学生成长过程的教育;创新教育不是一种培养少数尖子学生的英才教育,而是一种面向全体学生的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不是一种只重结果上的创新特征的教育,而是既重结果、更重过程上创新特征的教育;创新教育不是一种以挖掘个体某项能力为价值目标的教育,而是一种要从个体心智世界中源源不绝地诱导出一些提供最佳创意的人格特征的教育。实践中要注意三点:1. 创新教育不是只设一门课程,而是要体现一种精神的培养,要贯穿学校工作的各个环节;2. 创新教育不是只培养某种能力,而是培养一种品质,要体现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3. 创新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理性说教,更是一种感性体验,要通过多层面、全方位的实践活动使学生的创造性得以升华。

责任编辑:叶金宝

# 论中国史学发展的形态演进 与特征变化

□ 李小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 100872)

**[摘要]**中国史学诞生于氏族公社时期,其存在形式是以全民性为特征的原生形态的史学。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在统治阶级的控制和利用下,中国史学由原生形态的史学向以庙堂化为特征的过渡形态的史学逐步转变。过渡形态的史学对广大普通民众的忽视,与史学的性质和目的相背离,这种背离最终引发了史学向自身本性的回归,中国史学开始了由过渡形态的史学向以大众化为特征的终极形态的史学转化的历程。

**[关键词]**中国史学 形态演进 特征变化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80-07

史学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的。当中国社会逐步走向进步的时候,作为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记录与总结,中国史学也相应地经历着原生形态的史学、过渡形态的史学和终极形态的史学三个发展阶段以及由此带来的史学特征的变化,这便是中国史学此前已经走过,现在正在走着和未来必将经历的发展历程。

## 一

原生形态的史学生发于原始先民实践活动的需求,它是中国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期史学存在的基本形式。在这一时期,为了维系本氏族的血缘关系,继承和发扬氏族的优良传统,必须使每一个氏族成员了解氏族发展的历史,从而为氏族的兴旺发达努力奋斗,这是氏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顺应这一需要,面向氏族全体民众进行的以追述祖先的系谱与业绩、讲述氏族的传统与历史为基本

内容的讲史活动随之诞生。这是一种以全民性为特征的史学,这种全民性特征集中体现在史学内容的全民性与服务对象的全民性两个方面。

就第一方面而言,由于这一时期人类的主要活动是氏族部落的成员为了求得生存同大自然作斗争并围绕这一斗争开展活动,原生形态的史学即以氏族全体民众的这种活动为内容,讲述他们的生产与生活,从而形成史学内容的全民性。另一方面,由于氏族部落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全体氏族民众的共同努力,为此,原生形态的史学面向氏族全体民众进行传述,使氏族部落的全体成员接受历史的教育,熟悉本族的历史,从而形成服务对象的全民性。

原生形态史学的这种全民性特征,是史学记述民众活动、满足民众需求这一性质和目的的直接表露。

民族学的调查表明,这种以全民性为特征的原生形态的史学普遍存在于我

国处于氏族公社阶段的各民族中。解放前,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苗族、瑶族、侗族、纳西族、景颇族、阿昌族等少数民族仍旧保留着这种氏族公社时期流传下来的口头传述本族历史的原始习俗。在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借助各种节日庆典和祭祖仪式传授本族历史。这些节日庆典和祭祖仪式围绕着缅怀民族祖先、宣扬民族历史这一主题展开。在庆典和仪式上,他们要唱以“叙述民族远古历史”、“颂扬祖先的业绩”为内容的“追念祖先歌”,通过唱颂这种叙史歌谣,使本族广大民众了解“祖先的历史”,接受“本民族历史、本民族传统的教育”,达到“灌输同一祖先的同胞意识,融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以增强同族的团结和斗志”的目的。<sup>①</sup>例如侗族,“过去没有文字,人们就靠古歌来传承民族历史文化,在婚丧嫁娶,喜庆日子里,都要唱古歌,追溯祖先的来历和民族迁徙的历史,一方面是对祖先的怀念,一方面进行传统教育,使子孙后代不忘民族的历史和祖先创业的艰辛。”<sup>②</sup>在这些民族中,熟悉叙史歌谣、牢记本族“根谱”、不忘本族历史是他们共有的习俗。如阿昌族在其叙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中便告诫说:“阿昌的子孙啊,你记不记得阿公阿祖走过的路?你知不知道我们阿昌的历史?”<sup>③</sup>

文献记载证实,我国远古时期同样存在着这种歌唱形式的口传史学。在我国先秦典籍《诗经》中,《商颂》里的《玄鸟》、《长发》以及《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篇章,便记录了商族和周族早期原生形态口传史学的一些内容,梁启超认为,这种“一般人民咸爱而诵之”的历史记述,“殆可指为中国最初之史”。<sup>④</sup>显然,这是一种带有全民性特征的口传史学。

在以史诗唱颂本族历史的同时,口头讲述也是各民族传授历史的常用方式。通过这种讲述,使本族的历史发展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下来,流传下去,从而成为各民族与史诗并存的另一种形式的“口传的历史”。<sup>⑤</sup>与史诗一样,这种口传史学在对史事的记述与传播方面,“起到了文字和史籍典册的作用”。<sup>⑥</sup>

原生形态口传史学的存在,早就引起了我国史家的注意,北朝著名史学家魏收在记述拓跋族先世的情况时便说,拓跋族的远祖时代,“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简易为化,不为文字,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sup>⑦</sup>我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论及中国史学早期的发展历史时也说:“最初之史乌乎起?当人类之渐进而形成一族属或一部落也,其族部之长老,每当游猎斗战之隙暇,或值佳辰令节,辄聚其子姓,三三五五,围炉藉草,纵谈己身或其先代所经之恐怖所演之武勇……等等。听者则娓娓忘倦,兴会飙举。其间有格外奇特之情节可歌可泣者,则蟠踞于听众之脑中,湔拔不去,展转作谈料,历数代而未已,其事迹遂取得史的性质。所谓‘十口相传为古’也,史迹之起原,罔不由是。”<sup>⑧</sup>

由上可见,以口头传述氏族部落全体民众的生产生活为内容,以满足氏族部落全体民众的需求为目的的原生形态的史学是进入阶级社会之前中国史学存在的基本方式,它是我国早期历史发展情况得以保存、流传和我国先民了解自己历史的唯一形式。

当然,原生形态的史学尚处于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初始阶段,因而难以避免地带着一切处于萌芽时期的学科所必然存在的原始与落后。这种原始与落后表

现在史学的各个方面,如没有完备的历法而在时间记载上不够精确;因为还未发明文字,只能依赖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信息载体——语言进行传述而在载体上显得比较原始;由于原始社会历时长久,史事众多,而人脑的记忆有限,因而传述内容十分简略;由于氏族部落间的交往有限,对外界的了解较少,因而记述与传播范围比较狭窄;由于其主要作用是教导氏族部落的成员,教育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因而社会功能单一;由于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十分肤浅以及原始宗教的普遍存在与影响,因而神灵观念较为浓厚,等等。

社会的进步和史学自身的发展,促使史学逐步改变这种原始与落后的状况,向更高一级的形态转化。

## 二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中国史学开始由原生形态向过渡形态转变。中国过渡形态的史学是顺应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与史学产生和发展初始阶段的原生形态的史学相比较,它在历史观上有了明显的进步,记录的空间范围大为扩展,记述时间趋于精确,记述内容更加详细、完备,表述形式更为丰富,史学载体更为先进。它是史学更高一级的存在形式,体现了史学的发展与进步。它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诸多的优良传统。这些传统主要有:通过修史记事论人,彰善瘅恶,激浊扬清,不忘史学承载的社会责任;树立为史学事业献身的精神,无论个人遇到什么困难,无论社会发生何种变故,都不停止史事的记录和史著的撰修,即司马迁所谓“就极刑而无愠色”,“虽万被戮,岂有悔哉”,<sup>⑨</sup>以保证历史记述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坚持“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的如

实记述历史的原则,做到“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sup>⑩</sup>以保证历史记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注重史家的个人修养,从德、才、学、识等方面提高史学家的素质,以保证史事记录和史书撰修的质量;关注现实,注重“经世”,坚持“鉴往所以训今”,<sup>⑪</sup>“述往以为来者师”<sup>⑫</sup>的著史目的;等等。这些优良传统,充分体现了中国史学对崇高目标和自身完美的追求,是过渡形态史学留给后代的极为宝贵的财富。

在这些优良传统的熏陶之下,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使我国数千年文明历史的记录代代延续,从未间断,所谓“国灭史不灭,故虽偏霸之朝亦皆有史。”<sup>⑬</sup>中国史学由此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突出成就。因而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故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他国殆莫与京也。”<sup>⑭</sup>这是过渡形态史学对中国史学作出的重要贡献。

但是,也应当看到,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统治阶级特别是最高统治集团为了巩固政权、维护统治,为了满足其流芳百世的心理需求,不断强化对史学的控制和利用,反映统治阶级思想、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以史官著述为代表的“庙堂史学”逐步成为过渡形态史学的主流,“庙堂化”成为过渡形态史学的基本特征。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三千年史乘,常以此等史官之著述为中心。”<sup>⑮</sup>过渡形态史学这种“庙堂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历史观的庙堂化。尽管从西周时期开始,以“人事”解释历史的思想逐步取代了“天命”主宰历史的神学史



观,这无疑是历史观的重大进步。但是,在过渡形态史学注重人事的观念中,英雄史观始终占据着主导的和核心的地位,所谓“人事”,只是“英雄”、“王者”等少数统治阶级活动的代名词。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中国前辈之脑识,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sup>①⑥</sup>在他们看来,“国家及人民,皆为君主而立者也,故君主为国家之主体。”<sup>①⑦</sup>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更明确地指出,指导中国旧史的是一种陈旧的和落后的历史观,这种“陷于很大的谬误”<sup>①⑧</sup>的历史观的特点,是认为“历史只是政治,政治只是主权者的行动。”<sup>①⑨</sup>

其二,记述内容的庙堂化。在庙堂化史观的指导之下,过渡形态的史学在记述内容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庙堂化特征。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出现的被视为史学基本活动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录的便是统治阶级的“言”和统治阶级的“事”。所谓“事为《春秋》,言为《尚书》”。<sup>②①</sup>而“百国《春秋》”与《尚书》,或记“人君动作之务”,<sup>②②</sup>或载“典、谟、训、诰、誓、命之文”,<sup>②③</sup>二者皆为庙堂之史。自此以后,过渡形态史学的内容,始终以上层活动史为重心,“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sup>②④</sup>记录这些上层人物如何“攻城争地”,如何“取威定霸”,如何“固疆圉、长子孙”,<sup>②⑤</sup>等等。李大钊指出:“从前历史的内容,主要部分是政治、外交,而活动的事迹完全拿贵族当中心。”<sup>②⑥</sup>又说:“从前的历史,专记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史家的职分,就在买此辈权势阶级的欢心。”<sup>②⑦</sup>与此同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普通民众的活动,被过渡形态的史学视作无关紧要的“州闾细事”,有关民众活动的口头流传被斥之为“委巷琐言”、“嗤鄙异闻”、“乌菟鄙说”,被认为“违理”、“损实”而不得“刊为

竹帛正言”。<sup>②⑧</sup>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出了过渡形态史学内容上的庙堂化特征。

其三,传播对象的庙堂化。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在过渡形态的史学中,一方面,氏族公社时期流传下来的大多数讲史活动逐渐被统治阶级垄断而变为“庙堂讲史”,<sup>②⑨</sup>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史著,其流传范围只局限于统治阶级和知识阶层这一狭小的圈子,从而使过渡形态的史学在传播对象上呈现出庙堂化的特征。对此,梁启超指出说,中国的“旧史”,是“专供特殊阶级诵读”的,<sup>③①</sup>“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sup>③②</sup>包括《春秋》、《资治通鉴》、《史记》等史学名著在内,“诸史目的略同,大率其读者皆求诸禄仕之家与好古绩学专门之士。……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sup>③③</sup>

其四,表述形式的庙堂化。由于过渡形态的史学是以统治阶级和知识阶层为传播对象的,因而决定了它在撰史的文字表述和讲史的语言选择上皆以典雅古奥为特色,显得艰深晦涩,很难为普通民众接受,无法在民众中传播,从而形成表述形式的庙堂化。这正如明人修髯子所说:“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sup>③④</sup>清人许宝善也说:“史之言,质而奥,人不耐读,读亦罕解。故唯学士大夫或能披览外,此则望望然去之矣。”<sup>③⑤</sup>

随着“上层活动史”对史事记录的垄断和统治者对史学控制的加强,中国过渡形态史学的庙堂化趋势日益严重并最终形成“庙堂史学”独霸史坛的局面,史学成了统治阶级和知识阶层的专利品。

### 三

不可否认,以庙堂化为特征的过渡

形态的史学是中国史学必然经历的发展阶段,对于它为中国史学发展所作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它的诸多优良传统也应当得到继承和发扬。但是,客观历史本身是以广大民众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广大普通民众所从事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基本保证,在历史发展中占据着主体的地位,这是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使是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还没有科学认识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君主、朝臣等上层人物的言行,他们争夺领土和最高统治权等等活动,远不是历史的全部,也不是历史的主体,而“只是历史中的一小部分”。<sup>④</sup>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也说:“认历史为朝廷的专有物”,以为“舍朝廷外无可记载”的观点,是中国旧史学的一大弊病。在他看来,在历史的进程中,“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sup>⑤</sup>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则十分明确地指出:“社会的进步不是靠少数的圣贤豪杰的,乃是靠一般人的。”<sup>⑥</sup>他强调说,历史上的一切发明及其应用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的进步,“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社会上人人劳作的结果”,它“变动了社会的全生活,改变了历史的阶段。”因而,“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sup>⑦</sup>毫无疑问,作为以客观历史为记述与研究对象、以真实地反映历史为生存要素、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为最高目标的史学,应当而且必须以广大民众为重心,如实地反映他们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地位与作用,并将广大民众作为自身服务的对象,这是史学性质和目的之所在。

由此可见,过渡形态史学的庙堂化,它对广大普通民众的忽视,与史学的性

质和目的是相背离的。这种背离在使史学的记述对象变得十分狭窄,传播范围大为缩小的同时,也使史学的社会功能——素质教育功能、道德教化功能、历史认识与鉴戒功能等被严重弱化。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过渡形态史学的发展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背离给史学带来的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这种背离对史学发展的阻碍作用便日益明显地显示出来,从而引发史学向自身本性回归,中国史学开始由过渡形态向终极形态转化。

中国终极形态的史学是以大众化为基本特征的史学,虽然它同原生形态史学一样,都以记述民众和服务民众为核心,但是,它在思想上的进步性、内容上的丰富性、形式上的多样性、传播上的广泛性、功能上的完备性、载体上的先进性等方面,都远非原生形态的史学所能比拟,它是中国史学最为成熟和最为先进的形态。

中国终极形态史学出现及其逐步成熟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史学由庙堂化向大众化不断转化的历程。这一历程发端于宋元时期史学传播方式的大众化。在这一时期,一批生活于社会下层的以讲史为谋生手段的职业通俗讲史人开始出现,他们或活跃于普通市民从事商品交易和消遣娱乐的“瓦市”中;或讲史于“娼妓弟兄”、“诸行借工卖伎人”等下层民众“打聚处”的中小型茶坊、酒肆内;<sup>⑧</sup>或游走于小镇乡间,在闾里小巷、村旁路边随时“作场”讲述。他们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情节和丰富的内容面向广大民众讲说历史,引起了普通民众的极大兴趣,成为“听者纷纷”、盛行不衰的一种历史传播活动,<sup>⑨</sup>从而形成史学传播方式的大众化。

进入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市民数量进一步增多,他们对日常娱乐生活的要求日益提高,他们的历史求知欲以及对历史文化的兴趣也日趋浓厚。与此相适应,一种可供其随时阅读以了解历史和消遣娱乐的通俗历史读物随之大量出现。这种通俗历史读物以“演义”、“通俗演义”、“全传”、“志传”、“志”、“传”、“书”等为名称,或记前代历史,或述当代史事。记前代史者,多以“宗乎正史,旁及群书,搜罗纂辑,连络分明”为原则;<sup>④</sup>述当代史者,则广辑资料,据实记述,避免“妄意点缀”。<sup>⑤</sup>这种著述特征使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保持着作为史学著作的基本特性而被视作史事的记录,正史的补充。

这种记述内容丰富多彩、情节描写细致生动、文字表述明白晓畅的通俗历史读物出现之后,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喜爱,在他们之中广为流传,成为一种传播范围远远超过庙堂史著而直达社会最底层的大众化的史学著作。即所谓“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厮养隶卒,通都到郡,穷乡小邑,罔不目览耳听,口诵舌翻。”<sup>⑥</sup>“虽农工商贾,妇人女子,无不争相传诵。”<sup>⑦</sup>从而使中国史学在宋元时期传播方式大众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为著作形式的大众化。

但是,也应当看到,无论宋元史学传播方式的大众化还是明清史学著作形式的大众化,都不是史学活动者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之上的自觉行为,都没有形成应当或必须让民众了解历史的观念,更没有将民众视作历史活动的主体。因而,其大众化都仅仅在史学的外在形式上得以实现,而没有进入史学的内在核心——史学思想和记述重心。这是史学大众化在封建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所必然存在的现象。

进入 20 世纪之后,这种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20 世纪初期,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开始兴起,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在检讨旧史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史学著作应当以“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为内容,<sup>⑧</sup>提出了要“为社会一般人”而作史,<sup>⑨</sup>使史学成为“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sup>⑩</sup>的主张。在批判“君史”、倡导“民史”的同时,他们通过编撰适合普通民众阅读的通俗化的历史读物和带有“民史”性质的专著与译著等,从史学的社会功能和主体内容两个层面强调和推进史学的大众化,使中国史学由外在形式的大众化进一步发展到内在核心——史学思想与记述重心的大众化。

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中国资产阶级史学不可能科学地认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地位与作用,在中国史学大众化的倡导上缺乏彻底性,无法将中国史学的大众化不断推向前进。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上深刻地阐明和科学地解决了人民作为历史活动主体与史学记述重心的问题,才使中国史学的大众化走上了科学、健康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的推广并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史学。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让人民了解历史”和“让史学记述人民”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人民写史与写人民之史逐步成为史学工作者的自觉行动,中国史学的大众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

①③刘亚湖:《原始叙事艺术的结晶——原始性史诗研究·序言》,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12、16 页。

②潘定智:《民间文艺与民俗环境——贵州民间文艺生态研究》,载《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④⑧⑭⑮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8、9-10、10页。(下引《饮冰室合集》,出版社和出版时间同注④)

⑤朱宜初、李子贤主编:《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第四章《少数民族民间传说》,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

⑥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民间文学概况·苗族文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⑦《魏书·序纪》。

⑧《汉书·司马迁传》。

⑩皆见(唐)刘知几:《史通·直书》。

⑪顾炎武:《亭林文集·答徐甥公肃书》。

⑫王夫之:《读通鉴论·光武帝》。

⑬(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五。

⑯梁启超:《中国史叙论》第八节《时代之区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1页。

⑰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5页。

⑱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0页。(下引《李大钊文集》,出版社和出版时间同注⑱)

⑲李大钊:《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李大钊文集》(下),第716页。

⑳皆见《汉书·艺文志》。

㉑(唐)孔颖达:《春秋正义序》。

㉒《史通·六家》。

㉓④④梁启超:《中国史叙论》第一节《史之界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页。

㉔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60页。

㉕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文集》(下),第674页。

㉖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下),第362页。

㉗见《史通》之《采撰》、《书事》。

㉘请参见拙文《先秦两汉讲史活动初探》,载《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㉙④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4、3页。

㉚④⑥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1页。

㉛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史之改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28页。

㉜《三国志通俗演义引》。

㉝④③《北史演义叙》。

㉞(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第五章《普通人应该具有的历史知识》,商务印书馆1964年中译本,第94页。

㉟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4页。

㊱李大钊:《史学与哲学·史学、文学、哲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李大钊文集》(下),第644页。

㊲李大钊:《史学要论·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李大钊文集》(下),第764页。

㊳(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茶坊》。

㊴(宋)吴自牧:《梦梁录·小说讲经史》。

㊵(明)崢霄主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凡例》。

㊶(明)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

责任编辑:郭秀文

# 论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

(1931—1936年)

□ 邓正兵

(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校社科部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12)

[摘要]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服务于其地方集团的利益。他们一方面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反对蒋介石中央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支持各地抗日壮举;另一方面,幻想依靠日本的支持反蒋,与日本有较多联络与勾结。同时,镇压广东省内抗日救亡运动,屈辱处理省内涉日事件。从其言行看,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实际上处于亲日与反日之间。

[关键词]广东地方实力派 对日政策 亲日 反日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87-06

广东地方实力派是以陈济棠为首的地方军事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形成于1929年李济深被蒋介石囚禁于汤山,陈济棠取得对广东的控制权以后。在最初的两年的时间里,它与蒋介石中央政权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但是1931年广州“非常会议”后,它开始半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执行着半独立的内外政策。对日政策是其内外政策中重要的一环,在当时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与日本的关系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但学术界对此一直鲜有研究,本文就此作一粗浅探索。

—

1931年2月,蒋介石因“约法之争”囚禁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由于胡汉民是陈济棠政治上的提携者和庇护人,与陈有较深厚的关系,加上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开始了消灭地方实力派的行动,对陈济棠也展开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在胡汉民派代表、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的策动下,陈济棠联络国民党内胡汉民派、

汪精卫派、孙科派和桂系等地方实力派于5月27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非常会议,次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这样,国民党内出现了以两广地盘为依据,以陈济棠的武力为后盾的西南反蒋局面。陈济棠以其军事实力操纵着“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为了增强反蒋力量,陈济棠在联络国内反蒋各派的同时,还派人到日本活动。7月16日,广州国民政府外长陈友仁偕刘纪文、甘介侯到日本活动,陈化名“外友三郎”,其妻化名“道子”。抵日后,向日本政府提出对满蒙问题让步,以换取日本供应武器。<sup>①</sup>虽未获结果,但陈济棠等并未断绝对日本的幻想。

正当宁粤严重对立之时,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大规模的侵华行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攻势,中国每一个政党和派别都不能置身事外,都必须对此表明自己的态度。9月29日,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为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向日本首相币原提

出严重警告。②10月10日,广州非常会议决定对日方针:(一)政府与民众合作;(二)切实指导与保证各种爱国运动;(三)组织人民义勇军;(四)设立临时银行。③蒋介石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绝不抵抗,对地方实力派积极图谋消灭。特别是广东,是蒋介石“安内”的主要对象,蒋介石称之为“粤逆”,声称“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统一,则不能攘外。”④在各方要求团结共赴国难的呼声中,宁粤实现了合流,广东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取消,“西南两机关”成立。但是宁粤之间始终存在不可化解的矛盾,这个矛盾影响着广东地方实力派的抗日政策。1932年陈济棠在纪念周会上讲话称:“广东的军队,一面抗日剿共,一面反蒋”。⑤这样,广东地方实力派的“抗日”与“反蒋”紧密相连,从而使其“抗日”有着多种含义。

广东地方实力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蒋介石中央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支持各地的抗日壮举。宁粤合流后,胡汉民获释,寓居香港、广州两地,成为广东地方实力派的政治领袖,其抗日态度最为坚决。1932年2月13日,胡汉民对南京政府提出:(一)赞助十九路军将日军逐出上海;(二)撤销解散各地义军命令,切实组织民众成为抗日中坚;(三)速调劲旅收复东北失地;(四)严整沿海战备,真实谋长期抵抗。在日军退出上海以前,无交涉可言,⑥主张积极抗日。对后来日军一系列的侵华事件,他都表现出与南京中央不同的立场。他反对签定《淞沪停战协定》,反对《国联报告书》,反对《塘沽协定》签定,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抗日亡国”、“长期抵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等谬论,热情支持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主张建立西南抗日联军。他甚至数次提出:“假如政府不抵

抗,那我们便说,唯有推翻不抵抗的政府”。⑦

胡汉民这种态度,对陈济棠和西南两机关影响较大。西南两机关不断发表宣言、通电,宣传抗战。淞沪战役期间,陈济棠命令丁纪徐率粤空军战斗机七架,离穗飞沪,往助十九路军抗战。1933年1月12日起,西南政务委员会连日在广东开会,广东陈济棠、邹鲁、邓泽如、刘芦隐、刘纪文、林云陔,广西李宗仁、梁朝玠、马君武,福建李孝侠、赵一肩,云南张冲,贵州杨狄帆、甘嘉仪,四川张明九、但懋辛,湖南戴静园,冯玉祥代表王建屏,胡汉民代表胡木兰,热河义勇军代表何民魂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一)促中央履行三中全会决议,出兵抗日,收复国土;(二)拟西南大联合,筹组“西南国防委员会”。⑧1月21日,国民党中央派内政部长黄绍竑来粤,向西南当局传达中央“安内攘外”方针,动员两广出兵江西“剿共”。实质是要两广地方实力派放弃“抗日”,并在“剿共”中消耗其实力。1月27日,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锴、黄绍竑在广州举行会谈,决定抗日、反共双管齐下:第一,四集团军及十九路军抽兵北上抗日,粤、桂、闽增兵入赣“剿共”。5月中旬,粤、桂、闽三省各抽调一团兵力,组成西南抗日军,准备北上抗日。⑨5月18日,西南政务委员会致电国联九国公约签字国与苏联政府,指出“满洲与热河为我国主要部分,万不能容忍其分割”。⑩7月17日,西南政务分会分电晋、察、绥、陕各级绥靖主任、省主席及军师长,言勿目睹抗日同盟军将被夹击消灭于妥协政策下而袖手旁观,应“仗义执言,解此纠纷”。又电庞炳勋等应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以民意作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乱命所操持。⑪7月20日,西南执行部常委胡汉民、



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邹鲁等电南京政府及北平军分会,要求将入察之师,停止前进,并表示如南京仍抑内媚外,西南“决取断然处置”。<sup>⑫</sup>1936年6月,陈济棠与桂系又以“北上抗日”为口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两广事变。胡汉民、陈济棠这些言行,表现了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立场。虽然他们的抗日与反蒋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利用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来进行抗日倒蒋宣传,这对全国的抗日活动有积极作用,也使他们的反蒋活动较有威力。

但是,胡汉民的政治兴趣和怀抱是面向全国的,他一直想入主南京中央政权,而陈济棠满足于“南天王”的地位,“所愿意承担的义务只在广东本省,他表示自己毫无超出省界向外扩大权力的欲望”。<sup>⑬</sup>因此,在如何抗日反蒋的问题上,胡汉民和陈济棠主张并不一致。胡汉民希望西南抗日联军借北上抗日之机,推翻南京政府,陈济棠只表示“如日军侵入华南,他将誓死抵抗”,<sup>⑭</sup>并不愿真的北上抗日消耗实力或引起蒋介石对广东过多的注意,因此只愿喊一些抗日口号而不愿有更具体的行动。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胡汉民则主张“抗日重于剿共”,甚至说“与其挂日旗不如挂红旗”,<sup>⑮</sup>陈济棠则认为“抗日与剿共,同样重要”,实际上要先解除红军对广东北面的威胁。胡汉民还主张联英美甚至联俄制日,他宣称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当确立于“保障中国领土主权完整这一基点上,凡能帮助中国达到这个目的的,德谟克拉西的国际也好,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也好,我们不妨同情协作。”<sup>⑯</sup>陈济棠却主张联英美制日。1935年,陈济棠、邹鲁致电在瑞士的胡汉民云:“宁有两派,一、亲日统一固谬;二、联俄抗日亦非至计。请兄与亮兄(指王宠惠,时任海牙国

际法庭正法官)到英。为英美之外交工作,并以华南同对日关系,请英密示港督,与粤结合。”胡、陈这种分歧,反映陈济棠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地方主义思想。陈济棠虽然尊奉胡汉民为政治领袖,但实际上是“尊之若佛,防之若贼”,<sup>⑰</sup>害怕胡在广东的地位和影响超过自己。因此,尽管胡汉民大力提倡推动,陈济棠本人也表示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是广东地方实力派并没有采取什么大的抗日行动。

## 二

以胡汉民、陈济棠为首的西南当局对日本的态度是较复杂的,一面高喊“抗日”,但在另一面,却又对日本存有非分的幻想,想依靠日本的支持反蒋。当时日本的对华政策,邹鲁称之为:“对黄河流域是用‘抢’,对长江流域是用‘吓’,对珠江流域是用‘骗’。”<sup>⑱</sup>日本想利用西南与南京中央的对立,策动西南“独立”或“自治”,扩大日本在西南的势力,并给蒋介石的抗日准备制造障碍和麻烦。而西南久与蒋介石对峙后,想寻找出路,除了在国内与各地方实力派联络外,国外对日本心存幻想,要利用日本。因此,1932年以后,日本不断派代表来西南联络接洽,先后不下百人之多。<sup>⑲</sup>这些接洽主要有:1932年,日本军部宣传班长根本在粤访问萧佛成。1933年11月9日,日本参谋部部长梅津秘密由闽抵粤访问陈济棠;11月13日,日本公使松村到广东会见陈济棠及其他要人。1934年3月22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中村中将率军舰抵达广州访问。次日,由日领事川越茂等陪同拜会陈济棠、林云陔、刘纪文。1935年2月13日,日本舰队司令白武源访问粤省当局。3月2日,土肥原到香港访问胡汉民。4日,土肥原抵

广州,分访林云陔、萧佛成、邹鲁、陈济棠等。5日,飞南宁访李宗仁、白崇禧。26日,再访胡汉民。6月2日,松井石根访问粤当局。21日,喜多诚一访陈济棠、李宗仁。26日,冈村宁次抵广州,分访李宗仁、陈济棠。次日,访萧佛成、刘纪文、邹鲁等。12月27日,根本博偕领河相分访陈济棠、林云陔、刘纪文等。1936年2月,松井大将、细萱少将又到粤访问,海陆要人亦接踵而来。<sup>②</sup>

西南方面和日本这些代表会谈的详情,目前尚不清楚。但据胡汉民、邹鲁、李宗仁等人的点滴回忆,日本人想利用西南反蒋造成中国的混乱并阻止西南抗日的目的非常明确。松井称:“只要胡先生肯出来领导西南各省军政,要钱有钱,要枪有枪,一切由我负责。”<sup>③</sup>胡汉民、邹鲁、李宗仁都称他们指责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胡汉民明确表示:“我和南京方面有意见,但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希望贵国政府不要利用这种弱点。……我胡汉民向来不受人利用,尤其是国家大事上。”<sup>④</sup>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西南派在与日本使节交往中基本坚持了民族立场,尚没有发现其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勾当。土肥原到粤前,陈济棠专门召集会议,确定接待原则,大体只谈“中日之亲善,须以民族之公意为前提”,“未及剿共及反蒋问题”。<sup>⑤</sup>松井日记记载了他与陈济棠会面的情况:“陈之真意难以察知,然相当信赖胡汉民,外交问题一切均依胡之意见办理。……然彼相当傲慢自负,多具广东人特征,且野心不大,满足于维持现状。观之,似无意于主动同日本建立关系。深感有必要再次见面,以探知彼之真意。”<sup>⑥</sup>可见,胡汉民、陈济棠非亲日卖国分子。

但是,胡汉民等又想在收复失地和不接受附加条件下从日方得到援助。胡

汉民指示说:“弟处无论如何仍抱收复失地之议,而地方局势之接洽,纪文等既已进行,则其无条件而可为物质之大助者,自不妨与之斟酌也。”<sup>⑦</sup>胡汉民这种幻想自然给日本以幻想,所以来粤使者,不绝于途。日本关东军也派和智鹰二中佐任驻广东武官,频频与西南要人接触。胡汉民还托和智给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官元帅带了一封信,提出解决中日关系的四条基本原则:(一)政治平等;(二)军事结盟;(三)外交一致;(四)解决不包括满洲在内的各种悬案。日本对这封信反应冷淡,使胡汉民大失所望。<sup>⑧</sup>但日本和西南仍保持密切的关系。松井回日后,日本军队使派两艘日轮满载军火和飞机驶入虎门,交给桂系。<sup>⑨</sup>陈济棠也接收过日本军部赠给的枪支约1000枝、子弹20万粒、几门山炮等。<sup>⑩</sup>两广实力派也曾主动与驻粤日领联系。两广事变发动时,陈济棠的重要谋士、也是他的哥哥陈维周即向广东各将领介绍与日本驻粤领事接洽情况,并说其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其行动。<sup>⑪</sup>6月下旬,日本军方派遣军官约100人来广州,陈济棠准备将大部分日人派到陆海军部队担任顾问,协助指挥作战,并以日人约30人到天河、白云机场,视察设备情况,引起空军人员的极大愤慨。<sup>⑫</sup>

两广地方实力派与日本的交往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1935年英国《泰晤士报》即有西南派勾结日本的说法,陈济棠、邹鲁要求在瑞士的胡汉民“力破之”。<sup>⑬</sup>两广事变发生后,一些西方通讯社纷纷发表评论、报道,认为此间中国观察家对“桂军对日态度,颇为怀疑,因桂方此刻尚继续由日本购买飞机、军火”,他们也注意到日本对西南“抗日”宣言竟多日“一措辞至温和之抗议而无之”。<sup>⑭</sup>这说

明他们也注意到日本与两广非同寻常的关系。实际上,白崇禧策动两广事变给广东将领打气时即称: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再派人去联络,以过去几年我们同日本军方的关系来看,相信他们一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sup>⑳</sup>事变发生后,日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向报界发表谈话称:“日方对粤、桂抗日军正注视,须适当时间,表示态度。”<sup>㉑</sup>十余日后日方才向两广提出“抗议”。这充分说明西南和日本有着某种程度的默契,这正是两广地方实力派“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结果。

以“抗日”为名,行“反蒋”之实,或在“抗日”的口号下,与日本暗通款曲,如此“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不只反映了广东地方实力派的言行不一,也说明了他们的矛盾心理:想获得日本援助以增强反蒋实力,但又不愿日本侵略中国,并担心因出卖民族利益而成为众矢之的。松井访粤后,日本愿意帮助西南建立“华侨银行”,以解决财政困难,萧佛成在乐见其成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指出:从长远看,日本对中国野心不变,必亡中国而后快;就眼前看,“对彼(指日本)借款以组银行,必须设一监视用途之机关,及推广其在华南之商务,皆为题中必有之文章。苟若是,则门(指蒋介石)未倒,而吾人已为天下之矢矣”。<sup>㉒</sup>陈济棠与日人交往,即向日方表示,在与日本合作方面,西南“精神上最能贯彻,而面子不妨稍为忽略”。<sup>㉓</sup>实际上要日方理解其不得不喊抗日口号的“苦衷”。

### 三

在广东省境内,广东地方实力派反对和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即使在“非常会议”和两广事变两次宁粤对立期间,陈济棠为了反蒋,对民众抗日救

亡活动表示一定的容忍和支持,但亦严格限制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学生的抗日呼声,陈济棠一方面指使“抗声社”(陈之亲信林翼中在中山大学成立的亲陈学生组织)成员运动学生拥护中大校长邹鲁的“读书救国”,另一方面严厉镇压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1931年10月10日,中山大学爱国学生和群众到永汉路查禁日货。永汉公安分局局长杜煊泰在得到陈济棠的命令后带领武装赶到现场,对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伤六七十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双十惨案”。12日,陈济棠调集大批军队入城,并宣布戒严。<sup>㉔</sup>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广东学生热烈响应,连续举行了四次抗日示威大游行。1936年1月13日,爱国学生900多人在荔枝湾举行示威游行,遭到军警特务的袭击,当即有100多人被打伤,十余人被绑走,造成轰动全省的“一·一三荔枝湾惨案”。<sup>㉕</sup>次日,陈济棠又以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宣布在广州实行戒严,任缪培南为戒严司令,派出军警封锁省港交通,调集军警在广州市日夜巡逻,还秘密逮捕了中大等校的学生多人,邓初民、何思敬等进步教授被逼逃亡。

在压制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陈济棠对境内涉日事件的处理却屈辱退让。1932年1月,驻粤日领以汕头一家报纸上登载“李凤章弹掷倭皇”文章,向汕头市府提出停止汕报发行、惩主稿者、市长书面道歉、登广告等无理要求,并派军舰威胁。<sup>㉖</sup>处理结果,汕报道歉,市府令慎载涉日文章,市内抗日标语尽行扯去,日领“认为满意”。<sup>㉗</sup>4月,粤省警方警告各报,勿刊登“侮辱日皇”字句。<sup>㉘</sup>1935年9月,广东增加豆饼附加费,汕头日本浪人乘机大肆走私,广东缉私队扣留一艘走私船。日本又派7艘军舰威

胁放行,最后汕案解决结果:扣留之日本豆米私货发还,并规定以后日货入口,除纳关税外,其他课税归由买者负担。<sup>⑫</sup>1936年2月,汕头日领署巡查角田因肺病暴毙,日方强指为华人所害,向市府提出严重交涉。<sup>⑬</sup>汕头市府竟想以撤换一当地公安负责者了事。由于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妥协退让,广东地区,浪人横行,走私猖獗,日人随意捕人。1933年10月,广州日领即以鼓吹反日革命为由在广州逮捕韩人林义一。陈济棠只想以劝告方式,请日领略事解释,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的办法来解决。<sup>⑭</sup>最后此事不了了之。1936年4月,日本浪人在汕头围殴岗警,日领竟向汕头市府要求自行讯办。<sup>⑮</sup>日本军舰更是常在广东沿海游弋横行。对广东境内的日本势力,陈济棠实际上也是实行“不抵抗主义”。

总的说来,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是服务于其地方集团利益的。一方面以“抗日”作为反蒋的手段,一方面镇压省内抗日救亡运动。在这同时,却与日本勾勾搭搭。我们不能说其抗日口号完全出于私利和矫情,特别是胡汉民,其“民族意识是十分强烈而深沉的”,<sup>⑯</sup>也不能认为胡汉民、陈济棠等人亲日或“联日”,因为他们和日本之间也只是一种利用的关系,并未达成什么协议,最多是一些心照不宣的幻想和默契,而“华侨银行”也未见成立。广东地方实力派中甚至有一部分人主张利用日本浪人搞蒋,也在所不惜,且有派翟歧卿到蒋统区去暗杀日本人,以增加蒋的麻烦的计划,只是没搞出什么名堂来。<sup>⑰</sup>陈济棠在两广事变下野后亦曾反省说:“不应听信那些策士去聘任日本军官,来做什么顾问,使人怀疑”。<sup>⑱</sup>可以说,他们高举“抗日”大旗是为了反蒋,与日本勾结也是为了反

蒋,但他们反蒋的主要基础并没有寄托在“联日”上。从其言行看,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实际上处于亲日与反日之间。

<sup>①⑧⑨⑩⑪⑫⑬⑭⑮</sup>广州政协文史委编印:《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册,1984年,第425、438、443、443、446、479、476页。

<sup>②③⑤⑥⑭⑮⑰</sup>广东政协文史委编:《粤系军事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76、78、104、97、125、97、102页。

<sup>④</sup>《先总统蒋介石全集》第3册,台湾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3125页。

<sup>⑦</sup>《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3期第2页。

<sup>⑬⑰</sup>(美)易劳逸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36、137页。

<sup>⑮</sup>转引自周聿娥、陈红民:《胡汉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页。

<sup>⑯⑰</sup>转引自杨天石:《1935年国民党内的倒汪迎胡暗潮》,见杨天石著:《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页。

<sup>⑱</sup>戴书训:《愈经霜雪愈精神——邹鲁传》,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36页。

<sup>⑲</sup>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版,第360页。

<sup>⑳</sup>这些来往系笔者据《粤系军事史大事记》和对同期《申报》查阅得到,不一一注明出处。

<sup>㉑㉒</sup>墨人:《诗人革命家——胡汉民传》,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78年出版,第327、332页。

<sup>㉓㉔㉕</sup>转引自陈红民:《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介绍》,《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sup>㉖㉗</sup>(日)田中正明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世界知识

# 护国军军务院 和都司令部设在肇庆论析

□ 谢佐永

(西江大学政法系讲师, 广东 肇庆 526061)

**[摘要]**护国运动高潮中,护国军军务院和都司令部设在并非省城和大城市的肇庆,既有着复杂的政治社会背景,也有着历史、地理和现实的原因。这两个机构所指挥的护国战争,除倒袁和恢复旧约法成功以外,还为以后的护法斗争及国民革命北伐作了准备。

**[关键词]**护国运动 护国军 军务院 都司令部 肇庆

(中图分类号)K25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93-04

在 1915 年至 1916 年全国掀起的护国运动中,决策和指挥的总部竟然设在并非省城和大城市的肇庆,使它一时成为全国甚至国际瞩目的焦点。真相怎么样?效果又如何?现代史和学术界加以论述的还不多见,其中有一些具体问题,

在各种论述中还存在着歧异。本人根据在肇庆所见的旧址和当时报纸的报道,着重对以上问题进行论析。

## 一、军务院和都司令部始末

护国运动是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步骤而开展的。在袁世凯通过所谓法定

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4、72 页。必须指出,“田中证明对资料的引用完全是实用主义的”(见该书“译者的话”第 13 页)。因此,笔者并不同意该书的主旨。但田中证明是松井访粤时的随行秘书,曾参与松井与西南派人士会谈,其某些材料可以作佐证使用。如该书 71-72 页称:日本和西南要人达成建立中日合营的西南华侨开发公司的协议,由中日双方各出资 5000 万元,作为西南政府的财源。燕京图书馆“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中有一封萧佛成的信也谈及了中日合办“华侨银行”之事。

⑤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首都师大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第 576 页。

⑦⑧⑨广州政协文史委编:《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99、468、506 页。

⑩⑪⑫广东省档案馆编印:《陈济棠研究史料(1928-1936)》,1985 年,第 413、415、415 页。

⑬1936 年 6 月 10 日《大公报》。

⑭1936 年 6 月 11 日《大公报》。

⑮1931 年 11 月 3 日《申报》。

⑯1932 年 1 月 27 日《申报》。

⑰1932 年 2 月 8 日《申报》。

⑱1935 年 10 月 17 日《申报》。

⑲1936 年 2 月 4 日《申报》。

⑳1933 年 10 月 19 日《申报》。

㉑1936 年 4 月 22 日《申报》。

㉒周聿娥、陈红民:《胡汉民》,第 264 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

程度复辟帝制的同时,持坚决反对立场的各种势力,也加紧由舆论反对转入武装行动。反袁坚决的进步党人、前云南省都督蔡锷潜出北京,于1915年12月19日到达云南昆明,与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但懋辛等会合,并会同云南省督军唐继尧,于当月25日通电起义,宣布云南独立。第二天宣布成立护国军,设立护国军司令部和军政府。1916年元旦,袁世凯启用标志帝制的“洪宪”年号,护国军即在昆明誓师。当月16日,护国军正式出师。<sup>①</sup>

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挺进至川南,受到袁世凯所组织的北洋军十个师的层层堵截、围攻,经过激战,迫使北洋军全线溃退,取得了重大胜利,从而壮大了反袁的声威,使护国运动风起云涌。当月,贵州、广西相继宣布独立。到四五月间,广东、浙江、陕西等省先后宣布独立。随着独立各省军事协调的进展,滇、黔、桂、粤、浙五省组成联军。在诸省联军的基础上,于5月1日在肇庆成立护国军都司令部,5月8日成立军务院。军务院以唐继尧、岑春煊为正副抚军长,唐远在云南、由岑执行。以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可见都司令部和军务院与云南昆明的护国军司令部和军政府一脉相承,是后者的扩大和改组。

至于这两个机构的撤销,则有着特殊性,名义上的撤销和实际活动的结束在时间上并不一致,实际活动在宣布机构撤销后仍然开展。一些现代史书和文章叙述笼统,如说“袁世凯死后,南北妥协,军务院于7月14日以全体抚军名义宣告撤消。”<sup>②</sup>并没有说明7月14日以后这个军务院依然活动,依然使用原有的名义,直至同年11月才停止活动。这是因袁世凯虽然死去,但随即突现新的矛盾,使护国运动不能戛然而止。

首先,继任总统及其产生办法引起新旧约法之争。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本来各方大体上接受,但北京政府所依的法律根据是袁世凯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而不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旧约法),则引起坚决的反对。到6月26日,北京政府不得不宣布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复会。国会复会的结果如何?护国军方面自然在注视事态的变化。

其次,统治广东多年的督军龙济光本来为袁世凯卖力,只是在全国讨袁的高潮中不得不宣布独立,与滇、桂等省联军,实际上貌合神离,对所据有的地盘层层设防,步步为营,对过境北上的滇军、桂军,对中华革命党的中华革命军和其他反袁队伍,时加截击、偷袭。在统治区内又大肆包烟庇赌,聚敛钱财,以致乌烟瘴气,怨声载道,呼出“驱龙”的口号。在8月间,双方函电并发,互相攻讦。北京政府把他调任琼崖督办,派陆荣廷接任督军,另派朱庆澜为省长。又派萨镇冰为巡按使,担任调停监督交接。期间,各方听候调处。

再次就是换防、编遣的问题。1916年经过八九两月的斡旋、谈判,龙济光所统率的军队除一部分移交给陆荣廷收编外,其余于10月底随同调往海南岛。滇、桂、粤的部队的编遣也随即进行。所有这些,护国军都司令部和军务院必须参予。

## 二、两机构设置的背景

护国军都司令部和军务院是在护国运动发展至高潮时应运而生的。透过当时军事态势进行探寻,又可以看出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社会背景。

(一)1913年由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但是所提出的反袁、讨袁的口号和采取的方式,均被护国运动



所继承。由国民党改组而成的中华革命党奉行“三次革命”的使命,所组织的中华革命军反袁护国义无反顾,其他坚持民主共和信念的社会力量也在反袁护国的旗帜下,临时结成统一战线。袁世凯自绝于全国人民,成为众矢之的,由舆论的鼓吹,进而摆脱袁世凯的统治而“独立”,再发展为兴师进讨,已成为当时汹涌全中国的潮流。

(二)护国军虽然以滇军、桂军、粤军中的肇军为主体,但在整个护国运动中,中华革命军和中华革命党人、原国民党人组织、领导的军事行动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在部队数量、活动地域、声势上超过护国军,而且广东境内的中华革命军也一度使用护国军的番号,<sup>③</sup>因而对袁世凯和北京政府造成巨大的威胁,对各省“独立”是直接的催化,对护国军是一种强有力的配合。从1915年底至1916年初,广东、山东、陕西北部的中华革命军及民军不断起义,声势浩大,迫使这三省相继“独立”。有了这些在大江南北的革命军和其他民军的武装斗争的配合协同,不但使护国运动声威大振,而且使成立总部有了充足的依据和理由。

(三)护国军的旗号,军务院和都司令部虽然都是由非中华革命党的蔡锷、岑春煊、梁启超所标举和策划,但是在整体上得到中华革命党的支持。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在部署、组织中华革命军讨袁的同时,特别是对云南省的滇军,早在1915年夏便秘密派遣中华革命党领导成员吕志伊部署起义讨袁,<sup>④</sup>并在时机成熟时首举护国战争的义旗。孙中山在军务院成立的第二天便发表了《讨袁宣言》,<sup>⑤</sup>把护国讨袁称为“三次革命”,一月后又发表《规复约法宣言》。唐继尧所部48名将领中有27人是同盟会员、国民党员或中华革命党员。<sup>⑥</sup>第二军总司

令李烈钧就是受命入滇举事的老同盟会员、国民党人。另一个身份、资历与李烈钧相似的李根源,也在都司令部任副都参谋。孙中山与岑春煊、陆荣廷等保持联系。中华革命党也指派多人驻在肇庆。可见实际掌握护国军的主要队伍仍然是中华革命党方面。

### 三、两机构设在肇庆的原因

肇庆当时只不过是高要县城,作为临时总理全国军事、政务的军务院竟然设在这里,也有着历史、地理和现实的原因。

(一)在华南和西南地区中,广东是最具条件建立全国性政权的省份。当时广东是这一地区中唯一的沿海省份,与国际联系便捷,可以输入军火。广东一省当时有人口3000多万;而滇、黔、桂三省合计仅2500多万;广东的财政税收较充裕,而三省当时“地瘠民穷”,难以聚兵建立全国性的总部。因此,护国军方面一开始就谋求广东“独立”,“置临时政府于广东,徐求列强承认(是)交战团体。”<sup>⑦</sup>军务院成立的宣言书也称暂定广东为军务院所在地。设在广东,首选城市必定是广州。因此,原拟目标是广州,临时设在肇庆不过是权宜之计。原因是龙济光严密控制广州,不容许他人染指,梁启超曾于1916年4月底往广州与龙济光商谈,得不到允诺而返回肇庆。

(二)肇庆从清朝末年起就在李耀汉军事控制之下,所掌握的部队被称为肇军,他当时任陆军第二师师长兼肇罗阳镇守使,较早受广西都督陆荣廷的游说,倒向护国军方面。在当年4月筹备建立两广都司令部时已接待岑春煊、梁启超、章士钊和其他谋求倒袁护国的人士。

(三)肇庆位居西江走廊的要冲,水陆交通便利,轮船和小型舰只可以停泊,城市又具有一定的规模。明清之间曾作

两广总督驻地一百多年,永历小朝廷也曾在这里建立,房舍、场所较多,可供立政驻军。结果,肇庆府中学堂(原为端溪书院)让出来借两机构使用。阅江楼、张公祠、慧日寺、文社等一大批公共建筑物供滇军、桂军宿营,三四万人的队伍全部得以容纳。“各独立省份代表人物云集,要人联翩而至”,加上投奔报效者、谋求安身者、商贾、船家、轿夫之类各色人等,有城内外客栈、旅馆、闲屋住宿,因而市上“肩摩毂击,一脱乡镇之风”。⑧

#### 四、两机构指挥护国战争的效果

护国军军务院和都司令部从成立至结束,基本上不曾与北京政府指挥的军队作过战。李烈钧率领的第二军进至粤北停留,并没有北进湘赣两省。桂军以桂北挺进湘西南的一支,也不大与对方交火。所以在作战实绩上没有多少具体战果可言。但是从全局来说,却是产生了较大影响的。

(一)推翻了“洪宪”帝制,促使袁世凯退出历史舞台,消除了从辛亥革命以来危害民国的一大隐患。

(二)清理了袁世凯阴谋窃国的流毒,废除了新约法,恢复了旧约法和国会,把民主共和制度的形式保存下来。

(三)削弱了某些地方恶势力。龙济光统治广东4年,怨声载道,终于被调离

广州。

(四)锻炼并造就了一批民主共和观念较强的军人,为以后的护法斗争、多次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在护法斗争中,设在广州的军政府的兵力,基本上是入粤的滇军、桂军以及由粤境各地反袁队伍和龙济光旧部改编而成的粤军。粤桂滇三省军队加上后起的湘军,构成了国共合作时期北伐战争的基本队伍。所以北伐战争胜利的上源,实在可以上溯到护国战争。

①见李凡著:《孙中山全传》第二十一章第269页,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

②见《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第65页“护国军军务院设立”,黄美真、郝盛潮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见《申报》1916年5月4日三版《粤事解决后之进行》。

④见尚明轩著:《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201页。

⑤见《申报》1916年5月9日《孙文宣言》。

⑥见李凡著:《孙中山全传》第269页,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引《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二期第69页。

⑦见《大公报》1916年4月14日,引日本《大阪每日新闻》4月8日文章。

⑧见《申报》1916年6月各日。

责任编辑:郭秀文

# 张荫桓对早期华侨权益的保护

□ 范耀登

(汕头大学法学院讲师, 广东 汕头 515063)

[摘要] 张荫桓, 晚清著名政治家、外交家, 光绪宠臣, 一代才杰, 动关晚清时局。1885—1889年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 任内为抵制排华浪潮, 保护华侨华人权益, 曾作多方努力。

[关键词] 张荫桓 华侨华人 权益保护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5-0097-05

张荫桓(1837—1900年), 字皓峦, 号樵野, 别号红棉主人, 晚清著名政治家、外交家, 广东南海人, 官至户部尚书衔左侍郎, 时称张南海。他与甲午戊戌间的晚清政治有殊大关系, 是近代史研究中被忽略的重要人物。

张荫桓先世居新会小范里, 后徙佛山镇, 遂籍隶南海, 与康有为是同县人。宣统《南海县志·张荫桓传》载他: 性豪俊, 有胆略, 倜傥多奇气, 博涉书史, 能文章, 少应童试不遇, 年仅弱冠即弃科举, 学西学。同治三年(1864年)报捐知县, 投奔山东的舅父李宗岱观察。因舅父荐引, 山东巡抚阎敬铭、丁宝楨先后器异, 招致幕中掌书记, 公牍奏章多出其手, 文章写得既好又快, “荫桓天才飘发, 每草一疏, 俄顷立就”, “每遇疑难事, 应机立断。”阎敬铭、丁宝楨以荫桓识力过人, 才大心细, 究心世务, 治事精密多次保荐, 以后又受李鸿章、翁同和赏识, 因而官运亨通。同治七年(1868年), 张荫桓由知县迭保至道员。同治十三年(1874年)署山东登莱青道, 不久署山东盐运使。1876年, 协助李鸿章处理马嘉理案。光绪七年(1881年), 转安徽徽宁池太广

道。八年(1882年)升按察使。中法战争期间, “会同办理签订中法越南条约和划界事宜”。多年的洋务实践, 办事干练精达, 显示他有长于外交的才能。

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清廷遴选使才, 召见张荫桓、薛福成、张富年等, 仅张荫桓一人奏对称旨, 受慈禧赏识, “备出使外洋”, 赏三品卿衔, 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学习行走。十一年(1885年)六月清廷正式任命张荫桓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 行前两次请训, 慈禧称他: “尔向来办事认真, 能办事人”。<sup>①</sup>他的主要使命是保护这些地方华人安全和各项权益, 代表中国政府交涉各项事宜。接任后他即对华人境况进行调查, 提出工作要点: “此时机局, 要在保华人之生计, 雪积案之滞冤, 通华商之贸迁, 固邦交之睦谊”, <sup>②</sup>体现了他统摄全局, 而又精明务实的作风。直到十五年(1889年)九月任期届满, 作为驻外使臣, 他主要进行了下列交涉:

1. 设领事保护侨民。受命后, 张荫桓即与总理衙门大臣及北洋大臣李鸿章、两广总督张之洞晤商在小吕宋(菲律宾)等地设立领事, 代表清政府与西班牙

当局接洽,保护当地华人。十二年(1886年)正月他抵粤后,恰遇小吕宋商董叶龙钦等来华,呈递华商 290 家公禀求设领事,于是当即亲赴香港与该商等接晤,深感海外华人情词恳切,皆实有不忘桑梓之心和请求皇朝庇护的愿望。遂与张之洞联合奏派王荣和、余鏊查访南洋各埠侨工情形,筹备设立领事。奏折里说:“中华人民散处外洋各埠,略分工商两途,百年以来生聚日盛,虽侨居异域,而频年捐赈捐饷不忘本源,……特以谋食他方,满无统属,不免为他族欺虐。大约海外各国之待华人,情形虽不一致,而意存畛域则一。有官申理,则共庆来苏;无所控告,则苛虐殊甚。……纵计诸洋华民数逾百万,除世居海外及孤身出洋者约十之八,有家属通音问者约十之二,尚有二十万人,每年寄家少者数十,多者千百,酌中牵算,人以百元为率,亦有二千万,为银一千数百万两。果能保护无虞,其获利回华者,复能谕禁乡邻吏胥不得讹诈。从此声息常通,不忘归计,日推日旺,实为中国无形之益。若化外视之,则沿海各省华民生机日蹙,甚非中国之利也。诚得兵轮为之保护,设官为之经理,则威灵仰借乎天朝,疾苦可达于宸听,……自然生计安稳,群情向慕,必可收效将来。……臣荫桓陛辞时,业将大略情形陈奏。”③张荫桓到任后即多次与西班牙政府外务部交涉,还曾以要求西班牙政府赔偿 1867 年以来多征收菲律宾华人税款 1000 万比索为筹码(因为 1867 年《中西条约》规定,华人享受最惠国待遇,违约多征重税,理应赔偿),要求设领事保护侨民。但颇费周折,耗时经年,最终仍被西班牙政府无理推托、拒绝,此事只好由继任崔国因续办。张荫桓还多次指示驻古巴、秘鲁、巴拿马、墨西哥等地有关使领人员关注华工情形,

保护华工。

2. 设华人中西学堂,中西兼学,融会贯通,将来回国效力。出使期间,张荫桓积极在旧金山、秘鲁、古巴等地华人聚集区,倡导设立华人中西学堂,使华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忘“根”在中国,同时兼学西学,特别是西方科学技术,使他们有一技之长,将来回国效力。张荫桓在 1886 年的《论中西之异》一文中说,西方文化以科技见长,中国文化以义理见长,所谓“格物工夫,西人讲究不爽;若衡论义理,则中国五千余年,俞研俞精,西人不逮。若合中西融会贯通,斯为得之。”④要中西兼学,重点是学习西方的科技与法律。1887 年的《筹设古巴各埠学堂折》中说,要“分延中西塾师教习中文日文,既能成诵,进习法文。文字既通,即分门学习武备、制造、算学、律例等事。法国律例,环球各国每援为依据,总理衙门亦专译刊本,于交涉各事较美律为有用。但视学生资禀相近者诱掖之,或当各有成就。”⑤学成后,准备他日回国效力。

3. 教育华人团结自爱、和睦相处。早期华人社会内部不团结,常有“堂斗”,适成为外国政府排华之口实。张荫桓说:“欲令华人不为洋人所欺,必先令华人自相和洽。”1886 年旧金山华人堂斗又剧,旧金山总领事和中华会馆各绅董尽力调解,并禀告张荫桓公使,请求出示禁止械斗,张荫桓即发布告示劝谕如下:“本大臣德薄能浅,拜使命于土人虐待华人之际,驱逐燔杀,积案累累。……我华人远离乡井,风涛之险,洋例之苛,不避艰难,无非为谋生而至。……山巅海隅之区,旅馆羁栖,无父母妻子之相依,望田园庐墓而不见。……偶有猜嫌或致诟詈,一言不合,遂尔拔刀,此血气方盛之所为。然而转念同为华人,同客

异域,或小忿酿命,则死者无辜,冤魂不散,旅魂之缠绕,公论之鄙夷,虽幸逃法网,不难望谋为顺遂。美律纵能宽恕,中国自有典章,一经咨查,亲族受累。况美国年来厌薄华人,已成风气,我华人即安分守己,犹虑蒙以恶名,我复自相残杀,予人以口实。……欲令华人不为洋人所欺,必先令华人自相和洽。……倘经此次晓谕之后,尚复不知悔改,仍有寻殴互斗等事,一经领事禀报,本大臣惟有按名咨令原籍,设法究治,以警效尤,而安良善。为此札飭,札到该领事即便分飭,遵照毋违。”<sup>⑥</sup>他的劝导和牵连本籍的做法是有成效的,减少了华人的“堂斗”内耗,对稳定华人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为后续使臣所沿用。

4. 追凶索赔。早期华人出洋,常受异族欺凌。就美国华人遭遇而论,据《清史稿·邦交四》载: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有天李架埠一案,焚铺逐商,劫财7万余元;十年(1884年)七月二十五日,洛士丙冷埠一案,惨杀廖臣颂等28命,伤15人,焚毁铺屋财物值14万余元;七月二十八日,舍路埠一案,惨杀莫月英等3命,焚烧煤厂,约值数万,旋将华人全部驱逐;八月十一日,倒路粉坑一案,枉杀李驹南等5命;九月二十八日,喊罢埠一案,焚逐失财数万;十二月初四日,尾矢近地一案,惨杀伍厚德等二命。这些人都是无辜被害。其余密谋杀害,不可胜记,而且各地都掀起排华风潮。张荫桓面对积叠重案,交涉起来颇为棘手。他根据国际公法及两国有关条约,据理力争,多方周旋,美国理亏,最终追凶一事则不了了之,赔偿则洛士丙冷案赔银147748.74元;其他8案赔银276619.75元。这是很有意义的,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得到西方列强的巨额赔款,张氏很快慰,认为多少洗刷了清政府的

屈辱,树立了新的国家形象,以后“即欧墨诸州,震慑德威,亦不敢于旅居华人,恣行虐待”,<sup>⑦</sup>在国际社会上将有好的影响。

5. 订约保护。张荫桓说:“善后之策,惟在寓美华人责以照约保护为至要,……彼以限制设词,我以保护立论”。<sup>⑧</sup>早在1882年,美国国会就通过限制华工法令(The Chinese Restriction Act),其中规定:一、十年内禁止华工进入美国;二、华工离美者须在东海岸登记取证,作为回美依据;三、到美华人须凭美国驻华使、领签署的护照入境。188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对1882年法案的修正案,规定华工从美国回国后,如欲返美,必须在中国取得美国领事或其他外交官的许可证。这样美国领事可以随意借口拒绝发给许可证,严重损害了寓美华人原有权益。张荫桓根据国际公法及中美两国原有条约,与美外务部多次谈判,本着弱者求生存原则,颇费口舌,于1888年3月13日达成条约六款,主要内容是:一、在20年内禁止华工来美;二、该禁律不适用于寓美华工有父母正妻儿女,或有产业值银1000元,或有经手帐目1000元未清者,这些人应由美国当局发给证件,任便往来;三、华人往美传教、学习、贸易、游历者不受此限,华人假道往他国,照章准行;四、美国给寓美华人,无论常居或暂住,给以最惠国侨民所享有之一切权利,但不入美国籍,美国重申它将“尽全力保护在美华人之身命财产”。<sup>⑨</sup>平心而论,张荫桓还算挽回寓美华人一些权益。所谓华工有经手帐目1000元未清仍得往来,也算留有交涉余地。这是双方妥协的产物,荫桓绝不昏庸。但条约签定后,美国排华势力并不满意,据张氏说:“约成,而美西各省诋毁(美国)外部,绘为画报”。<sup>⑩</sup>旧金山、香港、广州

等地华商也颇为不满,认为自禁华工出洋,无新客生意,华商生意将绝,中国每年将少出口食品、衣服、日用器具和药材等价值 1000 万两左右,还派代表向张之洞、李鸿章呈递公禀,请求协助阻止朝廷批准新约。由于张之洞和李鸿章出了力,说各口谤怨沸腾,都归咎张荫桓,朝廷拒绝批准新约。

美国国会听到中国拒绝批准这个条约的消息,便于 1888 年 9 月又通过更严厉的斯各特法令(Scott Act),规定:“凡华工无论前曾在美,或现时,或将来,一离美境,均不准复来居住;其或新例未行之前,回华尚未回美者,概不准复来”;以前发给回国华工作为返美依据的证明,均作为废纸,不能作为返美凭证;嗣后概不发给;从前一切条款例约有与本法案相抵触者,一概注销。<sup>⑪</sup>根据该法案,20000 多名回华及 600 多名返美途中的华工均不得进入美境,而在美华工也无望回国探亲了。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斯各特法。张荫桓连续向美国政府照会,并于 1889 年 1 月 26 日,正式向美国外交部提出强硬抗议,指出该法令完全违反 1880 年的中美续修条约,该约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华工来美,美国只可或为整理,或定人数年数之限,并非禁止前往;至人数年数,总须公道;曾在美居住之华工,往返自便,美国均不可立例限制;美国有保护寓美华工之义务。他声称,美国国会无权通过与美国政府的条约义务相抵触的法令。他要求总统建议国会“将新例有阻碍华人之处汰除,以符续约,是为至要”。由于得不到答复,他于 1889 年 7 月 7 日又向美外交部进一步提出抗议,重申中国政府对该法令坚决反对,指出:“两国既经立约,则各应遵守,设欲更改,必须和衷互商,再立条约,方能通行。”提醒美国政府,从 1844 年以

来所有的中美条约都是由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而签订的。他指出,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所作所为,不能证明国会的行动是正确的,这是对中国的侮辱,“此次待中国如是,实无成例可援,亦无道理可说”。他警告说,根据国际惯例,中国有权宣告所有现存的中美条约无效,与美国终止一切外交和商务关系。他进一步警告说,“按之公法,华人因新例所受损失,亦应惟美廷是问”,就是说,因实施斯各特法而给中国造成的一切损失要由美国政府负责。<sup>⑫</sup>由于没有炮舰作为后盾,空凭口舌,耗时近年,美国政府不予理睬。年尾,张荫桓因任期届满回国。崔国因、杨儒先后继任,几经周旋,1894 年达成《中美会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六款)》,这是照张荫桓 1888 年所拟原稿六款稍作修改而成,基本原则仍然遵循张氏。<sup>⑬</sup>后人作《张公神道碑铭》称誉他“持大体,蓄远识,滂仁弘义,以惠侨民”,是“绝域使才”,<sup>⑭</sup>这一评价是有史实依据的。

值得一提的是,张荫桓一向关注华侨华人权益,如 1896 年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他就曾驳斥日方原稿第 1 款:“谨查此款但说和好敦睦,未言两国人民如何保护,究嫌空泛,应驳改”。又原稿第 4 款,“此款专言日本可在中国设立领事,而于中国可在日本设立领事全未提及,应驳改”。<sup>⑮</sup>后经辩驳,条约第 1 款中增加“彼此臣民侨居,其身家财产皆全获保护,无所稍缺”<sup>⑯</sup>字样,并且同意设立领事,中国旅日侨民的保护方有依据。

荫桓出使三年,学习英语,日夕用功,能译西方书报,又经历南北美洲和欧洲各国,更增长见识,也带来思想上的震动,出使期间作的《三洲日记》对此有所反映。<sup>⑰</sup>在 1887 年的《略谈美国国势》



一文中他写道：“每思体察其防海情形，凡守险之炮台，御敌之士卒，需用之器械，常年经费之制，译为一书，导当事者采用。”又说：“美为民政之国，权操自下，总统坐啸画诺而已。中国能之乎？”<sup>⑧</sup>他讲求世务，留心西学，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情况都有所考察了解。回国后，张荫桓还延请美国人林乐知等编译成《西学富强丛书》二百余卷，介绍西方数学、电学、化学、天学、地学、矿冶工程、兵学、史学、法学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

光绪十六年(1890年)闰二月，张荫桓使美归来，再次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十八年(1892年)六月，改户部右侍郎，八月，转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赏加尚书衔，仍值总署，一身兼负外交、财政两大重责，成为清廷枢要人物之一，参与了晚清许多重大内政外交活动。帝师、军机大臣翁同和曾在日记里说：“此人才调，究胜于吾”，“真绝才也”，<sup>⑨</sup>倚如左右手。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称誉他：“自海疆多故，朝廷忧外交，倚为奔走使令之才，号通洋务”。<sup>⑩</sup>《清史稿》也说：“荫桓精敏，号知外务”。<sup>⑪</sup>据祁景颐《鞠谷亭随笔》记载：甲午后，李鸿章“凡遇交涉，必使侍郎(张荫桓)同为处理……在总署亦为张氏之言是从”。当时总署“接宾议事，多以属之。俄使尝笑言谓贵署仅君(张)一人耳”。<sup>⑫</sup>戊戌政变前夕，军机大臣廖寿恒也曾面奏慈禧：“总理衙门所称能办事者，惟张荫桓一人，(总署)实亦非伊不可”。<sup>⑬</sup>可见他是近代一位办事勤能、锋芒毕露、不知避忌的著名政治家、外交家。

①⑥⑦张荫桓：《三洲日记》卷一；卷四，第

五〇页；卷八，第三七页；卷五，第四五页；卷七，第四二页。

②张荫桓筹议在美华工善后事宜片，《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4)，第一三五二页。

③《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1)，第二六七—二六八页。

④⑤⑧《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版，第253、255、256页。

⑦⑧《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4)，第一三五六—一三五七页。

⑨⑩《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4)，第一四〇六—一四〇八页。

⑩《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4)，第一四〇二页。

⑫张荫桓照会，见《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4)，第一四一一—一四二二页。

⑬参见《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4)，第一四二九—一四三二页。

⑭张祖廉：《户部侍郎张公神道碑铭》，《碑传集补》卷六，第十二页。

⑮《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九，第十四页；又《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一，第二〇页。

⑯《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六六二页。

⑰转引自金梁：《近世人物志·张荫桓》，台北出版，第二九八—二九九页。

⑱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戊戌变法》资料(四)，第八二页。参拙文：《张荫桓与戊戌维新》，《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第四期。

⑲《清史稿》列传二二九，第一二四三—六页。

⑳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张荫桓》，台北出版，第一二六页。

㉑王庆保等：《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资料(一)，第四九四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

# 21 世纪初汉字学、训诂学 与中华学术研究的思考

□ 端木黎明<sup>1</sup> 宋永培<sup>2</sup>

1. 四川大学图书馆副教授, (四川 成都 610064)  
2. 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在现代条件下,为真实而科学地重视、挖掘、弘扬与阐释中国文化与学术所独特的特性和优点,并使之深入大众、实现学术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有赖于当代汉字学、训诂学的前驱作用,有赖于当代中国文字训诂学的革新和发展。为了实现其革新和发展,一要切实而深刻地还原,二要整体而贯通地表达。

**[关键词]**中华学术 文字 训诂 还原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102-06

这些年来,人们对中华学术在 21 世纪发挥重大作用的问题颇为关注,讨论也很热烈。例如成中英曾指出:

20 世纪到 21 世纪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将造成对西方文化与西方哲学的冲击;换句话说,我们即将面临一个新时代——一个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对西方文化与哲学冲击的新时代!①

成中英所说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我们认为其主流是包容在中华传统学术之中的,所以我们这里用“中华学术”来指称。

为什么在 20 世纪到 21 世纪,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将造成对西方文化与西方哲学的冲击呢?成中英说:

我认为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对西方哲学的冲击,是一个自然的趋势,这一自然的趋势,一方面在西方文化遭受危机,必须谋求出路的情况下显露出来;一方面则由中国文化与哲学本身所独特的特性和优点可以窥出端倪。

就是说,在当今人类文化面临许多

问题,西方文化遭受危机之时,中国文化与哲学本身所独特的特性和优点有助于解决许多重要的问题,有助于消弭西方文化遭到的危机。然而,“由于中国哲学的智慧隐藏在中国典籍当中,受古代文字的限制和各时代注释家的影响,因此,如何使中国哲学现代化,以满足现代人的需要,提供现代文化理论上的指针和理想的方向,是个亟须从方法上和观念上深入研讨的问题”。②

在这里我们要着重谈论的是,如何突破在理解中国古代典籍的形、音、义时出现的障碍和历代注释家人为的影响,深入到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源、核心,把中国古代优秀的情感、经验、思想、智慧原原本本、有血有肉地展现出来。我们认为这是促成中华传统学术现代化、国际化的第一步十分重要的工作,中国当代汉字学、训诂学应卓有成效,当之无愧地充任这一重要工作的前驱。

中国当代汉字学、训诂学要真正发挥这一作用,亟需进行观念上、研究目标

上的一系列正确而果断的革新。

首先是观念上的革新。一定要坚决地革除半个多世纪以来盛行于中国语言学界、中国学术界并造成较大危害的盲目崇奉外国的无知、偏见与陋习。这种无知、偏见与陋习集中表现在：照搬西方语言学、西方的学术研究的方法与结论，用以衡量与裁断中国国内的学术研究的是非得失。

章太炎曾极明白地指出：

夫国无论文野，要能守其国性，则可以不殆。<sup>③</sup>

一国应守其国性，一国之学术亦何独不然？中华学术之国性，即中华学术的民族特点，它是经过百代千年的锤炼，从古代的华夏民族到今日的中华民族先后传承的民族性中发源与升华而出的。美国的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说得对：“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是由民族潜意识造成的”。因此，在中华国土上成长起来的，长期而又自然地受到本民族生活习俗的濡染和学术文化的熏陶的研究专家与学者，他们对于使中华学术得以表述的语词音义的理解，对于中华传统学术中记载的史实与风习的体认，对于其中贮存的古代汉民族的情感与观念的感悟，无论如何要比国外的汉学家真实得多，切实得多，深入得多。加上他们具备了深广的学术根基，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占有翔实材料，并作出系统的贯通的研究，那么他们的成果之可信度与价值，就更应实事求是地予以赞誉与珍惜。而不应以其是否海外汉学家或是否被国外的专家看重来划线，以至妄自菲薄，崇洋非中，舍本逐末，品评失宜。这是尤其应当警诫的。

台湾的哲学家方东美曾就西方“汉学家”、“中国通”的问题发表过看法，其

题目叫做《对西方的“汉学家”、“中国通”却不敢恭维》，他说：关于中国哲学思想，历代都有学养深厚的学者，都有直接的体验。虽然在方法上不十分讲求，但历代体验的心得不断笔之于书。使我们后起的人，可以前有所承，后有所继。反过来看外国人的所谓“汉学家”，讲文字学、音韵学，因为他们原来在古典文字方面，如希腊文、拉丁文或是古希伯来文、古埃及文等方面有专门训练，能作比较的研究，可以窥见门径有所成就；但是，要通晓所谓哲学思想首先要通晓中国文字，不仅是构造、声韵，而且有它的用法与涵义。从那些平常号称“中国通”的汉学家们所写的中国方块字来看，生涩扭曲，全然没有中国字的气势与神韵，叫他们去读中国的易经、老庄，那怎么能懂？但是他们外行人而写外行书，却因流通广，而变成了中国专家……。

目前世界上这类“中国通”比比皆是，几乎把中国思想糟蹋尽了。而我们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绝大部分是不能够接触中国文化固有文献的人。他们如象是被蒙着眼睛，被少数几个假的冒牌的知识贩子牵着鼻子走，任凭这批人信口胡说：中国东西不好，外国东西好！真正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他们也不甚明白。就因为他们本身不学无术。外国文字没学通，连中国文字也不通，怎么可能弄明白？

中国学术中的许多奥秘门径，就这样被封闭死了。可怜的是莘莘学子们，被蒙在鼓里面，难见真正的学术天地，难见真正的中国学术思想。<sup>④</sup>

东方美的上述看法，对于人们清除国外某些“汉学家”、“中国通”头上的神圣的灵光圈，对于我们清醒地、客观地认识国外汉学研究的弊端，对于破除迷信，增强我们自己研究传统学术文化的坚定

信心,充分认识我们的功力与学术水准,都是有裨益的。只要我们在传统学术研究上广博、精审、有识断,我们的研究就是继承与弘扬传统学术的“名山事业”,其见解、结论就足以成为衡量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之是非得失的标尺。

实行了这种观念上的革新,不盲从古人,也不迷信外国人,就为当代中国文字训诂学充任中华学术现代化、世界化的前驱创造了很重要的思想条件。

其次,将研究目标瞄准能集中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学术之核心,以助于在现代畅行中华学术文化有生命力的重要课题。

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探讨天地万物与人的关系上,一开始就实行“合——分——合”亦即整体贯通的原则与做法。这种原则和做法,不但贯串于上古时代的史实、人们的情感与观念中,也贯串于传统学术之中,由此而造就了足以成为后人立身行事之楷模并且供全人类取法的宝贵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

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的核心,在于“精审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实,综其始终”。⑤对这一核心的表述,《易》称之为: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⑥

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⑦

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⑧

用《礼记·中庸》的话来说,叫做: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可见,从根本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是讲天地、万物、人的“生生”与“日新”的,是讲人参赞天地化育的。用今天

的话来表述,就是天地、万物、人如何畅行其生机,完成其生命历程,人在遵循天地畅行生机的规律中,如何助成万物完成其生命历程。总之,在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规范中,天地、万物、人构成和谐的统一体,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人尊崇与裁成天地万物,天地万物养育并造就人的心智才能。

当代国外严谨而别具洞察力的科学家,他们最为看重的中国文化、学术中的精华,正是对有关天地、万物、人的“生生”、“日新”之规范的深刻总结。《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一书的作者,比利时著名的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普里戈和伊·斯唐热曾怀着激情赞叹:

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莱布尼兹,也因其对中国的冥想而著称,他把中国想象为文化成就和知识成就的真正典范。……因此,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⑨

我们认为,中国当代文字学、训诂学充任中华学术现代化、世界化的前驱,现在应当从事的第一步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中华传统文化、学术中“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的有关天地、万物、人的“生生、日新”之规范的深广而生动的总结原原本本、有血有肉地展现出来。立即制定具体的规划,着手切实的研究,确定上古时代能代表中华文化、学术的源头、本来面貌的经典文献,采用系统贯通的研究方法,从解读这些文献的白文入手,清除理解上古时代字词的形、音、义时产生的障碍,突破后人注疏的樊篱,必征诸实,必寻其源,由

博返约,明理得法,将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本源、系统、条理、发展、实证逐一清理、论列,用现代人易于理解的表意方式作出具体明晰的表述与阐释。

这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精华所作的清理、阐释必须遵照以下两条基本要求。

### 第一条:切实而深刻地还原。

这是指如实地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之精华的原貌,这就是使中华文化、学术之精华“充实光辉”、“广大悉备”的真实面目重现于世。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精华作出切实而深刻的还原,必须经由浩繁、缜密的考释与研究。这种考察与研究的准则,应借鉴戴震提出的力求至于“十分之见”的做法:

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义,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sup>⑩</sup>

这是考释与研究的高标准,虽悬鹄甚高,而必心向往之,必刻意厉行之。我们拟定的试图达到这一高标准的具体步骤包括:对于上古时代的经书、小学专书,一本一本地作系统的研究,归纳出每一本书中众多词义的系统联系,并说明这些词义的源流、分属;然后有理有据地把这些有系统联系的词义递相贯通。不论是归纳词义的系统联系,还是把有联系的词义加以贯通,都必须提供三个以上的证据,这些证据能表明我们对于词义的系统与贯通所作的归纳,跟文献中

有关上古史实、古人的情感、观念的表述是彼此契合的。

由中国古代学术必征诸实、必寻其源、由博返约的根本传统所决定,中国古代从事任何一门学术的研究都要坚持一个前提,都是先要经过小学研究的阶段,即对语言文字的形、音、义的学习、探讨、理解务求确切、明晰。这个前提是不能够缺失的。如果不能保证这个前提,也就不可能有正确中肯的经学研究、诸子学研究、史学研究、文学研究、哲学研究等。这就是戴震强调的: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sup>⑪</sup>

戴震作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犹如攀登堂坛必须循着一级一级的台阶上升,其间不可能超越任何一级台阶那样,要研究古代文献,则必须经由理解“小学文字”的含义这个最为基本而重要的阶段。

经学、诸子学、史学、文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经书、诸子等上古文献中记载的,上古时代的人们对于所经历的史实以及他们的情感、观念的体验与认识。如果对于上古时代语言文字的特定含义不能作出正确的理解,那么经学、诸子学、史学、文学、哲学的研究也就丧失了本真。无论研究任何事物,第一步应当是还原与理解这一事物。当然,丧失了经学、诸子学、史学、文学之本真的研究可以寄托后人或今人的主观意图以及后代或当代的时代意识。这自然可以看作是这种研究包含的“意义”或“价值”的一个方面。但无论如何,这种“意义”与“价值”只能属于后代或当代的阐释者本身,而并不属于经学、诸子学、古代的史学与文学。所以后人今人任何一种添加自己的主观意图与时代意识的经学、诸子学、

史学与文学的研究,总是在有意无意地证明着一个客观的现实:经学、诸子学、古代的史学与文学的真面目总的看来尚未揭示,能够体现经学、诸子学、古代的史学与文学的真实意义与价值的研究总的看来尚未形成,经学、诸子学、古代的史学与文学的正确研究至今仍是我们肩负的重大任务。

决不能仅仅从形式上将经学、诸子学、古代的史学与文学看成已经是过去了的甚至过时了的事物。因为它们之中贮存的是上古的圣哲和民众“与天地之心(相)协”的“心志”,<sup>⑫</sup>亦即我们的祖先在取法天地万物运行规律的过程中熔铸的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这种历史文化在上古就已获得“光被四表”、<sup>⑬</sup>“广大悉备”、<sup>⑭</sup>“充实而有光辉”、<sup>⑮</sup>“尽美矣,又尽善也”<sup>⑯</sup>等等赞誉。先秦时代的人们与这种历史文化的产生年代距离较近,他们对这种凝结了天地万物生命力的历史文化钻研得深,认知也更为真切,因而他们对于经学、诸子学、古代的史学与文学中包容的历史文化的价值所作的赞誉是可信的,是鞭辟入里的。我们今日展读这些贮存优秀历史的文化的文献典籍,同样能感受到其内涵之浩博与渊雅,以及它们浑浩流衍、万古长新的生命力。

这些都说明,要研究贮存于古代文献典籍中的中国历史文化,其前提是必须研究文字形、音、义,并使之明晰。舍此别无正确的路径。

## 第二条:整体而贯通地表述。

不仅要切实而深刻地还原中华文化、学术的精华,还要用现代人易于理解的语句、方式来表述它。表述的语句应是规范、生动而通俗的,表述的方式应是全面、有条理、彼此渗透的。

《孟子·离娄下》云:“博学而详说之,

将以反说约也。”由博返约是中华学术的根本传统,我们今日采用整体贯通地研究与表述的方法,不仅继承了“由博返约”的传统,而且融入了当代新锐的科学精神。美国未来学家阿·托夫勒在《科学和变化》中说:

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一些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在科学中,我们不仅习惯于把问题划分成许多细部,我们还常常用一种有用的技法把这些细部的每一个从其周围环境中孤立出来。……但是,伊·普里戈金却不满足于仅仅把事情拆开。他花费了他一生的大部分精力,试图去“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由此而写成的《从混沌到有序》一书)是改变科学本身的一个杠杆,是迫使我们重新考察科学的目标、方法、认识论、世界观的一个杠杆。<sup>⑰</sup>

这种整体——切分——整合的方法论原则,与中国上古时代“合——分——合”的准则、方法是一致的,体现了当代新锐的科学精神。我们采用整体贯通的方法来研究、还原和表述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精华,是对由博返约的传统的继承,和对当代科学精神的融汇。

中国古代学术坚持分而相合、博综融贯的方法。这种方法来自于、取法于天地万象恒久健行之中形成与依循的“合——分——合”的条理与准则。

戴震说:

在天为气化之生生,在人为其生生之心……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条理,惟条理所以生生……务要得其条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则无不可为。<sup>⑱</sup>

王夫之也曾论述及此:

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



乎?求之于天地,无有此也。求之于万物,无有此也。反而求之于心,抑未谗其必然也。<sup>①9</sup>

虽然,亡他焉,全体之而得矣。全体之,则可以合,可以分。<sup>②0</sup>

王夫之、戴震的论说告诉我们,遵循天地万物恒久健行的“合——分——合”条理与准则,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实行“合——分——合”的条理与准则,“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则生机勃勃,永葆青春。

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中,往往奉行“析之愈精,只分不合”的思维定式和纯形式分析的手法,从形式上把中国语言学的学科切分得尽量单一、细微,彼此不搭界、不贯通。在研究目标上,往往专注于语言形式上的语法、语音、字形、修辞,在语法、语音的研究上大多照搬西方语言学形式分析的方法与结论,在音韵学的研究上讲抽象音理的多,实行形、音、义相结合,并落实到义上的少。拒绝或回避语义的研究,或者用纯形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现代的语义,往往进行孤立的、零碎的、抽象的、表面化的字形、语义的研究。反对或排斥先秦与汉代的语义研究,反对或排斥传统训诂学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与中国语言的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极少继承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优秀遗产,极少体现出中国语言研究的民族特点和当代应有的时代特点。所以这些本来就稀少的成果很难在语言学界付诸应用,更难于被文、史、哲、经等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所重视和吸取。由于奉行“析之愈精,只分不合”的思维定势与纯形式分析的方法,中国现代语言研究的一些学科快把自己弄成与世绝缘的学科了。

钱穆曾经极确切地揭示过:

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

巧。其弊使人为纤儿细士,与天地世界无预。<sup>②1</sup>

中国现代语言研究的一些学科在研究原则与方法上若不改弦更张,幡然易帜,怕是真要“与天地世界无预”了。

坚持分而相合、博综融贯的准则,具体地说,是坚持语言文字与历史文化的分合与融贯,坚持小学专书与经典文献的分合与融贯,在小学专书中则是《说文》与《尔雅》、《广雅》、《文言》、《释名》的分合贯通,在经典文献中则是经书与诸子史传的分合融贯。

章太炎曾指出:

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殖。<sup>②2</sup>

落实到应当引以为据的小学专书与文献典籍,就是要把《说文》、《尔雅》、《广雅》、《方言》、《释名》等与五经、诸子史传等加以贯通,其中尤应注重贯通《说文》全书所载本义,以《说文》为主中之主,贯串《尔雅》、《释名》等其他小学专书,贯串五经与诸子史传。

对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精华作整体贯通的表述,可按以下程序进行。

首先是表述这种文化、学术的发源阶段,当时它们的各个部分是怎样成批地、系统地产生的,各个部分呈现为怎样的具体形态,其中的核心部分与枢纽部分怎样把相关部分贯通为整体。

接着表述这种文化、学术承先启后的有关发展阶段。在每一发展阶段,各个部分的产生、形态,其中的核心部分、枢纽部分的作用,它们的产生、形态、作用如何受到发源阶段文化、学术的整体、核心、枢纽的制约与影响。

然后表述发源阶段与各个发展阶段的整体联系与相互作用。

然后探讨与总结发源阶段与各个发展阶段之间分与合的规律,(下转第 128 页)

# 古典美学的拓展与突破

## ——《金瓶梅》美学风貌论要

□ 王 坤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从审美活动的领域、审美观照的对象、审美信息的载体和审美交流的受体这四个方面来看,《金瓶梅》显示出与古典美学完全对立的美学风貌。这一裂变,在中华民族审美实践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关键词]**美学史、古典美学、裂变、化丑为美。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108-06

### 一、将日常市民生活纳入审美视野

《金瓶梅》所透射出的审美活动的旨归,与古典美学显然是相反的。它将审美活动的性质规定为进入现实,即人们在审美活动中进入远比个人生活更为广阔的世界;艺术是对现实的凝定与拓展。正是在进入现实的美学精神的统摄之下,《金瓶梅》以长篇巨制的篇幅,围绕着市民日常生活,描绘出一幅气象宏大的明代中叶社会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就时代风貌而言,《金瓶梅》写尽了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态:“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喋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壘枕席之语,驱驰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卑逢迎,奴佞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馘意快心。”<sup>①</sup>通过审视对社会风貌的详细描绘,我们看到了明中叶社会生活的基调与旋律:主宰社会情势的,只有权势和金钱,官吏与商人;权势用来敛聚金钱,金钱用来收买权势。权钱并重,官商齐名。两者的结合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推拥着滋生它们自身的社会以无可挽回之势走

向解体。最能表现这种力量底蕴的,莫过于西门庆的“独立宣言”:“只要尽力花钱打点,“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sup>②</sup>

就芸芸众生而言,《金瓶梅》描绘的人物,几乎囊括了明中叶社会的各色人等。以朝廷命官而论,上有当朝宰相,王公大臣,下有州县的各级官员,当差小吏;以地方势力而论,有皇亲国戚,宦官太监,大恶霸与小地痞;以女性而论,有诰命夫人,大房正妻,也有小妾小妇,卖笑妓女;以奴仆而论,有高级帮闲,穷酸秀才,也有低级无赖,下等仆人;还有什么三姑六婆,乞丐叫花,和尚道士僧人……而且,用道德观来评判的话,撇开它从《水浒传》承袭来的武松、武大郎,《金瓶梅》中所描绘的芸芸众生简直就是一幅“百丑图”,用张竹坡的话来说,即“西门是混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敬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惠莲是不识高低的人,如意儿是顶缺之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

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是枉为人也。”<sup>③</sup>

《金瓶梅》的问世,意味着古典美学从体系上发生了最彻底、最典型的裂变。从作者系统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书的作者,并非一直都保持着正统文人的身份,而主要是以书会人才的身份终其一生的。他们不必为从事小说的加工整理而担心受到正统文人攻击,所以能够坦然地署上自己的真名实姓。但《金瓶梅》的作者则不同,作为“嘉靖间大名士”,<sup>④</sup>为了免遭同辈中人攻击,他所能尽到的最大努力,就是在实际行动上冲破古典美学的界域,但毕竟还慑于习惯势力,不愿或不敢把自己的真名实姓公之于众。因为,“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sup>⑤</sup>韩愈还不过是写了篇《毛颖传》,就遭到其门人张籍的讥刺。即便到了小说、戏曲为社会普遍认可的时候,蒲松龄仍旧使用正统文人一贯推举的文言文来创作《聊斋》。仅此一斑,就足以见出以小说来进行审美实践活动的艰难。其次,从作品本身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书,虽然与古典美学大异其趣,但也与《金瓶梅》截然不同。作为历史故事、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它们主要还是在某一具有永恒性的观念支配下,对现实进行充满理想意向、幻想色彩的演绎,不同于《金瓶梅》以日常市民生活为审美领域,以人性恶、生活丑的感情形式为审美对象的美学风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金瓶梅》的问世,标志着古典美学发生了最具质变性质的拓展与突破。从这里一直发展下去,便有了《红楼梦》的出现。

## 二、将生活丑、人性恶作为审美对象

这群现实生活中本该速朽的丑类,经由《金瓶梅》的描写,却成为不朽的文学形象、永久的审美对象。正如清末文

龙所说的那样,他们“未死之时便该死,既死之后转不死”,因《金瓶梅》一书而“与日月同不朽。”<sup>⑥</sup>这也正是《金瓶梅》在美学史上的巨大功绩所在:将生活丑、人性恶的感性形式作为审美对象引入审美领域。它既意味着古典美学发生了最根本的裂变,更意味着中国审美实践活动走向成熟——不但审美,也审丑。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奸狡狠毒又风流倜傥,是个集地痞无赖、豪强恶霸于一身的人物,选定以他为中心的生活丑、人性恶作为审美对象,必然难以回避有关主人公性生活方面的内容。在传统文化里,对正常的性内容都是讳莫如深、鄙夷有加的,淫乱更被视作万恶之首、万丑之魁,性事与丑、恶往往是被看作三位一体的。而在古典美学中,要是还能确认出其对现实的涵纳的话,那也只是一种滤净了性内容的现实。《金瓶梅》将男女之间这种极为普遍又极为隐秘的生活内容着力加以淋漓尽致的披露,纤毫毕现,尤其极力铺陈围绕性事的嬉戏耍笑,如西门庆拿潘金莲取乐的方式,<sup>⑦</sup>潘金莲媚悦西门庆的手段,<sup>⑧</sup>等等之类,主要是作者为了突出表现自己对古典美学精神的决裂与反叛。这种过于急遽、粗糙的决裂与反叛,犹如一道巨大而突兀的断裂带,使得《金瓶梅》与古典的审美传统完全脱钩。如意识不到美学精神上的拓展与突破,只是以古典美学精神作为唯一的评定标准,那么,对于《金瓶梅》中的性描写,贬之者的指责就会是方枘圆凿,褒之者的赞扬也只能是牵强附会,都无法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解释其产生的必然性。至于流行的说法,即认为其具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则更是一种近于认鹿为马的批评。因为,他们所依据的是现代意义、现代形态上的现实主义标准;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是刚

从古典美学的母体中正式裂变出来的头生子,矫枉过正,自在情理之中。欧洲文学的发展亦是如此:其现代意义、现代形态的现实主义,在初始阶段同样表现出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如《十日谈》等;就连浪漫色彩极为浓厚的《巨人传》也未能得免。个中缘由,也在于它们是刚刚从神学支配的美学体系中分离出来。

实际上,《金瓶梅》的作者是把有关性的内容当作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来安排的。性事与金钱是全书的结构中轴,一切都在围绕它们进行,即“此书单重财色”。<sup>⑨</sup>通过对西门庆生前死后有关财与色的描写,世态的炎凉得到了立体式的凸现:性事反映出现实生活中最隐秘的炎凉,金钱则表现出现实生活中最公开的炎凉。张竹坡因此认为,理解《金瓶梅》的钥匙,就在“冷热二字”。<sup>⑩</sup>

《金瓶梅》以生活丑、人性恶为其审美观点的对象,而古典美学所以认为的丑,又几乎都含纳在生活丑、人性恶之中。以往的论者,除了指责《金瓶梅》的作者不应展示、欣赏主人公们生活中的性内容以外,都一致认可作者将其它方面的丑转化成了美:认为那些丑凝定了作者对它们的批判和否定。这一点也正是目前流行的化丑为美理论的内核所在。其实,《金瓶梅》作者的审美观是始终如一的,并未在中途产生变异。作者不仅以主人公们沉溺于情欲的性关系这种丑为审美观照对象,同样也以全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生活丑为审美观点对象。如果说作者是在展览式、欣赏性地描写性内容的话,那么,作者描写其它内容的态度难道是与此相反的吗?

为什么《金瓶梅》所标举的审美对象会与古典美学如此直接对立呢?关键在于道德因素的有无。古典美学所推崇的,是以善为美,要对思想感情进行高度

的提纯;而《金瓶梅》所张扬的,则是以真为美,省略了过滤生活原貌的一切环节。这是由它所追求的美学风貌决定的:以进入现实为旨归,以日常市民生活为审美领域,以生活丑、人性恶为审美对象。以真为美,就势必不排除生活丑、人性恶,只有以善为美才会排除它们。所以,就《金瓶梅》所表现出来的美学精神而言,是不存在古典美学意义上有关丑与恶的禁区的,也谈不上什么化丑为美。

《〈金瓶梅词话〉序》谈及性事与圣贤的关系:“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sup>⑪</sup>显然,是道德因素才使得“人皆好之”的事情变为“人皆恶之”。《金瓶梅》的审美魅力,不在于作者对生活丑、人性恶所作的否定和批判,而在于那些丑与恶的感性形式活脱逼真。这也正是丑与恶的审美价值所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在整个感情世界里,人是最高级的存在物,所以人的性格是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世界上最高的美。”<sup>⑫</sup>因此,只要不悖于现实生活的逻辑,一切生成在人物性格上的丑与恶,都可以直接成为审美观照对象。比如,西门庆本是无恶不作的地方一霸,潘金莲不过是一个为保全自己的地位而心狠手毒的纵欲妇人,应伯爵只是个高级帮闲……然而,《金瓶梅》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却全是由这些形象体现出来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金瓶梅》所张扬的美学精神与古典美学精神的当代形态达于同一:通过描绘极富蕴涵的人物形象,艺术地唤醒、恢复、升华人们对世界的感觉。

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应是无终点的。而我们现在所达到的文明程度,还只允许人们在审美活动中推举以善为美,有选择地推举以真为美。因而,现阶段最高层次的美,是善美与有选择的真

美的融合。今天,无论有多少理由去谴责《金瓶梅》开了色情文学的先河,我们都切不可忘记两点:《金瓶梅》是中华民族审美实践史上的一次大胆尝试,而不敢尝试的民族是不会兴旺昌盛的;《红楼梦》正是沿着《金瓶梅》开凿出来的台阶拾级而上,才得以达到善美与真美统一的境界——迄今为止最高的审美境界。

我们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化生活丑为艺术美这一美学命题,作出与审美实践史相切合的解释。现代意义上的化生活丑为艺术美,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充分必要条件:审美主体对生活丑的恰当审判;对生活丑的感性形式的生动造型。在将生活丑的感性形式引入审美领域的初始阶段,人们还只是锐意于从审美到审丑的突破,还没有意识到正确的道德观念在审丑中的重要性,还没有意识到以丑为美与化丑为美之间的实质性区别,更缺乏处理这种区别的经验及能力。《金瓶梅》在我国美学发展史上所具有的里程碑般的意义,就在于它创造性地实现了化丑为美这一原则;因为是初创,该原则的运用还显得十分粗糙,离完善尚有一段距离。《金瓶梅》的作者在实践这一原则时,主要还只是着力于对生活丑的感性形成的生动造型,还没来得及将对丑的审判寓于其中;到了《红楼梦》,这一原则才得以完善——这一完善在我国美学史上同样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它使化丑为美达到了“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sup>⑬</sup>的完美境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历史上,这一完善过程并非直线发展的,而是长期摇摆了两个极端——偏执于对丑的审判与着力于对丑的感性形式的造型——之间的曲线发展过程。比如,在建国后的17年文学中,这种退化偏向于前一种极端;在新时期文学里,这种退化则偏向于后一种极

端。

### 三、舍文言而用白话

《金瓶梅》的美学风貌与古典美学的差异,无论表现在什么方面,最终都必然要落实到信息载体——语言——的区别上。甚至可以把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是两种语言的出场,才使得两种美学精神最终得以物化,并存于世。如果说,两种美学精神的差异还具有主观色彩的话,那么,文言与白话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则是两种美学精神相互区别的客观事实了。

在文学领域里,最适于古典美学用来组织、结构其审美信息的体裁样式,就是古典诗词和散文,而最适于它们用作信息载体的语言,自然非文言莫属;同样,最适于《金瓶梅》所体现出来的美学精神用以组织、结构其审美信息的体裁样式,也就是它本身那样的小说了,白话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其所选择的信息载体。因为,只有使用白话,才能圆满地完成其审美旨归所要求的创作任务:活龙活现、维妙维肖地凸现生活。《金瓶梅》的最大成功之处,也正在于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在刻画人物形象、设计人物语言上,它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完美地步。你看那潘金莲,在与仆人琴童私通、被西门庆发现后遭到痛打时,她的抵赖与哀告:“好爹爹,你饶了奴罢!你容奴说,便说;不容奴说,你就打死了奴,也只是臭烂了这块地。……”<sup>⑭</sup>顿时就使得西门庆转怒为喜。还有那应伯爵,他一出场,谁都会忍俊不禁。明明是为了蹭饭吃,当西门庆问他“你吃了饭不曾”时,“伯爵不好说不曾吃,固说道:‘哥,你试猜。’西门庆道:‘你敢是吃了?’伯爵抢口道:‘这等猜不着。’”<sup>⑮</sup>也是这个应伯爵,邀了一帮兄弟去吃西门庆,偏又每人封上一星银子权充茶钱。西门庆刚说不



要,“应伯爵连忙又唱喏,说:‘哥,真个?俺们还收了罢。’因望着谢希大说:‘都是你干这营生!我说哥不受,拿出来,倒惹他汕两句好的’。”<sup>①6</sup>这种活脱如跳、鲜明似照的人物性格语言,在《金瓶梅》里俯拾即是。如果说古典诗文里有许多名句将流传千古的话,我看《金瓶梅》的许多土话俚语同样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金瓶梅》所使用的这种白话,虽然有不及文言之处,但更有文言所无法企及的功能。就自然语言而论,它不压缩语言的剩余信息,也因此不受任何限制。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用它来传达审美信息。就文学语言而论,使用白话不象使用文言那样要遵守复杂繁多的规则。根据复杂性与精确性成反比的“不相容”原理,古典诗文的信息量是最模糊的,因而单位信息量也是最丰富的,白话小说在这点上远远不能企及。但白话小说在篇幅上没有限制,其信息量在时间、空间上可以对整个社会历史作立体式、全方位的容纳。因此,象《金瓶梅》这样的长篇白话小说,在宏观层次上能直接贴近社会历史过程的大起大落,在微观层次上能精细地把握人间世态变化无常的细微感觉。它所能包容的信息量,又是古典诗文远不能企及的。古典诗文的信息有如涓涓细流、绵延不绝,需要接受者慢慢品尝,细细体味;而《金瓶梅》这种白话小说的信息,则似大潮汹涌、呼啸奔腾,它能涌裹着读者随着这大潮一道前行。

当然,《金瓶梅》在运用白话方面,并非完美无缺的。我认为,它的缺陷倒不在于语言运用的“自然主义倾向”上,而在于人物长篇对白的个性化程度,这比简短对白的个性化程度逊色。比如,《金瓶梅》中众多的女性形象,大都形神各异、栩栩如生,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但她们诅骂人时的大段大段对白,往

往给人以雷同之感。无论是潘金莲还是庞春梅,或者李瓶儿、吴月娘、宋惠莲、王六儿等,只要她们在大串大串不歇口地骂人,其语言的活脱生动自不必说,但在风格上总是大同小异,如出同一泼妇蛮妻之口。在长篇白话小说的初创阶段,这种缺憾的存在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到了《红楼梦》,人物长篇对白的高度个性化才得到完全实现。

#### 四、既宜文心更适俚耳

任何一种审美旨归、审美对象及审美信息,其最终得到验证、确认,都是通过落实到审美交流中的信宿那里,即接受者那里来实现的。但在中国的接受美学史上,“文心少而俚耳多”,<sup>①7</sup>向来就存在着文心与俚耳之间的鸿沟。文心越界而入俚耳之地的事例,是时有发生,但那实际上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为己所用,或者说是一种夺取:“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sup>①8</sup>鲁迅先生对此有过极为精到的论述:“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弄得变成僵尸,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sup>①9</sup>《金瓶梅》的问世,导致了我国接受美学史上的历史性转折:文心与俚耳之间的鸿沟从此正式得以填平,双方从此正式汇聚在同一审美客体面前。众所周知,《金瓶梅》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人们争相传阅,几至家喻户晓:“吴中悬之国门。”<sup>②0</sup>

从文心这方面来说,《金瓶梅》所揭示的审美旨归,填补了古典美学的空白,在完满的审美活动中,艺术不只是让人的灵魂心性找到归宿,还应让人的现实生活得到印证、延伸。比如,我们在杜甫的诗中,就不仅能看到他那博大的人道精神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如“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sup>②1</sup>也能看到他的日常



生活与情调趣味,如“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低”。<sup>②</sup>但真正够得上全方位、立体式印证、延伸了审美主体的现实生活的艺术作品,在我国理当首推《金瓶梅》,它达到的高度同样值得文心景仰不已。章学诚说过:“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其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其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sup>③</sup>以此来衡量《金瓶梅》,谁都不会否认,它的叙述语言,尤其是人物语言,已达到相当完美的地步。

从俚耳这方面来说,尽管《金瓶梅》是文人的创作,但它并非老百姓看不懂、不愿看的阳春白雪;相反,它的体裁样式,正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金瓶梅》中包括了各种形式的文学样式,它们“包括明代文学的领域,不管文学史家在什么地方划出不同文学的疆界,《金瓶梅》的作者都能越过。”<sup>④</sup>根据信息论的观点,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信道噪音或信码噪音都会抵消部分信息。文学语言的信息熵量是由语义容量和语言灵活性构成的。文学写作的各种规则,都不能超过一定的界限:由各种规则所形成的信码噪音不致完全抵消语言灵活性,否则,文学创作就失去了意义。《金瓶梅》对于俚耳来说,则信码噪音全无,接受可以顺利进行,不存在任何困难。在《金瓶梅》刚刚刊行之时,就有人指出了这一点:“吾尝观前代之骚人,如卢景暉之《剪灯新话》、元微之之《莺莺传》,……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岁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sup>⑤</sup>这一特点甚至还使得接受者能够跨过阅读原著这一基本接受环节,通过其它方式来窥见、了解作品的主要内容与精神面貌。

从古典美学的拓展与突破这个角度来审观《金瓶梅》,我们不难看到,它的问世,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美学与文学的发展局面,它对我国美学与文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和所产生的影响,永远都不会为历史遗忘,永远都不会被时间侵蚀。《金瓶梅》为我国美学与文学铸定的新品格,在当代仍然以相当大的内聚力、凝定力产生影响。

①[明]谢肇淛:《金瓶梅跋》。

②⑦⑧⑭⑮⑯《金瓶梅》第57、27、72、12、1、39回。

③[清]张竹坡:《金瓶梅读法·三十二》。

④⑫[明]沈德符:《野获编》。

⑤鲁迅:《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

⑥刘辉:《〈金瓶梅〉研究十年》,见《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第213页。

⑨[清]张竹坡:《金瓶梅回评·第一回》。

⑩[清]张竹坡:《金瓶梅冷热金针》。

⑪⑳[明]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

⑬[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当代美学批判》,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4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⑰王昆仑:《王熙凤论》,见《光明日报》1963年4月25日。

⑱[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

⑲鲁迅:《花边文学·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⑳鲁迅:《致姚克》,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卷,第174-175页。

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㉒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㉓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古文十弊》,中华书局1985年版,上卷,第508页。

㉔《〈金瓶梅〉西方论文集》,徐朔方编选校阅,沈亨寿等翻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责任编辑:陶原珂

# 对 90 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批评

□ 古远清

(中南财经学院台港文学研究所教授,湖北 武汉 430064)

[摘要]中国批评家们从政治化写作向现代化写作、欲望化写作过渡后,并没有为 90 年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预示一种新前景。在随同文学创新并进的同时,许多批评家在从事横的移植时忽视了纵的继承,对西方文论多采取整体认同的态度,很少有批评家站出来,对用新潮装饰的文论说“不”。还有文论思想干瘪,语言浮肿,造成批评对读者的疏离。

[关键词]90 年代 文学批评 评论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114-04

90 年代,文学批评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赞之者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sup>①</sup>攻之者曰“90 年代的文学批评已经开始呈现瓦解状态”,批评家们得了“癔病”,“真正的批评家缺席”、“失语”。<sup>②</sup>其实,后者看法过于极端。应该承认,90 年代的文学批评比起 80 年代来,学院派批评家与专业批评家合谋营造的盛景已不复存在,但它舍弃了 80 年代那种对多元文化的盲目乐观态度,而对现代化批评在人文意义上作出了有价值的探讨。90 年代的批评家们不像过去那样浮躁和焦虑,把西方文论一次次搬进来囫圇吞枣,而是从这个误区走出来重返家园、重建家园,寻找自己的话语。在处理西方与中国传统、自我与他者问题上,也不再搞二元对立,而是在更宽阔的文化背景上寻求建立有东方特色的话语体系。如有人所倡导的“圆型批评”,就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有关“圆的思想的合理内核。”<sup>③</sup>“第三种批评”的倡导者也没有意识形态的政治怪物,而是企图建设一种“以人文核心为内涵”的“新意识形态批评”,“使它越来越成为与社会对话的文本,而

不是只供语言分析的文本。”<sup>④</sup>

90 年代的文学批评,总的说来有正面,有负面,现分述如下。

其一是不热衷于纯理论的新学科研究而面对现实,跟踪当前的创作现象,及时作出自己的反应。对贾平凹、王朔作品的评论,对《九月寓言》、《曾国藩》的艺术分析,对刘震云、韩少功等作家的评论,均说明评论与创作的关系改善了,贴近了。在文体研究中,散文一直是薄弱的环节。可近年来对散文创作新现象的研究、对余秋雨文化散文得失的探讨,也显示了散文评论不再像过去那样甘居下游。

但评论家们爱走极端。当他们不热衷于纯理论的新学科建设的时候,又有人效仿思想家去做宏观的文化批评。这种批评如写得好,的确能给人高屋建瓴之感,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文化批评显得大而空,这种批评的一大特征是爱用大词,诸如“全球性”之类。这种“全球性”的滥用,使 80 年代风行过的细读文本的新批评相形见绌。这便造成了批评与创作的疏离。这就难怪有新的创作现

象出现的时候,很少有人作扎实的研究,不少批评家对此缺乏热情乃至不屑一顾。对“新写实”小说的分析算是例外。到了1996年,又有批评家提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问题。这种提法表明了评论家对创作倾向的关注。但这种“冲击波”的“旗号”能否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则还待推敲。

一方面说评论与创作关系的改善,一方面又说“疏离”,乍看起来前后矛盾,其实这正反映了90年代的批评特征:批评家对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复杂文学现象把握不透,时而紧跟,时而疏离。疏离的原因除有些批评家改变写作路线外,还因为90年代的创作不如80年代那样能激发批评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其二是评论队伍有新的分流和调整。像80年代把文坛弄得沸沸扬扬的评论家刘再复不再在国内耕耘,青年评论家黄子平到香港浸会大学任教,但绝大多数评论家仍活跃在国内文坛。也有一部分评论家下海经商,有的则改行写小说(如季红真),有的则改写文化评论(如吴亮),但多数在80年代涌现的评论家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在“胜利大逃亡”,如陈思和、王晓明、南帆、王干、陈仲义等人其英姿不减当年。至于说学院派评论家都忙于“去码理论学术‘砖著’”,造成对当代作家作品的全面疏离,这是典型的情绪化评论,带有主观随意性。以北京的评论家而论,他们仍写了许多即时性的文学理论批评,学术研究并没有削弱他们对“文本”的感受能力和锐敏的洞察力。何况,90年代还涌现了陈晓明、孟繁华、邵建、陈旭光等新一代批评家。

其三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从17年时期就开始了。但那时的研究,清一色是当时文学运动的注脚,拒排

个人化的审美意识。新时期以来出版的30多种当代文学史,改变了这种状况。这些文学史,确立了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探讨了性质和分期,还对一些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作了定位,使当代文学从现代文学史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但这些当代文学史著作,其缺陷也异常明显:对当代文学发展的规律研究不够,在框架上大都是作家作品论的叠加,且忽略了台港澳文学。

进入90年代后,这种局面有了改变。突出的标志是首次出现了私家治史(以往的当代文学史全是集体编写),这就是洪子诚根据他在1991-1993年在东京大学访问期间整理的讲稿《中国当代文学概况》。⑤此书和他参与编著的《当代文学概观》⑥书名几乎相同,但体系、内容和研究视角大相径庭。该书最重要的特点是在处理、“重建”40年来的文学材料、现象时,不受流行观点的束缚,敢对取得支配地位的“文学规范”的性质及其演变作出新的阐释。具体说来,在论述50-70年代文学时,描述了从延安时期所确立的“工农兵文学”如何取得绝对的支配地位,以及这一文学形态的基本特点。下编则揭示了这一文学范式在80年代逐步削弱乃至瓦解的过程,对中国作家“重建”多元化的格局作了热情的肯定。在框架处理上,该书没采用流行的作家作品论组合方式,而着重描述文学现象的出现、变迁的过程,但又不像赵俊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⑦那样以论代史,而是史论结合,在同类教材中显得一支独秀。此书是目前当代文学史教材中最有独创性的一种。目前其影响主要在海外,我相信它很快会“出口转内销”,促使大陆当代文学史教材的变革。

在台港文学研究方面,90年代的台

港文学研究工作者各自兢兢业业写出一批有一定质量的专史,为整合分流的当代文学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其四是有关人文精神和城市文化的讨论。尤其是前者,由学术界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自发掀起,不少精英作家积极参与。在长达3年之久的讨论中,正视了世纪末人文精神危机问题,反思了知识分子在精英神话受挫后重新定位的时代课题。讨论的发起人之一王晓明曾把讨论者的一些看法概括为以下七条:一、我们今天置身的文化现实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它正处在深刻危机之中;二、作为这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精神状态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缩,趣味的粗劣,想象力的匮乏和思想、学术的“失语”,正是其触目的表现;三、从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自身原因讲,就在于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在基本的信仰和认同上两手空空;四、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这种普遍的精神失据,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过程中,由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因素合力造成的;五、要想真正摆脱这样的失据状态,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六、作为这个努力的开端,讨论者们特别愿意提倡一种关注人生和世界的存在的基本意义,不断地培植和发展内心的价值需求,并且努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实践这种需求精神,他们用这个词来概括它,就是“人文精神”;七、既然是这样一种精神,它的实践就自然会成为一个不断生长、日益丰富的过程,一个通过人性和差异性来体现普遍性的过程。⑧

这场讨论(包括王蒙与王彬彬的“二王”之争)总的说来是在学术民主、自由的气氛下进行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可贵的社会责任感。但讨论时由于各人

对人文精神的内涵理解不一样,论证不够严密,有大而不当的毛病,且思想交锋不够,因而这场讨论陷入了形式主义、与人们的生活世界相脱节的误区,收获不甚明显。

其五是媚俗倾向严重,标“新”立“后”之风劲吹。“在这个走向世纪末的无名、无思、无畏但有欲、有性、有钱的时代”,⑨一些批评家抵挡不住世俗化的潮流,承继了80年代出现的玩文学、玩批评的不良倾向,与媒体合谋联袂表演,不断进行商业性“炒作”创造热点,抛出了诸如新生代、新写实、新体验、新状态、新都市、新市民和私人写作、“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的旗号,还有什么后现代、后批评、后殖民、后崛起、后朦胧一类的新术语。树这些旗号和术语,多半是为了一本杂志的畅销或某个作家群的推出。在商业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时代,文学在走向商品化,文学批评适当用一些营销手段,似乎无可厚非,但提口号和术语总要有一定的理论根据,要能符合文学发展实际和作家创作实际。但上述口号和术语,除少数外,大都缺乏理论的建树,经不起推敲,不似80年代出现的某些口号、术语在理论上能站住脚。

其六是不断制造“文学事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面对汹涌澎湃的商品大潮,神圣的文学再也神圣不起来,作家感到了困扰,批评家陷入了困惑。为了对抗这种商品大潮,更好地推销自己的精神产品,评论家与作家(或编辑)再次合谋,不断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文学“事件”。先是有王一川策划的文学大师排座次,茅盾被除名,金庸等人取而代之。到了气象峥嵘或曰气象狰狞的1997年,则有所谓“马桥之争”:就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是否“抄袭”《哈扎尔词典》一事,作家与评论家、评论家与评

论家之间闹得不可开交,差点要对簿公堂。其实,作为文艺评论,求诸法律以断谁是谁非或借“专政”的力量去击倒对方,不是一种聪明的选择。我们提倡作家要有雅量,要听得进不同意见——包括近似荒唐的出格意见。听了后可以反批评,另一方面也要相信时间、相信读者,不必慌忙采用法律手段来裁决。

在90年代,还有对谢冕等人主编的两部《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国百年文学经典》的争论。

这几年,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一些选家(编选也是一种批评)操起了剪刀和浆糊,编了名目不同的各种“作品选”、“精品选”。而这两部由名牌大学教授出面编的“百年文学经典”,将这种“编选热”推上了顶峰。由于是近距离观察,且编选标准不统一,对不少重要作品有遗漏,更重要的是“经典”一词被泛化,被滥用。编者以文学史的名义给一些作家作品打上“经典”的纹印以便推销,因而引起读者以至入选者的纷纷质疑,这是很合符情理的事。

由于批评表演化和事件化的干扰,也由于评论刊物纷纷关门,批评文章只好寄生在报刊上,因而90年代大众传媒批评总的说来显得灵动、轻盈,不如80年代学院派批评来得厚实、凝重。这除了上面说的和商业营销术入侵了文学批评领域造成的影响外,还受了缺乏理论意义的无谓论争的骚扰。这种骚扰有时还扩展到两岸文学论争中,发展为伤害性批评。如把台湾余光中先生对朱自清的散文、戴望舒的诗的批评上纲为“严辞否定新文学名家名作”,把为余光中辩护者打成“招摇撞骗”<sup>⑩</sup>乃至借读者来信之

口,攻击余光中是“文学上的大反攻,反攻大陆”。<sup>⑪</sup>这种在文学中玩弄政治,在政治中玩弄文学的手法用来对付彼岸的爱国作家,尤其不恰当。须知,批评不能依附:依附权力不行,依附风向不行,依附媒体的霸权或“本报评论员”话语的霸权,不许别人反批评更不行。应当把文学研究当作一门学科,而不是把文学批评弄成棍帽齐飞的讹诈恫吓。如有这种恫吓,还能有什么祥和气氛,还能有什么宽松的批评环境,批评还有什么活跃可言,又有谁还敢去从事文学批评呢?

①陈骏涛:《文学批评:从80年代到90年代》,《南方文坛》1997年第5期。

②丁帆:《批评痼病的初诊》,《文艺报》1997年6月7日。

③《全国文学批评研讨会摘要》,《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④许明:《“第三种批评”——新意识形态批评是广义的人文批评》,《当代人》1995年第2期。

⑤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版。

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

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

⑧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版。

⑨王一川:《90年代文学和批评的“冷风景”》,《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3期。

⑩参看广州《华夏诗报》本报评论员:《真理愈辩愈明——关于“余光中严辞否定新文学名家名作”争论的一个尾声,并评古远清的拙劣行径》,《华夏诗报》1994年9月25日。

⑪《华夏诗报》1993年第5期所刊一位中学生的来信。

责任编辑:陶原珂

# 论季语在俳句中的审美价值

□ 陈红蕾

(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讲师, 广东 广州 510633)

[摘要] 季语在俳句中指向一定的季节物候和情感色调; 它以联想为基本的心理机制, 在俳句的创作和阅读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审美作用。

[关键词] 季语 俳句 联想 审美

(中图分类号) I13 / 7 (文献标识码) I13 / 7 (文章编号) 1000 - 7326(2000)05 - 0118 - 04

日本俳句中的季语, 是指与“春夏秋冬四季的变迁有关的自然现象、景物; 传统节日、纪念日和与之有关的仪式活动”。<sup>①</sup>其题材和范围是极为广泛的。作为艺术表现手段的“季语”, 历来为文学家所重视。早在平安时代(794—1192年), 日本歌人就开始以某种词来表现季节了。到了江户时代(1600—1867年), 俳谐出现, 季语更是被重视, 记载季语的“季寄世”、“岁时记”之类的书籍也纷纷出笼。明治维新以后, “岁时记”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增添新的季语。但俳人太须贺乙字却认为, “翻开‘岁时记’, 人们看到上面排列的那些与季节和节日等有关的词都是‘题目’, 因此它们应称为‘季题’。”评论家山木健吉则指出“季题”和“季语”两者不能混同。他们都从审美意义上对“季题”与“季语”作了考察。俳句的改革者正同规子对“季语”的审美特征也揭示道: 人们看到“季语”, 便会引起对季节的联想。例如看到“蝴蝶”这个季语不仅会联想到春暖花开, 群蝶飞舞的情景, 而且会联想到草木萌芽, 麦黄菜

绿, 青年男女三三两两嬉游于其间的情景。有这些联想, 才能对 17 个音的天地产生无限兴趣。他把季语与美感特征联系起来考察, 揭示了俳句的美感作用与艺术思维的联系, 认为有“联想”才能对俳句产生兴趣。但是, 这些文论家们对季语只是从艺术表现手段的审美特征加以阐释和界定, 而对季语在创作中的审美作用和审美效果缺乏较深刻的认识。本文将从这些方面进行探讨。

## 季语的语意指向

俳句是日本韵文学的一种传统形式, 它往往是即兴创作, 俳人触景生情来抒发一时之情愫。它不仅是世界文学中最短的格律诗, 还是日本文学独有的诗体。传统的俳句除了必须有一个季语外, 还要求由 17 个音节组成。例如加货千代的俳句: “一夜”牵牛缠“吊桶, 清晨打水乞邻家”(朝颜やっるべとうれてきりて水。)<sup>②</sup>在这首俳句中, 季语便是“朝颜”(牵牛花)。因为牵牛花在秋天开放, 所以它是秋天的季语。要欣赏这首俳句, 或使这 17 个音节为读者理解, 就必



须有一种能使人产生共鸣的东西,才能达到心心相印的目的。这种共鸣就是季节感。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岛国,花开花落,四季分明,日本人对季节的转换非常敏感,对大自然的观察格外细腻,并对其孕育的山川风物怀有特殊的感情。正是对大自然的敏锐而深入的感受,以及对这种感受的独特的艺术表现,构成了日本文学中俳句的独特审美氛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也正因有这种感受,日本民族自古就有“以自然景物感悟人生、体察人情的思维传统”。③有人把这一传统归纳为民族的美学理想:“自然万物之情思”。在对自然的感触中,俳句以其细腻而敏锐的笔触,不仅描写了自然与人生,自然与人情;而且还展现了俳人对人生复杂而深邃的精神感受,体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怪不得日本一位文学家说,“即使在一片叶或一只蝴蝶上面,如果能从中找到自己心灵的寄托,那就是俳句。”所谓“一片叶、一只蝴蝶”,就是人们所共有的季节感受,反映在俳句中就是季语。它能使人感到大自然中焕发出的勃勃生机和灵气。所以,季语在俳人的创作中,不仅仅是丰富其内涵的需要,而且是联系读者与俳人情感的纽带。具有以下特殊的审美作用。

借景语以引其情。著名俳人向井去来这样说:“风雅存在于大自然中。”在日本人看来,自然景色的千变万化,纤细差别,更是大自然灵性的体现,是大自然所展示的美,是大自然和人的对话、交谈。因而,俳人主张要抒发和描绘自然景色的变化,甚至不超过自然景色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细微差别。在俳句中,景物给人的鲜明的“四季感”,以及对具体自然物瞬间变化美的凝定,均说明了这一点。请看著名俳人高浜虚子的俳句:“大寺周围树,嫩绿新芽急先出,出时似

人呼。”(大寺を包みてわめく木の芽かな。)<sup>④</sup>这是一首描写春天到来的俳句。俳句中“木の芽”(暗示春天)这一鲜明的季语不仅告诉读者春天来了,而且还把读者带到了俳人描绘的春天的景象之中,似乎看到了、听到了寺院周围大树上的嫩芽、绿叶、新枝都在争先恐后地叫喊着春天来了。这样细腻的拟人手法,把万物争春、生机盎然和强大的生命力表现得栩栩如生,也传达出俳人抑制不住的喜悦心情和跃跃欲试的冲动。类似这种用触发自己感情的景物的季语来寄托思想感情的俳句也有很多。例如,古代“俳圣”松尾芭蕉的千古名句:“若叶して御目霞ぬぐはばや”。俳句说的是,“在初夏季节,俳人来到奈良的唐招提寺,环顾四周,满目清翠,而唐代高僧鉴真和尚的漆像,令人肃然起敬”。鉴真和尚曾多次东渡日本失败,终于在第六次东渡成功,然而却双目失明。但他在奈良建立的唐招提寺不仅传播了佛教的戒律,还为日本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作者仰望鉴真像,似乎感到鉴真那双失明的眼睛流出了泪水,于是产生了想摘一片“若叶”(嫩叶)为他拭去泪水的冲动。俳句闲静而幽雅的季语不仅突出了作者的崇敬之情,还使读者产生共鸣:多想让鉴真和尚重见光明!季语“若叶”和整首俳句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境界,自然、含蓄而有余韵。

借物语寓其意。综观日本传统俳句,其主流是歌咏大自然,然写物以附意的俳句也为数不少。俳人通过季语来激起欣赏者的美感。例如:高浜虚子的另一首俳句《白牡丹》:“莫说白牡丹,纯结无瑕皆白色,细观亦泛赤。”(白牡丹といふといへども紅ほのか。)<sup>⑤</sup>诗中季语是“白牡丹”。白牡丹素以洁白无杂色,纯洁高雅而深受人的喜爱,但由于作者对

事物观察细腻,所以白牡丹在他眼里“亦泛赤”。显然,作者基于对生活的体验而启示读者:世上没有绝对纯的事物,高雅圣洁的白牡丹如此,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种在艺术形象中所寄寓的审美理想情趣以及对生活的独特审美体验等内蕴,来自作品中的季语,其根本所在是意与物,情与形,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再看另一首俳句:“吾虽年纪大,但要学习梧桐花,淡淡把妆化。”(桐の花ろす化し老いんかな。)<sup>⑥</sup>这首俳句是作者在丈夫逝世一年后创作的。当时她已年迈体弱,但决定继承丈夫遗志,主办俳志《鹿火星》。作者借梧桐开花的淡紫色,淡雅而美丽不俗,非常形象、生动地表达了作者人老心不老要干一番事业的可贵精神,利用季语大大增强了俳句的形象性和艺术性。

这类季语的应用,把被喻体的形象和特征表现得非常鲜明突出,一方面使艺术境界得到深化和丰富,另一方面美感作用更加强烈。

### 季语的审美机制

联想是理解俳句的重要因素,而季语具有发人联想的特征。季语具有将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意与创作客体的情境互相联结的艺术功能,具有作者触物生情到创造艺术形象以寄托情思的特点。季语是联结情感和形象表现的桥梁。

关于季语的艺术思维问题,虽然日本文论家们没有太多的论述,但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大须贺乙字认为:只有在作品中活用了“季题”,才可称为“季语”。这种“活用”理论,可以说是日本形象思维理论的萌芽,他看到了在艺术构思和想象中的作用。而对于形象思维的特征,正冈规子揭示得更直接:“不理解四季的联想者,终究无法理解俳句”。这“联想”反映了形象思维的基本规律。联

想与想象密切相关,所以,季语虽是个艺术表现技巧,但实际上它蕴含着艺术思维的本质特征,季语与“想象”在本质上有一致之处,是形象思维的具体化。

俳句与其它文学体裁不同,容量小,只适宜于表达一瞬的感怀,或体现某一内容。但它也是人生世相的反映,是俳人对生活进行的审美把握,是艺术思维创造出具体、完整而富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或者说是用形象表达俳人对生活的感受、理解和审美评价。季语作为与艺术思维活动密不可分的艺术表现手段,在俳句的艺术形象创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季语本身所具有的审美特征,也必然产生相应的审美效果。

在俳句中,历代俳人运用季语这个艺术手段展开联想,创造出许多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意境。它们正如中国古人所说:“即景生情,因情生景”。如前所述“俳圣”芭蕉的名句中,由“若叶”而产生了崇敬之情,因为鉴真拭去泪水的冲动而想到“若叶”,就是“情怡能称景,景也怡能传情”的例子。这种情景相生而且契合无间的意境就是俳句诗人所追求的境界。所谓意即情,是俳人的思想感情,即主观感受。所谓即景,就是被描写的对象,客观事物。情景交融,主观感受与客观对象溶化在一起,才构成一种意境。再看高滨虚子的《白牡丹》,作者在白牡丹“亦泛赤”这一感性形象中寓以事物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万事不能求其全的哲理。正是所谓:“想象以为事,幽渺以为理”,“有理趣而无理障”。这种主观感受与客观对象溶化在一起的境界,往往会由于作者思想的渗入而使被描写的对象显出独特光彩,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在客观对象中透露出来变得具体可感。这种主客互渗的辩证关系,说明了俳句的创作不是对外界事物的冷漠复制,而

是经过俳人情感的提炼而创造出饱含着情感的艺术形象。这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川端康成说的,“就是发现存在的美,感受已经发现的美,创造所感受的美。”但是,这种“美”的最终实现还要读者的参与,必须在艺术形象与欣赏者的结合中才能完成。季语在审美接受中,又起着联结情感和形象表现的作用。

“季语”与意境的产生。每一首俳句都有一种意境,在读者心领神会时,都会有一幅画境很新鲜生动地突现在眼前,使读者神魂为之勾摄,若惊若喜,霎时无暇旁顾,仿佛这小天地中有自足之乐。这种意境在艺术形象中寄予了作者的审美理想、情趣以及对现实生活的独特审美体验等内蕴,所以能激起欣赏者的美感。这种意境是意与物、情与形、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的有机整合。对于这种有机整合,正冈规子、大须贺乙字都在不同程度上看到了。在正冈规子那里,把季语与联想紧密联系,反映在俳句上就是通过用季语作比喻、象征、暗示与作者要寄寓的思想感情联系在一起。这时,季语就不单纯是一种形象比喻的手法了,而是使事物与俳人所要表达的情景相一致的艺术手法。季语便成为作品意境生成的不可缺的因素。

季语与欣赏的过程。作品的“意境”为艺术欣赏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也就是为审美价值的最终实现提供了可能,但是艺术魅力的真正实现,必须经历欣赏者的欣赏过程。它是实现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作用的中介环节。作品的客观价值通过欣赏活动才能最终实现。

欣赏与创造有共通之处。在俳句

中,俳人通过季语创造艺术形象去感染、吸引、激发读者的欣赏欲望和阅读兴趣,满足读者的审美要求。欣赏俳句时,读者通过季语(欣赏对象)而引起艺术思维活动,结合自己的直接或间接的生活经验,充分地想象,去感受、认识、补充,进行再创造,从而在头脑中创造出自己的意象。这种意象远比作品形象来得丰富和灵活。

季语的美学价值及其意义。虽说对季节和自然景物的感受并非日本民族独有,中国古人早有较深入的论述,正如梁代钟嵘在《诗品总论》中所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夏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这说的是诗文学与季感是相联的。不过,“由于日本大自然的美丽和四季变化明显,使得日本民族对季节的变迁和自然现象格外敏感、细腻。因而产生了丰富的季语,而这丰富的季语反过来又使日本人产生了对大自然和季节变换的异常细腻敏感的情感和心态”。<sup>⑦</sup>所以,俳句中的季语成了日本风土培养出来的日本人的审美意识的反映。有人说,季语在俳句中所起的作用,外国人是很难理解的。这不无道理。

①②⑦《漫话季语——兼谈俳句的欣赏》刘有德:《日语学习与研究》1996.7。

③《“川端文学”的自然观》韩贞全、吴舜立:《日语学习与研究》1989.2。

④⑤⑥迟 军:《名俳赏阅》,《日语知识》1998.1。

责任编辑:陶原珂

# 丘逢甲与客家文学

□ 罗可群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421)

**[摘要]**丘逢甲生为台湾客家人,受客家人文精神的孕育,受客家先贤的影响致深。他以自己的人格、创作实践和客家情怀,为客家文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集中体现在他的诗文集《岭云海日楼诗钞》之中。

**[关键词]**丘逢甲 客家 文学 诗文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122-05

丘逢甲(1864-1912年),是出生于台湾苗栗县的客家人。甲午战争失败后,台湾被割给日本。丘逢甲挺身而出,“刺血三上书”,反对割台。在得不到清廷支持的困难条件下,他力倡自救,率义军抗击日本侵略者,因弹尽粮绝,被迫内渡,回到祖居地纯客籍的山区县——广东镇平(今属梅州市的蕉岭县)。

丘逢甲在台湾时除参加科举考试外出,其余时间都在客家地区生活;内渡之后,虽然常到潮州、广州地区活动,但仍有不少时间在老家度过。丘家有一个传统,出门的人“不论生活环境如何,每年必须回乡祭祖或省亲一次”。<sup>①</sup>因此,丘逢甲对客家地区的山乡风貌,人文地理都十分熟悉,感情很深。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作家思想感情的表现。丘逢甲这位诗人,就与客家文学有了割不断的情缘:他受客家人文精神的孕育,他的诗作成了客家文学中最精彩的篇什;他又以自己的人格和作品影响了一批客籍作家,从而促进了客家文学的发展。

## 一、客家人文精神的孕育

丘逢甲生长在台湾的客家地区,父亲丘龙章是具有强烈客家意识的知识分

子。在“亲兼师”的长期熏陶下,丘逢甲继承了关心政治,积极进取,不懈奋斗为主要特征的客家人文精神。“牢记祖宗是因外寇侵袭而辗转南迁的,所有子孙后代,无论落籍何处,都必须勤耕苦学,奋发图强。”<sup>②</sup>丘氏族人的这一优良传统,成为丘逢甲诗文创作的重要主题。<sup>③</sup>

丘逢甲关心政治,积极进取,不懈奋斗的精神,还由于几位客家前辈的奖掖、鼓励而进一步强化,并凝聚在其文学创作中。

一位是来自广东嘉应州的举人吴子光(1819-1883年),世居白渡堡,与著名的客家先贤宋湘同乡。他因家道中落而渡台,长期在新竹、苗栗等地讲学授徒,是逢甲父亲丘龙章的好友。丘逢甲的父亲到彰化县三角庄任教时,吴子光正在那里坐馆,因此机缘,丘逢甲得以求教。吴子光学问渊博,诗文俱佳,著作有署名“铁梅老人”的《一肚皮集》、《三长赘笔》、《经余杂录》等等。其诗有股豪气,如《寄题延平王庙壁》:“曾读丰碑渤海东,开疆犹仰大王风。阖门骨肉杯羹底,千里江山锦绣中。”吴子光认为丘逢甲深

思好学，“年纪虽小，但是很有志气，言语间每以民族的将来为话题，因此很器重他。”④吴子光和丘逢甲成了“忘年交”，常与丘逢甲这个“小朋友”讨论。据丘秀芷《行云剖日》记载，丘逢甲曾就《论语》中的《宪问篇》和《阳货篇》的内容矛盾提出问题，吴子光便向他解释：“孔子说话，总要看对象说话。如果对方过于钻营急功近利，孔圣人就会劝他不要急进，要多收敛。如果对方个性瑟缩，他又会一劲地激发人要进取，奋发”，⑤吴子光还针对丘逢甲喜欢学陶渊明的想法，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果人人都学陶渊明，那么贤者都不出来治世，这样，乱世只会愈加混乱！”

近代著名洋务运动的重要成员丁日昌，也是曾对丘逢甲产生过激励作用的客籍先贤。丁日昌(1823-1882年)，广东丰顺人。1877年(丁丑)任福建巡抚期间，曾到台湾科举场上巡视，适丘逢甲应童子试。其时丘逢甲只有十四岁，是试场中最小的考生，因交卷最早，引起丁日昌的注意。询问姓名后，出联题“甲年逢甲子”命对，丘逢甲以“丁岁遇丁公”对之，丁日昌十分满意，又命加作《全台利弊论》。在这次考试中，丘逢甲得了全台第一名。丁日昌对丘逢甲赞赏鼓励，并赠“东宁才子”印一方，这使丘逢甲终身难忘。后来丁日昌在丰顺老家病逝时，丘逢甲悲痛难已，“每念师门，泪辄涔涔坠也。”⑥

直接有诗唱和又对丘逢甲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台湾巡抚唐景崧。唐景崧(1841-1903年)，广西灌阳的客家人。虽然他后来在乙未割台时，众举之为“台湾民主国”总统，日敌入侵，他竟然惊慌失措而私逃，留下一大历史污点，但其在任台湾巡抚期间对台湾客家文学发展的贡献则不能一笔抹杀。他创设“牡丹吟

社”，团结人士，提倡风雅，启迪文教，颇有成效。他对丘逢甲更是多方激励，寄予厚望。当丘逢甲赴京应试回台不愿从政时，唐景崧曾赠之以诗：

“两年不见丘才子，今日登门喜若狂，  
沧海鱼龙神变化，秀才文字忆商量。  
听潮亭上声如昨，觅句堂前酒再香，  
从此诗人须破例，勳名待出水曹郎。”

丘逢甲的答诗虽然没有立即接受唐氏的劝说，但却表明了他还是十分尊重他的这位恩师：

“一第归来海外天，程门重立兴悠然。  
秀才风味依旧在，犹似春灯问字年。”

应该说，正是这些客家前辈的教育、激励，使丘逢甲的爱国爱乡的热情愈益强烈，从而使他在危急存亡之秋，能挺身而出，英勇抗日，并写下诸如《离台诗》等许多激越的爱国诗篇，成为台湾客家文学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台湾客家文学史概论》作者黄恒秋说：介于清末民初存活年代的丘逢甲，正是传统在台湾的“中国客家”诗人的写照，性格上拥有客家人的坚韧执着的精神，经历割台的创伤，仍不改其认同祖国的宿命逻辑，史论家或以“爱国诗人”相称，或以“迩来诗界唱革命，谁果独尊吾未逢。流尽玄黄笔头血，茫茫词海战群龙”。的恢弘气度赞赏有加。严格来说，其以炎黄子孙的才思情溢，展现对沦陷后台湾的故国之思，以及报国无门的悲愤，应属客籍诗人作家“原乡论”的滥觞。

⑦

## 二、《岭云海日楼诗钞》的客家情味

丘逢甲内渡后的诗集《岭云海日楼诗钞》除了人们熟知的爱国诗章外，还有不少反映客家人文精神，歌咏客地山川风貌的篇什。

其一，歌“寻根”。念念不忘自己的根在何处，是客家人的传统。强烈的“寻

根”意识,是丘氏家族进行家教的结果。他们把“慎终追远”作为族规,年年祭祖,都要子孙牢记自己是河南堂的后人。⑧丘逢甲内渡后的诗作中常常追宗溯源,不忘祖先来自中原,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

他回粤东祖居地时,深情吟咏:“抱江城郭夕阳红,百口初还五岭东”。⑨一个“还”字道出了渊源。在写于同年的《还山书感》中,有“南渡衣冠尊旧族”一句话的自注,更明确标明:“予族由宋迁闽”。宋,属河南省地。其诗又一次证明丘逢甲牢记自己是中原南迁汉人的后裔。

为了“寻根”,丘逢甲曾多次到毗邻镇平的闽地上杭,写有《忆上杭旧游》十五首,其四:“寻碑亲拜左丞坟,谱牒都成史阙文。七百年来遗老尽,更无人说旧参军。”在注释中有说明文字:“维禄公坟,曰左丞地。家谱以公孙迁粤者,官居左丞,故云。考始迁粤为公玄孙,乃宋左丞议郎,即信国参军创兆先生父也”。“信国”,即文天祥,“创兆先生父”即丘梦龙。据丘琮所撰的《丘逢甲年谱》载:“宋季,二世祖创兆公参信国公军事,始奉父梦龙公迁居广东梅州之员山,即今蕉岭之文福乡也”。

为了“寻根”,丘逢甲也曾到饶平,谒丘氏枢密公成实祠墓。虽然后来丘逢甲在其所撰写的《家传木核牌匾》中再也未提到这位北宋末年的枢密公,其关系尚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其谒墓时写的《示族人》一诗所表现的思想则是十分感人的:“程江风雨韩江月,海云台岛经三迁。仗剑归来人事改,故居只有青山在。……岂必山前胜山后,但贵宗祊能世守。孙枝万叶遍东南,自幸能归奠尊酒。山城遗俗朴不华,惟耕与读真生涯。勉哉兄弟各努力,勿愧先邑称名家”。⑩从其

诗可见丘逢甲“追根溯源”,在于继承客家人的优良传统,勤俭朴素,耕读传家。

其二,颂先贤。景仰客家先贤的诗作,在《诗钞》中亦屡见不鲜。从唐代的张九龄,宋代的蔡蒙吉到有清一代的宋湘等名家,都是丘逢甲顶礼膜拜的贤哲。

“九龄羽扇未可弃,尚当为君效一挥”。(《秋暑酷甚戏咏》)“岭外有人吟《感遇》,丹桔满林写佳句”(《九月二十九日叠韵寄伯瑶》)前者赞颂张九龄的政治才能,才堪经邦,后者敬佩张九龄的文学成就,千秋不朽。

古革,是北宋绍圣年间进士,祀乡贤。据乾隆《嘉应州志》载:“教授琼州,训士不倦,洞蛮多遣子弟受学,会黎人叛,郡檄革往谕,蛮素敬革,遂率服。状闻于朝,擢守潮州,有惠政”。⑪丘逢甲有《古大夫宅下马石歌》,“摩挲欲具袍笏拜”,其敬仰之情可见。

抗元志士蔡蒙吉,以“客家神童”而著称,其“一路春鸠啼落花”的诗句被广为传诵。丘逢甲在《王寿山诗·其六》中深情地写道:

“鸣鸠春路忆幽探,耆旧遗闻选石谈。  
埋碧千年应不化,重镌诗碣蔡梅庵”。

客家著名诗人宋湘,是丘逢甲的崇拜的偶像:

“伯牙台上记留题,更写丰湖五别词。竹叶蔗渣俱妙笔,米芾书法杜陵诗。”(《惠州西湖杂诗·十一》)

在《题王晓沧广文〈鹧鸪村人诗稿〉》诗中盛赞宋湘:“百年古梅州,生才况雄特。宋公(芷湾先生)执牛耳,光焰不可逼”。对宋湘在客家文学史上的地位予以高度的评价。

他也爱读邑人黄钊(香铁)的诗集;“嘉道以还论诗派,谭张之外此名家。瓣香故里尊《红杏》,养志高堂谱《白华》。七子鼓旗雄后劲,一官鞞铎老天涯。”



寻秋曾过诗人墓,重检残篇发浩嗟。”

(《读白华草堂诗集》)

在历史转折关头,那些大义凛然的节士,更是丘逢甲心目中的英雄。镇平乡贤林丹九是南明孝廉,矢志抗清,殉节于长潭一线天。丘逢甲以诗吊念:

“崖壁斑斑碧血痕,先生当日此成仁。  
三闾四广支离局,一息千秋草莽臣。  
乱世科名娱老母,荒山须发表完人。  
扁舟欲访悲歌处,冷月空潭泻古春。”

三书却聘至今传,高节清风尚凛然。  
列传补书宜国史,此邦议祀合乡贤。  
荒祠日冷双门阙,遗寨云封一线天。  
断句零章待搜辑,蠹余留续谷音编。”

(《景忠祠吊故明孝廉林丹九先生一桂》)

镇平县白马乡诸生赖若夫,明亡后仍奉先朝正朔,守县境抗清,丘逢甲把他看作“明之完节士也”,以炽烈的感情,用古风形式,歌颂赖若夫是“豪杰士”,“先生之风今未已”,德被后人。

联系诗人的抗日保台实践,我们不难理解诗人对这些忠义乡贤的深挚感情。

其三,赞妇女。以勤俭善良、忠厚淳朴著称的客家妇女,名满天下。《诗钞》中也有好些篇什吟咏讴歌。如“蓝溪水,清而蓄。中有双鸳鸯,旁有连理木,上有多贤者居,吾丘世聚族。岁在蛇,贤人嗟,秋风吹折连理花。文鸳一夜死,鸯殉其雄死……。”<sup>⑫</sup>把殉夫的妇女称为“烈妇”,这固然是封建时代出嫁从夫的思想在作祟,它反映了丘逢甲思想的局限性,但从“爱情专一”这一角度来说,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客家妇女对爱情严肃认真的态度。

《贤母诗》赞扬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亲人、育儿有方的贤母,反映了客家妇女的思想观念和生活状况。

《题叶婉仙女史古香阁集》三首则是对客家才女叶碧华的礼赞:

“修竹娟娟翠袖单,六铢衣薄不胜寒。  
新词一卷《疏香阁》,煮梦仙人叶小鸾。”

福慧双修竺落宫,玉楼人去锦屏空。  
翩翩独立人间世,赢得香名饮粤中。”

滴粉搓酥绮意新,溶溶梅水写丰神。  
桐花阁外论词笔,更遣香闺作替人。”

丘逢甲的思想随时代而进步。作于1902年的《纪兴宁妇女改妆事,与刘生松龄》诗二首,表现了对客家妇女的期望。

“山川奇伟数齐昌,不独男儿解自强。  
要使金闺兴女学,银钗先改峒蛮妆。”

“维新殊有九州风,新绾盘蛇髻更工。  
预祝英雄出巾帼,武婆城在碧云中。”

这两首诗中,已寓有男女平等的思想,真诚祈盼客家妇女的在维新大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四,咏风物。《诗钞》中还有不少篇什歌咏客地的山川风物。从镇平文福乡的印山故居、淡定村的君山、庐山,到县城的桂岭书院、长潭一线天,从梅州境内的阴那山、西岩山、王寿山、铜鼓嶂到惠州的罗浮山,从镇平的镇山楼,到梅州的凌风楼、铁汉楼,从邑人呼为“石伯公”的奇石,传说中的杨子仙庙、仙人桥,到现实生活中的灵光寺、兴福寺、祥云庵……,都成为诗人吟咏的素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作在不同程度上都反映了诗人的思想,寄寓着诗人的情怀,绝不同于一般的游山玩水的即兴之作。《铁汉楼杯古》、《凌风楼杯古》、《思三友行》等诗,不仅使读者领略到客家地区的山川风物,更使人感受到诗人那炽烈的爱国爱乡的情感。铁汉楼,建于宋,纪念北

宋名臣刘安世。刘敢于直言,遭章惇、蔡京迫害,贬梅州,长达七年,多次从容面对死亡而不改初衷,苏轼誉之为“真铁汉”。梅人建楼以祀。《铁汉楼怀古》:

“瘴云飞不到城头,庵圯楼荒客独游。  
 并世已无真铁汉,群山犹绕古梅州。  
 封章故国回天恨,梦寐中原割地愁。  
 欲倚危栏酌杯酒,程江鸣咽正东流。”

“见贤思齐”,是客家人的优良传统,吊古伤今,乃丘逢甲的无奈之态。这首吟咏风物怀古诗,亦可见丘氏托物言志情怀之一斑。

### 三、促进客家文学的发展

丘逢甲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客家文学的概念,但他对岭东诗人的评述以及促进近代岭东诗人团结与交流方面所做的许多工作,实际上大大促进了客家文学的发展。如,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他给潘飞声的信中说:“岭东诗人,鄙见当以黄公度为首屈,胡晓岑名曦次之。”又说:“晓沧之诗又次于晓岑,然去年至今,诗格一变雄浑,五十后更有进境,殊为难得,不将又一高达夫耶?”他还对门下温生等予以肯定,认为他的诗作“亦可观”。<sup>⑬</sup>由此可见,丘逢甲对“岭东诗派”这一群体的领袖人物、中坚力量及其诗风已有明确的认识。笔者在《试论近代岭东诗派》一文中已有详述,这里不赘。

⑭

应补充说明的是,丘逢甲对岭东诗风的理论总结:“岭南论流派,独得古雄直。”<sup>⑮</sup>这实际上也道出了客家文学的风格特点,我们应作深入研究。而丘逢甲

以自己人品、诗作和诗论,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士人,如积极投身辛亥革命的邹鲁、姚雨平,如学者诗人温庭敬等等,他们的诗文作品已成为客家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中的传承关系,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①②丘琮:《我的奋斗史》第30、25页,《中华日报社》出版1981年版。

③参阅拙作:《丘逢甲的家世及对他的影响》,载《丘逢甲研究》,第166-17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④丘秀芷:《行云剖日》第46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78年初版。

⑤⑥参见丘晨波:《丘逢甲年谱》,载《丘逢甲文集》第376-378页,花城出版社1994年初版。

⑦黄恒秋:《台湾客家文学史概论》,第83-84页,台湾爱华出版社1998年初版。

⑧丘秀芷:《行云剖日》。

⑨丘逢甲:《潮州舟次》。

⑩丘逢甲:《谒饶平始迁祖枢密公祠墓作示族人》。

⑪见《乾隆嘉应州志》卷六人物部·乡贤。

⑫丘逢甲:《蓝溪烈妇篇为上杭族人德祥妻廖氏作》。

⑬丘逢甲:《与兰史》,载《丘逢甲文集》第273页,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

⑭《试论近代的“岭东诗派”》,载《客家学》(第2辑),第114-1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⑮丘逢甲:《题王晓沧广文〈鹧鸪村人诗稿〉》。

责任编辑:陶原珂

# 解读柳宗元

——荐梁鉴江《柳宗元传》

□何业光

(广东高教出版社编审, 广东 广州 510076)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127-02

在唐宋八大家中,柳宗元是命运最悲惨的一个,也是被后世误解乃至曲解最甚的一个。历代封建守旧者,总是对柳宗元的政治表现、哲学思想横加贬斥;解放后,虽然有比较公正的评论,但“文革”时期,又遭“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肆意歪曲,被戴上“法家”的桂冠,弄得面目全非。

梁鉴江先生的《柳宗元传》(广东高教出版社1999年10月版,《唐宋八大家传》之一),以丰富翔实材料、饱蘸感情的笔墨,全面系统地叙述柳宗元坎坷不平的人生历程,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充分展示其一代宗师的人生风采,揭示其卓越的政治哲学思想,评介其文学创作的成就及历史地位,廓清后世论者的一些错误说法,给读者一个真实的柳宗元。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

其一,文字活泼优美。《柳宗元传》是一部学术著作,既有学术著作的严谨和科学性,又避免了一般学术著作的枯燥和板滞。在通常的夹叙夹议当中,不时有生动形象的描写,并且大量使用排比、对偶句式,文字流畅,感情浓烈。比如,这样描写传主在贬地的生活情景:“他留连于冉溪北岸的小石潭,为这里的清水游鱼、青树翠蔓所陶醉。……他乘舟穿行于这里的重洲小溪、浅渚澄潭,观赏这里的纷红骇绿,呼吸这里的花草芬芳。他游览过袁家渴西南百步的石渠、石渠不远处的石涧。……他游览过湘江岸边美如仙境的界围岩,游览过潇水西岸的名胜朝阳岩,游览过湘江岸边的古迹

铁炉步。他登上湘口馆的高楼,看这里的碧水青天,听这里的渔歌雁叫。他攀上蒲洲的石矶,遥望横江口的洄潭岛屿。”这些文字生动地写出了柳宗元被贬蛮荒后寄情山水的无奈。又如,写柳宗元“思乡之情往往触景而生,有时永州的农事、果木、飞鸟也会牵惹他的乡愁。他从贬地农民的春耕,会想到等待主人归去‘灌园’的‘悠悠故池水’……;从黄鹂的啼鸣,会想到长安一望无际的麦浪,想到‘晴烟最深处’‘舍南巷北遥相语’,想到长安的‘斜风’‘细柳’和‘行当熟’的庄园‘紫椹’”。这些文字从传主的原作化出,很好地表现了传主对家园思念之深,也倾注了作者的同情。像这样优美流畅的文字,书中随处可见。即使是评析作品,作者也注意排比、对偶以及长短句式的结合运用,写得文采斐然。这是一般平铺直叙的传记所少有的。

其二,突出文学,全面评介。柳宗元是“天才奇才”(王安石语),他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但他的成就主要在文学。因此,该书以主要的篇幅来叙写他的文学创作活动,除了在叙述其生平时,穿插叙写其文学活动、评介其各个时期的作品外,还专章论述其散文革新主张、散文特色、对唐代散文革新的贡献,以及诗歌创作成就和历史地位,等等,使读者明白柳宗元为什么能成为与韩愈并驾齐驱的一代文坛宗师。同时,该书对柳宗元文学作品的评析既全面又细致。从政论、传记、寓言、山水游记、杂文以至诗歌、辞赋,几乎评析了柳氏各种文体的所

有代表作。在评介具体作品时,或分段,或分层,或逐句分析,甚至深入分析其如何遣词用字,对读者读懂柳宗元大有帮助。

其三,立论公正,见解独到。像韩愈一样,柳宗元身后也有一些迄今尚有争议的问题。作者坚持“知人论世”、实事求是的原则,给予公正的评说。不随意拔高古人,也不随意贬抑,甚至厚诬古人。例如,关于柳宗元信佛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宋代就有“退之(韩愈)辟浮图,子厚(柳宗元)佞浮图,子厚不及退之”的说法。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论者大挖柳宗元信佛的阶级根源,认为他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鼓吹毒害人民、压迫人民的佛教”,是“为了愚弄劳动人民,泯灭他们的斗争意志”。该书从中唐的社会环境,柳氏的身世、政治理想、作品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柳氏好佛是因为他“认为佛教的某些思想与儒典相通,比如‘大中’、仁爱、向善等等,因此儒佛可以‘并用’,可以‘统合’。他是有意识地以儒入佛的,他努力寻找儒、佛的共通处,试图把两者融合起来,以达到调和矛盾,稳定社会,‘利安元元’的政治目的。‘统合儒释’,正符合儒家不走极端,‘执两用中’、‘比中而行’的‘大中之道’”。柳宗元“深研佛理,兼容佛家;但他并不迷信佛教,他不是佛教信徒,也不是佞佛者”。这个结

论是公正的,也是很有见地的。

读罢全书,我们读懂了柳宗元。他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异常珍贵的文学遗产,而且为后世的知识分子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他热爱祖国,无论是在春风得意的长安时期,还是在穷愁困厄的永州时期、柳州时期,他都对社稷耿耿忠心,为改革朝政、维护国家统一勇往直前,直言不讳,献计献策,尽心竭力。在永州时期,他职非正员,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便全心投入写作,用诗文来实现“辅时及物”的人生理想,即使生而不遇,也要声垂后世,让自己的作品发挥积极的影响。在柳州时期,他虽为贬官,但有正式职位和一定的权力,便全力投入政务,切切实实为老百姓做好事,造福州民,直至病死于贬地。他思想活跃,追求真理,在许多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是非分明,疾恶如仇,无情揭露批判社会的丑恶现象;他为官清廉,家徒四壁,以致死后连丧葬费也要由别人资助;他真诚待友,不因势厚薄,与参与革新的友人共患难,同进退,相濡以沫。诚然,柳宗元不是完人,但他确是一位光照千古的杰出人物。今天我们仍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崇高的人格力量,得到有益的启迪,这就是我们解读柳宗元的意义。

责任编辑:童 轩

(上接第107页)每一发展阶段中整体与部分之间分与合的规律。

①②《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全球化》第12、13~14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年版。

③《章太炎全集》五,第1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199-201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

⑤⑩⑪⑫⑬《戴震集》第452、184-185、192、191、368、4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⑥⑦⑧《易·系辞传上》。

⑨⑰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序,载《从混沌到有

序》,第1、5-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⑬见《尚书·尧典》。

⑭见《易·系辞下》。

⑮见《孟子·尽心下》。

⑯见《论语·八佾》。

⑱⑲《周易外传》第247、160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⑳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3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㉑《章太炎全集》三,第3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责任编辑:陶原珂

# 本刊声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需要,扩大作者学术交流渠道,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期刊网”。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付给。如作者不同意将文章编入该数据库,请在来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学术研究 编辑部

2000年5月

5  
2000

ACADEMIC RESEARCH  
总第 186 期 (月刊)

学术  
研究

ISSN 1000-7326



9 771000 732000



05

ISSN1000-7326  
CN44-1070

每月 20 日出版 定价：4.00 元